

目 录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经济学•管理学•

美日企业集团的异同

——成长历史及追求经济效率方式的比较

..... 李 敏 毛蕴诗(5)

中国不动产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与政策选择

..... 高 波(10)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 黄锦奎(13)

“知识—制度”互动原理与中国渐进式改革

..... 曾凡清 黄建军 丁志铭(17)

广东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思考..... 湛 明(21)

难点研究

所有制结构的演变逻辑及当代尝试..... 陈甲优(27)

论社会现代化与青少年教育网络化..... 谭建光(30)

•哲学•法学•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价值思想的阐发

——浅析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 许斗斗(34)

“富而好礼”新论..... 朱宝信(38)

错案的成本分析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刘 伟(43)

•历史学•

论历史、历史学与历史意识 陈 新(48)

衙前农民运动性质辨正..... 陈志根(53)

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古永继(57)

1998年第8期

•文学•语言学•

南方都市文学:专论与笔谈

岭南都市文学特点…………… 张 绰(61)

南方都市文学的定位…………… 黄树红(64)

新都市文学:文学现代性的实践与期待 …… 宫瑞华(66)

都市文学与“都市”象征(金 岱) 南方都市:

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话语(喻季欣)

中产阶级:南方都市文学的审美焦点(柯 可)

南方都市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张墨琴)…………… (70)

东西方史诗比较论…………… 刘劲予(74)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反封建内容与反帝抗日斗争

…………… 徐文泽(79)

从词语的文化内涵看汉英文化的差异…………… 何家宁(83)

•澳门研究•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再研究…………… 赵立人(86)

澳门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李 郇(90)

佛澳企业合作前瞻…………… 马梓能(92)

•书海酌蠡•

“爱田”非即“援田”…………… 陈斯鹏(94)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terprise Groups and Japanese Ones	Li Min and Mao Yunshi(5)
Structural Defects of Immovable Property Market in China and Our Optional Policies	Gao Bo(10)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Project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	Huang Jinkui(13)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 and – system”Interaction and the Chinese – Type Reform	Zeng Fanqing, Huang Jianjun and Ding Zhiming(17)
An Opinion on Developing a Knowledge Economy in Guangdong	Zhan Ming(21)
On the Logic of Ownership –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Current Try	Chen Jiayou(27)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Teenager Education through Net	Tan Jianguang(30)
An Explanation of Marx’ s Thought about Human Existance	Xu Doudou(34)
Another Opinion on “Being Rich and Polite”	Zhu Baoxin(38)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of Wrong Cases and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Liu Wei(43)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 Consciousness ...	Chen Xin(48)
About the Property of “Yaqian Peasant Movement”(1921)in Zhejiang	Chen Zhigen(53)
People Relegated into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Gu Yongji(57)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n Metropolises in China: Papers and Essays.....	Zhang Chuo, Huang Shuhong, Gong Ruihua, Jin Dai, Yu Jixin, Ke Ke and Zhang Moqin (61)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astern Epics and the Western Ones	Liu Jingyu(74)
The Anti – fudual Content of the Stories Created by Zhao Shuli and His Anti – Japanese Struggles	Xu Wenzhe(79)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ies	He Jianing(83)
Another Study of Portugueses’ Arrival and Inhabitation in Macao	Zhao Liren(86)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cao	Li Xun(90)
On the Future of Enterprise Cooperation between Foshan City and Macao	Ma Zineng(92)
A Textual Study of Two Ancient Chinese Words	Chen Sipeng(94)

美日企业集团的异同

——成长历史及追求经济效率方式的比较

□李 敏 毛蕴诗

美国、日本的企业集团发展至今,已分别占据着美国和日本经济、社会力量的重要地位。然而,两个国家的企业集团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沿着不同的道路,采用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本文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作一比较,希望从中寻找出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集团有益的成分,并加以借鉴和吸收。

(一)美、日企业集团创业历史的异同

1、美国企业集团的成长历史

美国经济在 18 世纪 90 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可界定为传统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那时由于美国人开始横越大陆往西迁徙,交易总额大量增加,经济迅速增长。但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其规模和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单一单位的公司,活动方式依“看不见的手”进行。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铁路在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得以成为第一个现代工商企业。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开始,在美国的产业发展史上,发生了五次兼并浪潮,而正是这五次大规模的兼并,促成了美国企业集团的成长和壮大。1893—1904 年,兼并浪潮第一次开始全面冲击美国企业的产权领域,这一时期也是美国企业集团的创业期,最先从事联合与兼并活动的企业部门是铁路业。到 20 世纪初,拥有资产在 1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已近百个,它们占

有主要的钢铁工业、农业机械工业和农产品。1915—1929 年美国发生了第二次兼并浪潮。这次兼并的特点是纵向兼并,即兼并运动始于生产环节,之后延伸到原材料供应和加工以至产品运输,兼并的实质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模式。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的大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十分活跃,而且它们的触角纷纷伸向海外,这些大企业所拥有的多样化产品使海外市场也纳入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内。1954—1969 年美国发生了第三次兼并浪潮。兼并的特点是混合兼并,即:跨行业企业相互兼并,导致了大批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出现。混合企业的形成促使经营多样化和产品多样化。可以说,第三次兼并为美国经济的结构转化奠定了微观基础。1975—1992 年美国发生了第四次兼并浪潮。在这次浪潮的高潮期 1985 年,一年的兼并事件就达 3000 多起,平均每天达 10 起。1994 年以来,美国又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浪潮,全年兼并资产总额为 3419 亿美元。

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五次兼并浪潮,极大地促进了一批巨型、超巨型的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完成了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增殖,推动了产业升级和资产结构在社会范围的优化配置。从美国企业兼并的历史来看,最大的垄断性公司主要集中在食品工业、烟草工业、石油工业、橡胶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等部门中,并且在企业兼并的方式上,美国企业经历了一种由纵向兼并、横向兼并,再逐步走向集团化兼并的过程。

2、日本企业集团的成长历史

日本企业的成长环境与美国不一样,因此企业个体发展历程的时机、持续时间以及规模之大小都有显著不同。可以说,日本的企业集团是在战前财阀的发展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老式的财阀在当时已经具备了融资、市场、销售的经营形态。战后由于日本的银行资本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因此以银行为中心,促使了战后日本企业集团的迅速复活。从规模和知名度来讲,日本有六大企业集团,即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住友集团、富士集团、三和集团、第一劝业集团。这六大企业集团都是超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它们是日本经济的支柱,有的学者称这些企业集团为“环型企业集团”,因它们是由各大企业通过相互持股、相互交易所形成的。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通常都是由母公司拥有子公司所发行股票的全部或半数以上而形成的企业集团,此类企业集团在日本也存在,被学者们称为锥型企业集团。在日本,锥型企业集团分布在各行各业,例如金融、建筑、运输、旅游、商业、服务业、房地产等。正由于锥型企业集团内部存在的分包系列企业,使得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了美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种关系采取了不同其他国家的结构和方式。日本企业集团是在市场经济原理指导下行动的,但政府对企业界的启发和诱导,却远比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更深入,政府对企业界的劝告和诱导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政府的通产省来进行的。日本企业界与政府结合为一个官僚产业复合体组织,政府与企业界为了实现国家经济指标或某些必须实现的指标,而协调双方共同的行动;同时当面临日本经济的重要决策时,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渠道,以通产省为核心,由产业资本家、新兴财阀、政府部门、工会领导人等构成了官僚产业复合体制。这就是日本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最大特点。

(二)美、日企业集团追求经济效率方式的异同

对美国铁路发展战略具有重大影响的杰伊·古尔德,是美国19世纪末期的一个最强有力和最著名的投机商,依靠股票市场交易人的专业技巧,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一个美国最大的铁路系统。然而他的这种控制最后证明是脆弱的和短命的,因他并不打算协调、一体化或有效率地管理其各种财产的活动。(钱德勒,1977年)由此可见,企业在兼并后的成长中必须追求经济效率。美国与日本成功的企业集团都是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是两个国家的企业所采用的方式有所分别。

1、追求规模经济方式的美、日异同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方式上,美、日企业集团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大企业在第二次兼并浪潮中,主要进行的是纵向一体化,即垂直统合的发展历程,其主要特征是不断地把所需要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内部化,但发展的结果是企业组织机构过于庞大,使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降低赶不上内部管理成本的上涨,造成“组织的失败”,最终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下降上。(李非,1994年)

而日本的巨大企业集团,对所需零配件的获得方式采用的既非向自由市场上购买,又非完全自制,日本学者中村精(1983年)称之为准垂直统合。他认为,分包——系列是一种准垂直统合的形态,是位于垂直统合和社会自然分工和协作的中间。准垂直统合是否有效率地运营在于其支配从属关系是否顺利,这是以认同纵向的关系为前提,如集团的归属意识、忠诚心、集团内部的相互依赖等意识构造是准垂直统合赖以成立的基础。然而日本正是具有适合于准垂直统合展开的文化心理条件。

由于80年代世界市场需求朝多样化方向变化,使得大量生产方式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则是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而日本锥型企业集团所采用的分包——系

列方式,既能避免美国式的垂直整合所带来的“组织的失败”,又能享受市场交易的竞争性所带来的益处。因此日本的准垂直整合生产方式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李非,1994年)仅从制造业来看,日本式生产方式的代表是丰田公司。

2、多角化扩张的美、日异同

范围经济即是协同效果,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在企业所经营的诸项事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结性。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由多角化经营而成长起来的,但是在多角化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美国企业在第二次兼并中,所采用的多角化战略基本上都能获得范围经济性,在进行纵向一体化时,选择与本企业相关联的企业兼并。但在第三次及以后的兼并时,大企业不仅从纵向上,还从横向上展开其战略扩张,甚至还购买、兼并与其原经营项目毫不相关的企业,采用的是极度扩散型的多角化方式。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第三次兼并后所采用的多角化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风险,但是,由于各个经营项目之间不存在或者存在很少的联结性,难以享受范围的经济性。进入90年代后,在兼并浪潮中,一方面美国的大企业不断地收购、合并其他企业,另一方面,为发挥优势、精简机构,从而提高竞争力,大公司也在不断地调整其内部结构。例如,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业务过于繁杂,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在1996年决定一分为二,一个经营西屋的传统电力产品,另一个专门经营广播电视,同时,一些与主体业务无关的公司将被卖出,其中包括一些盈利可观的公司。

日本的锥型企业集团的核心大企业在进行多角化扩张时,往往选择与本企业有关联的事业领域,很少采用高度扩散的多角化战略。然而,日本有些企业在8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后期,对外直接投资中也采用了类似美国在第三次兼并中所用的高度扩散的多角化战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松下公司和索尼公司。80年代末,两家公司都选择了进军美国的好莱坞,以索尼公司

为例,在前总裁盛田昭夫的“跨部门协作经营”思想指导下,1987年收购了哥伦比亚录音公司,1989年花80亿美元收购了在好莱坞的哥伦比亚——三星公司,希望把娱乐“软件”与“硬件”结合起来。但这位日本的电子巨人却在美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1994年亏损达32亿美元。

诚然,从美国和日本本土发生的企业集团多角化扩张来分析,美国采用的是极度扩散型策略,日本采用的是集约型多角化策略。两者存在差异的原因是由于组成集团性公司的逻辑不同,以及美、日高级管理者的不同行为特性造成的。首先,与日本相比,美国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通过股票交易而买卖企业十分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企业的多角化扩张重要手段就是兼并。由于日本证券市场不发达,买卖企业的现象相对较少,多角化的道路更多是依靠大企业自己创立新的事业部、子公司,或者扶植一个新的伙伴,或者与环型企业集团内部的其他大企业共同投资新事业、设立合资公司等。其次,是美国高级管理者的短期行为迫使高级管理者们热衷于证券交易和股票操作,以便通过企业买卖在短期内谋求巨额的资本利得。而在日本,高级管理者有着长期行为,使其在热衷于经营事业中,发现新的、蕴藏着巨大利润的市场需求,为多角化扩张创造机会。

3、联结经济的美、日异同

在企业集团经济效率的四大范畴中,联结经济性最重要。所谓联结经济,是指企业集团的全部经营活动,皆以计算机为依托,形成网络,以使所经营的商品或服务附加上新的情报价值。

至80年代,发达国家中日本在追求联结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生产领域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以日本来看,在生产领域,主要是以锥型集团的核心大企业为首而建立的CIM(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系统,即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根据日本效率协会的调查统计,在1991年,日本制造业(仅限股票上市企业)中,已经建立CIM系统的企业比率为3.5%,正在建

设之中的企业比率为 33%，今后一二年内有计划引进 CIM 系统的企业比率为 17.3%，尚在讨论之中的企业比率为 20.4%。在流通领域，无论是制造业的锥型企业集团还是商业的锥型企业集团，近几十年来，纷纷依靠水平统合和垂直统合而追求规模经济，以谋求流通领域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众所周知，日本的雇佣制度与美国不同。在美国的企业里，从职工进入企业开始就长期固定于某一专门的职务或工种，而且其白领与蓝领的界限分明。在日本的企业里，职工没有长期固定的职务和工种，其结果是经由广泛采用的职务轮换制、在职培训等培养出熟悉各种工种的作业要领和方法的职工，即多能工。多能工制与机器的柔性发展相适应，使职工能从纵向和横向缩小或扩大其作业范围，富有柔性。可以说，丰田公司所创立的准时制和同步工程，是在 80 年代战胜美国的“秘密武器”。

80 年代前，美国的企业在泰罗－福特制影响下，生产系统只是硬件的柔性化，原因是劳动人事上难以实现柔性。但是美国人在 80 年代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省，他们学习日本的经验，他们认识到日本丰田经验的实质是压缩时间成本，但它无法解决企业内部其他流程的时间成本，特别是没能打破职能部门的制约，更无法涉及企业外部的时间成本，而要把所有这些时间成本放在一起，非要有庞大的信息手段。因此，整个 80 年代，美国投资了一万亿美元装备信息设备，重新构建公司。至 1993 年美国曾经落后很多的行业如汽车、机械、电子等，重新取得了竞争优势。同年，美国经济竞争力重居世界首位，而日本在雄居首位 8 年后落在新加坡后面。

在企业集团经济效率四大范畴之中，获得联结经济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信息化、软件化高度发展的 21 世纪，计算机的联结是实现速度经济的条件，也是企业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必要条件。在信息化方面，90 年代美国公司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相比之下，日本公司的信

息化只相当于美国公司 80 年代的水平。

4、速度经济的美、日异同

若将企业看成是一个资源转化的系统，则企业的经济效率不仅来自于资源转换的数量，即规模，还来自于资源转换的时间，即速度。美国的企业集团创业发展的手段之一正是追求速度。美国管理历史学家钱德勒在他的名著《看得见的手》中详细分析了上个世纪在美国物流和信息流传递的加快和加大（铁路、电报、电话）是如何促进了大规模分配的产生（大批发商、零售商），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扩大。钱德勒特别指出，机器并不仅限于代替了每个生产过程中的手工操作，机器还使这些过程结合起来了；现代化的大量生产与现代化的大量分配以及现代化的通讯和运输一样，其经济性来自速度，而非规模。

然而，在市场环境多样化、多变化的背景下，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是构筑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其核心是柔性和速度。这里的速度是指依靠加速交易过程而得到的流通成本的节约。日本的企业在因产品品种变换频繁而使生产准备时间延长的过程中，极力缩短从订货到最终交货的时间周期，从而在 80 年代获得了竞争优势。MIT 国际生产效率调查委员会在比较了美、日两国的厂商后，得出一个结论性观点，即：企业适应用户的速度，不亚于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是由从新的产品概念到产品定型，从而提供给市场的速度和适应市场变动而更新产品线的能力，或者说从接受用户的订货到交货为止的时间所决定。

80 年代，美国开展的“重新构建公司”运动，改变了传统的泰罗－福特制生产方式。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在引进日本的准时制、同步工程与计算机工程 MRP-2 相联接时，发现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由不同的部门按顺序依次完成工作程序和组织结构的方式必须重新设计。1993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脑和系统工程教授哈默和 CSC INDEX 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钱皮合写的专著《重新构建公司——企业革命

宣言》出版后,成为最畅销的管理论著。哈默和钱皮在这本书中写道:“200 年来,人们一直遵循亚当·斯密的精彩发现来建立和减少公司,即工业时代的工作应该把它分解为最简单和最基础的任务。在我们正进入的后工业企业时代,公司将要围绕这样的概念来建立和减少,将那些任务重新组合到紧密结合的企业程序中去”。

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大公司陷入亏损经营。当公司重新构建之风从美国吹向日本时,引起日本人的思考。1993 年,丰田工程部门进行了结构重组,根据车的类型分成前轮驱动、后轮驱动和四轮驱动三个工程小组,这个结构是向通用汽车的国内部分借鉴的,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零部件标准化、通用化,以降低成本。1994 年丰田公司削减了 20% 的车型,并对那些对用户毫无意义的质量要求重新审核并进行更改。在公司的变革中,发现自动化生产线起了阻碍作用,因为它不能灵活地适应变革。现在公司正在从生产线上拆掉一些机器人,目的是在管理变革中使生产能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

综合分析,任何一种追求经济效率的方式都是在一定的市场需求和社会的工业化水平背景下创造的,美国的泰罗—福特制当时适应了美国市场的需求,并且泰罗为首的

一批工程师们提供了大量生产的技术,从而获得成功;日本的丰田方式是在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下,结合美国经验和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所创造的,并且不可忽视的是当时有类似 CIM 的信息技术,日本也获得了成功。在 90 年代,美国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又创造了新的方式,其表现形式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例如“重新构建”、“团队文化”等,核心是以信息流重组企业。但其所要求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一是设备的信息化建设,二是人和组织的知识化建设,美国具备这两项条件。

中国成长中的企业集团如何学习美国和日本的经验? 完全照搬美国或日本的经验都是不可取的,发展企业集团、追求经济效率时,必须探索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学习的过程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认真研究世界发达国家企业集团的成长历史,分析各个国家的企业集团在追求经济效率时所采用方式的背景和条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出结论。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集团必须创出有中国特色的成长道路,才能爆发出巨大的经济效率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 李敏,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510641);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国不动产资本市场的 结构缺陷与政策选择

□高 波

不动产资本市场作为不动产金融领域的核心,是指由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不动产融资关系组成,包括中长期信贷市场(如个人住宅抵押市场)、中长期债券市场(如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不动产基金市场和不动产股票市场。没有不动产金融的支撑难以发展起一个发达的不动产业,而没有不动产业的发展则必将制约不动产金融以及整个金融业的拓展空间。

一、不动产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与功能障碍

近年来我国不动产资本市场虽得到一定发展,但从整体上判断,我国不动产资本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动产证券化程度很低,钳制了不动产市场的运行,限制了不动产及不动产证券的投资机会,阻碍了不动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不动产资本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不动产金融工具单一,交易规模小,不动产证券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动产资本的筹措渠道广阔,如不动产储蓄存款、不动产信托基金、债券、股票、不动产所有权证券、不动产抵押权证券等。但我国不动产金融工具仍很单一,不动产抵押债券和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缺乏,筹资渠道不畅,以及市场机制不健全,影响了不动产资本的供给,进而使不动产金融部门缺乏强有力的资本支持,不动产业发展的资本严重不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

动产证券化程度较高,可以有效地筹集不动产资本。以美国为例,1991年第二季度统计,仅抵押债券总额高达3.99万亿美元,不动产证券化程度很高。

仅就个人住宅抵押贷款来说,至少存在以下问题:(1)住宅抵押贷款期限短,我国住宅抵押贷款期限一般为5年,规定的最长期限仅为20年,而国际上通常达30—50年。(2)住宅抵押贷款额度小,全国各地银行规定的最高贷款额度为70%,但购房者得到的实际贷款额度不超过40%,而在国际上一般可达60—70%,最高达90%,以至100%。(3)住宅抵押贷款利率设计不合理,不利于住宅抵押贷款业务的发展。(4)我国个人住宅抵押贷款规模小,住宅贷款占国家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仅约4%,而香港达30%左右,美国个人住宅抵押贷款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0—40%。

2、不动产资本市场体系不完整,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一个完整的不动产资本市场,除了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来筹资外,还包括不动产抵押一级市场、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以及活跃的不动产信托基金市场。特别是以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和不动产信托基金市场更具特色。我国目前缺乏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和不动产信托基金市场,不动产抵押贷款的资本来源大多为短期小额的零散资金,而资金运用一般为相对集中的中长期贷款,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搭配,产生信贷资金周转困难和支付危机。由于缺乏不动产抵押

二级市场和不动产信托基金市场,不仅使不动产资本来源渠道狭窄,而更大的缺陷在于缺少了一种产权或债权转让的机制和场所,不能形成风险防范机制,因而缺乏规避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功能,使不动产资本市场没有活力。

3、不动产金融体制不完善,不动产资本市场运行的中介组织不发达。现行的不动产金融体制,不能适应不动产资金运转的特殊性,不动产金融的功能不强。在不动产金融领域,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不动产信托机构未得到发展,不动产合作性金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组织缺乏,不能形成不动产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不动产资本市场的适度竞争。

对个人住宅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机构缺位。由于个人住宅抵押贷款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其违约形式又有特殊性,随着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对保险和提供担保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在住宅抵押贷款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由政府充当无条件偿还贷款的保证者和保险者,适当承担金融机构的放款损失,以支持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而在我国则缺乏提供这种担保的机构,制约了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与不动产资本市场运行相关的不动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动产产权登记机构、不动产代理机构、不动产专业律师服务机构、不动产专业咨询机构等中介组织发育滞后,行为不规范。

4、不动产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我国尽管制订了有关不动产金融市场的法规,但尚未真正从法制上规定不动产金融组织的创立,规范不动产金融工具的发行和流通,保证不动产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至今尚未制定《不动产法》、《不动产证券法》、《不动产抵押法》、《个人住宅抵押贷款法》、《住宅银行法》、《不动产保险法》、《不动产信托基金管理办法》、《不动产受益证券管理办法》等,不动产资本市场的运行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

二、不动产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选择

现阶段,我国正在发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动产产业发展和金融业空间拓展的关键时期,因而必须在进一步深化城镇住宅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强不动产资本市场的培育,为住宅业及整个不动产产业成长为新经济增长点创造条件。因此,必须推行以下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先,制定和完善不动产市场的发展政策,促进不动产市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供求平衡。(1)切实推行“住宅实物福利进入货币工资,房租房价市场化,住宅消费商品化”的改革,实行住宅分配货币化、市场化。(2)坚持放水养鱼的原则,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土地价格政策,支持不动产买卖、租赁等交易,促进交易规模的扩大。如通过减免交易税、提供抵押贷款等措施培育不动产二级市场,促进存量不动产的产权流动。对于已经出售的公房,要积极创造条件上市。(3)政府对住宅产业进行政策扶持,重点支持经济适用住宅的建设。(4)实施不动产科技进步的战略,不断提高不动产产业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如在城市规划、住宅区规划、建筑设计、物业管理等领域都必须加速科技进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5)国家应把重点放在推进不动产市场发育、调控不动产价格和加强不动产市场的管理上。要加强不动产交易的监督,制止乱收费现象。同时要加强对不动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动产产权登记机构、不动产保险机构、不动产专业咨询机构等中介部门的管理和协调。

其次,开展不动产金融工具创新,加快不动产证券化进程。不动产证券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也是今后不动产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现阶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围绕不动产证券化,开展不动产金融工具创新。(1)个人住宅抵押贷款。在现行个人住宅抵押贷款方式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以下创新:一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将贷款利率参照某些利率指数定期加以调整,以减少银行和借款者因市场利率变

动而带来的利率风险。二是“追加付款”抵押贷款。在借款初期,借款人只需偿付少量的贷款本息,随着贷款终止期限临近,每次付款随之增多。三是“循环”抵押贷款。购房者在以住宅作初次抵押从第一家金融机构取得一定比例贷款后,可以用同一住宅作再抵押从其他金融机构取得一定比例贷款,但对购房者提供的贷款总额不宜超过100%。(2)不动产债券。目前,应不断扩大不动产债券规模,政府可以担保发行政府债券,不动产企业申请发行不动产公司债券,尽快推出抵押债券、不动产受益债券、不动产可转换债券等品种。(3)不动产基金券。不动产信托基金同时具备很高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而成为个人投资者理想的投资工具。我国正在建立住宅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数额不断扩大,但公积金的使用不当,收益偏低。如果按照不动产信托基金的运作方式,创立住宅基金,发行住宅基金券,并对住宅基金券的流通作出具体规定,这对于提高公积金的效率有益无害。(4)股票。股票是筹措不动产开发资本的重要证券工具。目前,我国不动产业发展迅猛,但沪深股市不动产股偏少,多数不动产发展商尚未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未能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来加快自身的发展。股市规模迅速扩大,不动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因而必须合理增加不动产股的份额。这对于稳定股市大有裨益,又可以促进不动产资本市场的发展。

再次,建立不动产信托基金市场和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完善不动产资本市场体系。(1)不动产信托基金具有面向社会大众、吸引小额投资者的资金,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基金管理人经营,基金券可上市交易,收益的大部分分配给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等特点,在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创立不动产信托基金可以由信托投资公司等

作发起人向社会发行基金券,所筹资金交予有投资经验的机构进行资本运营,分散投资于不动产项目。(2)建立不动产抵押二级市场,银行可以及时回收资金,是银行获得中长期信贷资金的重要途径,并提供了一种债权转让的机制和场所,形成风险防范机制,从而有效地规避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3)充分拓展和发挥沪、深股市的作用,进行不动产证券产品的流通和管理。并在适当时期选择若干中心城市建立不动产证券交易中心,逐步形成统一的不动产资本市场体系。

第四,健全不动产金融体制,适应不动产业和不动产资本市场发展的趋势。随着金融深化和不动产业的发展,要求建成一种职能清晰、运作协调、多元化、全方位、开放性的不动产金融体系。中国不动产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必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组织的功能,商业银行从事不动产信贷活动是其重要的资产业务,商业银行则在不动产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设立商业性保险公司抵押保险部,从事不动产抵押保险业务。逐步完善不动产合作性金融组织和政策性金融组织。如政府创立住宅抵押贷款公司从事纯政策性的抵押贷款业务,对个人的住宅抵押提供保险或担保,并充当无条件偿还贷款的保证者和保险者,适当承担金融机构的放款损失。此外,应在适当时期建立不动产银行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调控不动产金融的独立机构,类似于中央银行建制,相当于不动产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通过贷款、贴现、拆借等业务活动对成员金融机构融通资本,支持和管理不动产金融机构,促进不动产产权流动和不动产业发展。

作者 高波,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
(210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

□黄锦奎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决定世界财富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向一个比其更珍贵的无形东西——知识转移。一个以高新科技信息产业化为标志的“新经济”浪潮,推动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知识在这场革命中以无比伟大的历史力量掀开了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光辉一页,把人类带进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

什么是知识经济?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尽管一些提法不尽相同,但对知识经济的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知识经济是指区别于以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的新型经济,在本质上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高新科技为主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

按现代价值科学与价值转化论的观点,知识经济中讲的“知识”,就是把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价值高的物质的“窍门”,实质上就是价值转化工程。从这一意义上讲,知识经济中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价值转化工程,知识经济高级形态就是智慧经济。

被称为现代点石成金术的价值转化工程,就是研究价值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并应用这些特点与规律,如何运用“知识”(包括硬科学的现代高新技术知识与软科学软技术知识),有效地改造客观事物,以最小的代价促进客观事物的价值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的价值资源,提高客观事物的价值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门现代综合软科学。

价值转化工程自1992年问世以来,由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与探索,其学

科体系的丰富科学内涵不断凸现。有人认为,它将成为发展知识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现代智力工具,成为下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门急需研究开拓的新学科。

一、知识经济与新的价值世界

知识经济给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价值世界。

笔者在拙著《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和《价值转化工程》两书中,曾经谈到随着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新的价值世界的拓展,人们对“财富”这一概念内涵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对“财富”的观点变化,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能力的不断提高,不断满足人类物质精神文明需要而不断拓展的,也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

人类经历了四个经济时代,即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也有人把人类经济文明划分为劳力经济时代、自然资源经济时代与智力经济时代。在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财富是猎物、水果等,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是本能与运气,其知识基础是观察与经验。在农业时代,人类主要财富是谷物与家禽,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是季节、气候与劳动力。在工业时代,人类的主要财富是原料、商品,其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主要财富是知识,其创造财富主要因素应该是智能、智慧、网络、信息与高新技术。知识是知识经济的资源、资本、财富。有人认为,知识作为资本将导致世界财富的一次大转移。谁拥有更高的知识,谁就拥有更多的主宰权。有一种观念认为,奴隶社会的两个对立的阶级是奴隶与奴隶主,推翻奴隶社会的并不是奴隶,而是地

主阶级;封建社会的两个对立的阶级是地主与农民,推翻封建社会的并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是资本家与工人,就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讲,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按道理类推有人认为未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这是极端错误的。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毫不置疑,是掌握知识的工人阶级。

知识与传统的经济形态最大不同是: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科学利用。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所说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美国管理学权威彼德·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财富”。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知识经济一体化,即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与知识的产业化,它的结构特征是知识物化、精神产品产业化与物质文明的理念化。它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与迅猛扩展,推动第二产业不断升值,使第二产业价值爆炸性增长与扩展,推动第三产业迅猛增长与新兴产业群的崛起,从而使人类物质文明财富飞跃增长,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与高度。

知识经济是更人性化的高级经济形态,它的出现体现了人的本质价值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又一历史性的高层次飞跃,它给人类拓展了一个崭新的价值世界。在这一新的世界中,人的不同层次需要,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群体的、自我实现的、全人类的需要,体现着多姿多彩的价值。人们根据主体的真善美的价值准则,进行价值设计,创造丰富多彩的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的社会财富。人们将使自己的实践世界与思想世界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得到创造性的完美的统一。在这一新的价值世界中,人类社会只需要少数人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就足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多数人从事的是知识的生产,知识将成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人类物质价

值与精神文化价值在不同需要层次中可自由转化与流通;物质领域得到了高智能的开拓,一幅幅人类物质文明五彩缤纷的图画像魔术师般神奇地编织出来。代表人类整体价值与财富的“和平”、“环境”、“持续发展”的大价值,将使人类的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升华。“符号经济”与“虚拟经济”将使人类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享受人类高度文明的新境界。

二、价值转化工程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智力工具

知识经济为价值转化工程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广阔的新天地。

按价值转化工程的观点,人类有目的地从事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离不开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价值原则与真理原则。价值原则表明人类所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必须符合人类的主体需要,或者说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和需要去从事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使客体主体化。真理原则就是人类按照价值原则从事实实践活动的同时,必须真正服从于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特点与规律。正如著名思想家弗里西斯·培根所说“要支配自然,就要服从自然”。价值转化工程必须遵循这两个根本原则,知识经济也不例外。

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经济时代的资源观被“新资源观”所取代。价值转化工程有一重要的原理,叫做“有限无限原理”。它认为:人类所把握的价值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价值资源是人类面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存在的客观事实,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它的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制约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一份预测报告中,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警告:现在如果用简单方法计算,即把资源的埋藏量用每年的消耗量去除的话,估计还可用 500 年,如果按复利法计算,假定每年消耗量以平均 2.5% 速度递增,那就只能维持 90 多年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报告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自然资源日益紧

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自然价值资源的有限性,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价值资源的节约与充分地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层次,从深层次来开发新资源,从而以小的代价实现有效的价值转化。

“有限无限原理”认为:价值资源可以由有限向无限的转化。由有限向无限的转化首先取决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也就是人类识“宝”的能力与水平。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的能力却是无限发展的,所以说自然资源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限向无限转化又取决于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当今世界人类已把有限的价值资源通过现代的先进科学与技术及新工艺,通过价值转化创造了在300年前无法想象的充满巨大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繁荣与文明的世界。

美国经济学家沃伦·布鲁克斯写了一本书《头脑中的经济》,其主要思想是:真正的财富资源是主意,不是物质,人的头脑和人的想象力可以把无用的资源变成有价值的资源。“有限无限原理”认为,人类可以充分利用无限的软价值资源向有限的硬价值资源转化。从价值科学观点看,软价值资源是无限的价值资源一个主要部分,软价值资源的无限性决定了它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有效资源。目前,人们对地球上各种矿藏与动力等资源,哪个矿藏储量多少亿吨,哪个能源还够再用多少年,基本上已经勘察了解得比较清楚。然而,人们对于软价值资源——人类智力资源宝藏的认识与了解却十分肤浅。有人认为人脑智力已经开发了一半,也有人认为还没有1/10,还有人认为只有3%,尽管这些比例数字悬殊很大,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智力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地开发与利用。事实上,人类的智力资源远不是有限的数字所能够表达的,它们仍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委内瑞拉共和国智力开发国务部长路易斯·马查多1980年访问我国,在北京大学作过一次讲演,他说:我坚信人类将来的进步取决于人的智力开发,取决于它的智力挖掘。地球上

最丰富的矿藏是在人类的脑子里,影响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不是石油,也不是其他矿藏,而是通过人类智力如何利用这些矿藏,从而决定着人类的命运。(《桂林师范》1981年第1期,赵琪:《谈智力开发》)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社会智力征服自然力为前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1页)由此可见,人类智力是征服自然界与改造社会的动力与源泉,人类的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实现价值转化、创造社会财富的最有效资源,价值转化工程实质上是人类智力大开发工程,是知识经济的有效的智力工具。

三、现代价值科学与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为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化体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研究领域。

按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的科学技术体系分类方法,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由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十大学科。其中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体系范围。最初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家庭财产管理的问题。后来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讨论整个社会经济问题,才冠以“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家庭财产管理的经济学。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他一反传统思路,不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只重视对生产的研究,把研究重心转向消费、需求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并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这一转变才使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个别厂商行为以及这两方面行为对价值价格决定机制的学问。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与劳务,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本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于1936年写了一本石破天惊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传统的经济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国民收入等总量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宏观经济学体系,而该经济学所致

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帮助政府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四大宏观经济目标。至此,经济学完成了“从微观经济学至大经济学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最终得以巍然耸立。从苏格拉底至凯恩斯,再到写《丰裕社会》的加尔布雷斯教授,时间已整整过去了 2250 年。经济学这门学科由最初一些思想家的天才思想,发展到成为体系完整、论述严密、流派众多的“社会科学之王”。但是无论这门学科如何发展变迁,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仍是如何选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进行其合理分配。实质上只研究物质领域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问题。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N. G 曼休在其新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经济学十大原理,就是对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学原理的高度概括。而知识经济的出现,将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产生一场革命性变化,即从主要研究物质领域转向研究知识信息领域,从主要研究硬产业转向主要研究软产业,经济学理论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知识的增加的结果是规模收益递增,这将动摇着以往的一系列经济学原理,宣告了以物质资源稀缺性原理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大厦的局限性,从而使经济学发生一场根本性变革。

从人类科学技术文化体系学来看,我们从哲学高度概括各门科学的源头所在。哲学是研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问。世界观包括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包括真理观、伦理观、审美观)。与人类科学技术文化体系三大基础科学,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价值科学相对应。

哲学:世界观: { 自然观——自然科学
社会历史观——社会科学
价值观(包括真理观、伦理观
审美观)——价值科学

按以往的分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范围。但经济学实质,其根本目标是价值问题,所以经济学也应该属于价值科学。当然,价值科学包括价值转化学与价值转化工程,从知识经济本身角度,知识经济学应当属于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的现代价值科学

的重要学科。一个现代价值科学的新体系,必须包括一个以人本价值论经济学为基础,由多学科组成的庞大科学体系。研究建立知识经济学,从价值科学角度不失为一种全科学的正确方法。

四、研究价值转化工程与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应该加强研究。我们要积极探索知识经济的规律,发挥价值转化工程这一智力工具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的知识经济。

江泽民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盛发达的不竭动力。为迎接知识经济这一机遇与挑战,我们要加快建立当代科技创新体系,制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与科学人才,全面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我们应该围绕“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这一主题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研究;

(二)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价值转化学以及价值转化一般规律研究;

(三)经济学在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的地位、内涵与发展的研究;

(四)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的研究;

(五)价值转化工程在知识经济中的应用研究;

(六)西方知识经济的理论研究,包括“新经济”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新通胀理论、无通胀经济、新增长理论、数字经济理论、信息高速公路经济学以及知识管理理论等研究;

(七)知识经济的特点与规律和价值转化规律研究;

(八)知识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体系以及与现代价值科学体系相关关系研究;

(九)应用价值转化工程发展知识经济的研究;

(十)知识经济与人类发展的未来研究。

作者黄锦奎,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教授(518000)

『知识——制度』互动原理与中国渐进式改革

□ 曾凡清 黄建军 丁志铭

一、制度与知识: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

诺思在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分析的三大基石,进一步分析诺思的逻辑,不难发现,诺思对制度的重要性的阐述是建立在知识的重要性之上的,他提到了达·芬奇的手稿,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天才的设想,证明人的创造力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能将这些天才的创造力全部运用到经济建设中,经济的发展绝不会如此之慢。诺思指出,在创新活动中存在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如果产权得不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积极性只能靠一点零星的自发性。所以诺思认为,社会的技术和知识存量决定了生产的上限,而实际的产量还要受制度的限制。诺思将生产的成败都归结到国家,认为国家应对其负责。

从诺思的上面论述中,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知识——制度”模型。实际上,诺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之中的,他指出: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

诺思在早期著作中,更多笔墨都落在制度分析上。他在《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中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也是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托马斯,1989年,第1页)诺思将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的规则和制度发生了变化。诺思解释了现代化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发生于英国和荷兰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诺思,1994年)1624年英国率先颁布了《独占法》,而当时也很强大的法国和西班牙则因国王为筹措军费而允许行会垄断。以产权换收入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根据混沌理论,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会不断地

正反馈,循环累积到非常大的程度,如果把制度作为初始变量,则制度理论可以很轻巧地解释不同国家的差距,但是解释经济发展只用制度创新理论显然是不够的。解释经济发展不能撇开生生不息的知识创新之流,正是这股边际之流不服从边际收益递减,保证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的不断改善,使人们不再受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幽灵的威胁。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大令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即使在制度分析中,知识产权制度也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可以将制度和知识并列为经济发展的两大源泉,在解释经济发展时,新制度经济学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合理因素,给知识以重要地位,这是它成功的关键。这与作为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所用的分析工具还是成本——收益分析,交易费用的提出使得这种量化分析成为可能,博弈论也有助于制度的量化分析,这就使新制度经济学能进入主流经济学,并产生广泛影响。

在诺思看来,人类创造力是巨大的。知识已经在经济增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它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人类社会受制于各种悖论(选择了不好的制度)囚徒困境,因而处于低效率的状态。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也可从制度方面得到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用囚徒困境证明了“千年王国”的不可能性,而现实中大量不发达国家的存在也表明了制度对经济的制约。因此,在制度和知识二者之间,制度更容易成为“瓶颈”,制约技术的产生和有效发挥作用。

二、知识与制度的互动

知识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知识和制度具有相互作用。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知识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知识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知识创新。反过来,技术的发展和采用会促进制度的创新,制度的改变会导致知识增量的生产力的发挥。

在解释现代科学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时,很多西方学者都将原因归结于大学制度和实验室制度。现代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要靠制度化的、团体的努力,而不是靠一点自发的创造性。因此,大学制度和实验室制度促进了西方科学知识的创新,进而促成了西方的强盛。英国《独占法》的出台,使英

国在技术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从而使英国在世界经济长跑中领先了二个世纪左右。而长期领先的中国当时实行的是科举制度,这就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知识的发明创造,使人们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这种人力资源配置的错位可以解释为“李约瑟之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激励机制使我国在科学领域可以取得一些重大成果,但实用性的创新不足。改革以前及以后一段时间之内,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一直不高,这不能不说是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出现了“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局面。

下面我们重点论述知识对制度的作用,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当新制度经济学家探讨组织产生的原因时,往往离不开知识和技术的背景,组织的逻辑往往是:技术使大量生产成为可能,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同时产生了高额的交易费用,如果完全使用市场交换,交易费用将高得使技术的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好处消失。因而产生了组织,众所周知,科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段历史的考察显示技术对制度的作用。这段历史选自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这段历史生动地显示了技术对制度的作用,同时也显示了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在这本书中,钱德勒考察了现代大型企业的产生,技术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当生产和分配依赖于传统的能源——人力、畜力和风力时,由于这些能源不能产生庞大的生产量和交易量,因而不需产生大型经理型企业,不会产生重大的企业制度创新。1790—1840年间,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的运输以水运为主,其动力是马和骡子,而不是蒸汽。水运取决于季节、风向和天气,轮船只能用于河流、湖泊和港湾,不能用于海上贸易,90%以上邮寄路线依赖马匹,这些因素限制了商业的业务量。商业企业的利润取决于外部波动,而不是精确的成本计算,因而没有成本管理。

铁路及电报公司是美国最早出现的现代工商企业。它的出现有赖于蒸汽的使用。最早的铁路运输以马匹为动力来源,允许其它个人或公司利用其线路。蒸汽火车头取代马车之后,为了防止事故,车辆的调度必须由一个总部统一管理。随着铁

路技术的改进,它很快取代了水运,19世纪40年代,铁路修筑、路基平整、隧道开通及桥梁建造的统一方法均有所提高,T形铁轨也开始使用;到40年代末期,火车头已具备凸轮、水箱、驱动轮、转向滚轮及平衡杆等,这使得迅速且全天候的运输得以实现。同时,安全、准确、可靠的客货运以及机车、车皮、铁轨、路基、车站、调车房和其它设备的长期保养与维修,则有赖于相当规模的管理组织,这就需要雇佣一群经理在各地实施职能活动;以及任命中层经理来监督、评估和协调这些负责日常活动的经理的工作,这也意味着需要新的会计和统计程序,这些导致了美国最初的管理层级制。(钱德勒,1997年,第97页)

铁路不仅提供了现代生产和分配所不可少的快速和全天候的运输,它也提供了架设电报和电话线的现成通道,它导致了现代邮政系统的形成,并且经营了几乎所有的国内轮船航线。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造成了大量货物和讯息的迅速的、有规则的流动,而这正好形成现代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基础,从而导致管理它们的现代工商企业主宰经济生活。钱德勒写道:在分配方面,铁路和电报是造成现代大交易商出现的主要因素。这些大交易商直接向种植者、制造业者和加工者购买商品和货物,并直接卖给零售商或最终消费者。在制造方面,铁路和电报之所以使大量生产得以产生,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把制造一件产品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有关的过程集中到一家工厂之内。(钱德勒,1997年,第237页)这种集中又促进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上的创新。

技术因素决定了现代企业在各行业诞生的顺序。现代工商企业首先在流通领域完成,而生产企业还需要发明新机器和作业方式。由于技术要求的高低不同,大型生产依次在流体和半流体产品(如原油)的大量加工处理,金属产业和金属加工业中实现。

产品中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又促使生产商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这就导致了现代工业企业的产生。此时,销售商往往无法提供技术服务,无法适应销售。最初建立自己销售组织的生产者有两类,一类是采用了新的连续作业的机器的工厂,它需要大量而稳定的销售维持其生产;另一类是需要特殊销售和分配服务的工厂,如需采用冷冻技术和温度控制技术以分配易腐产品,或新型昂贵的复杂机器

需要示范操作、安装、消费者信贷等。

现代工业企业的产生促进了技术创新,并使之系统化,现代工业企业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组织后,能与市场直接接触,销售组织有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他们必须集中精力于改进产品生产过程,这就导致了第一批正式的工业部门的形成。(钱德勒,1997年,第36页)居于寡头垄断地位的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所采用的多分支公司结构,使得多样化策略制度化,从而促成了技术创新过程的系统化。

总之,现代工商企业乃是对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在组织上的反应。这些根本性改变乃是由于出现了新的能源及将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技术而成为可能的,它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钱德勒,1997年,第440页)

三、“知识——制度”的扩展效应与中国渐进式改革

以上的“知识——制度”模型可以使我们全面地认识经济史和经济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为一个市场过程,可以由“知识——制度”的扩展效应得到比较好的解释。

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具有分立的特点。哈耶克认为:这样,社会经济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问题……这是一个利用并没有全部给予任何个人的知识问题。(哈耶克,1994年,第4页)哈耶克特地强调了特殊时间和地点环境的知识,认为它们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财产。同时,这些环境经常变化,这种变化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知道,并且对企业的经营也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哈耶克批评了对这种知识的误解和忽视。

知识的分立一方面导致了事无巨细的计划的不可可能性和设计改革进程的不可可能性,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在人群中的不对称分布产生了交易费用。为使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之和最小,就产生了知识和制度的互动。其中,交易成本就是制度成本,而生产成本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在制度的演进中,如果出现了较好的制度,则知识与制度可步入良性循环,社会将建立扩展秩序;如果出现了较差的制度,则会出现锁入效应。这与我们前面的论断——知识起决定性作用,制度起关键性作用——是一致

的。

“边干边学”理论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知识,它可以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或阅读书籍来掌握它;另一类是实践型或个人型知识,它无法“言传身教”,获得它的唯一方式是每个人的身体力行。在改革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个人型知识。宏观上如价格体系,它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的居民的千差万别的偏好的基础上的。因此价格体系很难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个人型知识的存在决定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

哈耶克认为,在文化的演进中,自发秩序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协调人们的制度,它是在利用机会或应付环境不确定时,通过长期竞争形成的。通过竞争达到合作,就将形成扩展秩序。现代交换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非人格化。在人格化市场中,交换的双方彼此熟悉,是一种重复博弈,也容易达成合作,这在乡村中容易见到,而在非人格化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潜在收益,因此不合作的可能性很大。于是需要制度保障,形成扩展秩序。

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因为成功地引入了竞争机制,形成了扩展秩序。中国的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放权让利”属于渐进的产权改革。按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定义,产权是指对财产使用、转让和从未来取得收益的权力。“放权让利”虽没有改变所有权,但改变了部分使用权和部分未来收益权,而未来收益权是产权中至关重要的权利。在改革初期,改变所有权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不像农村土地,它不具备相对均质性和可分割性,不能分给工人。因此,“放权让利”是成功的渐进的产权改革的开始,改变部分未来收益权使国企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成为了竞争的主体,以后的“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使这种剩余索取权进一步明确,得到了法律的保证,到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开始与国际接轨了,国家的所有权原则上不干预经营权。

随后,管制的放松导致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竞争降低了各种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诱导企业技术革新和体制上进一步改革的财务压力,由此产生了良性的循环累积过程。

中国工业的“知识——制度”互动是在不同企业、不同政府的竞争下产生的。中国的生产企业既有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也有私

人企业,还有外商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装备、制度约束、成本水平各不相同,竞争产生的财务压力在它们的中间是梯度传导的。这样,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竞争不断进化,技术能力普遍提高;政府在财政压力和政绩的压力之下,管制更加放松,整个经济充满活力。以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例,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缺乏、技术设备差。但其报酬机制灵活,它可以利用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于是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乡镇企业的成本低,它可以模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设备和产品,甚至可以使用它们淘汰的设备。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也可以引进人才,分配大学生,还可以自己培养人才。有的乡镇企业还有自己的大学,如横店集团。有些乡镇企业还将总部搬到大城市,直接利用大城市的人才、信息等优势参与竞争。外资企业成本最高,它只能通过创新,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保持先发优势。而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国有企业遭受竞争,减少了相当于准租金的利润,而工资的攀比又增加了它的成本压力,加上其制度没有完全转轨,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减少。国有企业通过操纵政治杠杆获得政策性租金(如软贷款、财政补贴等)的空间受到限制,这迫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呈上升趋势。国企的低效加上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而证券市场则为部分国企敞开了大门,证券市场成了国企寻求政策租金的领域之一。证券市场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不少国企并没有因此转变经营机制,而是靠壳吃饭,等别的公司买壳上市,还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行为。

总体说来,上面所描述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的扩展之路,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体会到了个人型知识的价值,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校长为两家企业提供了一条信息,使一家企业的废料变成了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当时人们还弄不清这位校长是否应拿到高额的报酬,但随后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信息,从中寻找机会,全民经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计划经济中漠视个人信息的一种反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人也学会了超越家族的合作博弈,否定了“一个中国是龙,两个中国是虫”的论断,地方保护主义也慢慢被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博弈取代。

广东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思考

□湛 明

一、知识经济及其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特点分析

当知识经济时代叩响新世纪的大门的时候,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增长,人们深刻地感知到由知识经济产生的新兴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所不能比拟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将用较少的实物资源和土地、能源、矿产以及劳动力的投入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产出,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类财富的总量。因此,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是相对于依靠土地和种养殖业的农业经济与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发展的工业经济更为进步的新兴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切极限突然统统被打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第一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光纤和数字化技术的提高、通信与计算机成本的降低、软件产业的发展、信息网络的形成、虚拟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产业大幅度增长,互联网(internet)用户高速发展,在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中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第二是一大批被称为“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高技术产业成为世界性的主导产业。如计算机

技术、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原子能、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光机电一体化等。最近10年,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份额已占30%以上,教育、通信、金融等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部门中,高技术的比重更大,传统产业通过高技术的改造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从而导致投资转向“知识产业”,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本、原料、劳动力、能源等,转向依靠信息、知识和技能。第三是引起了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服务业已成为所有工业国家和地区增长速度最高的经济部门。它包括市场推广、产品设计、研究开发、教育、贸易、金融、仓储、通信等等。这些行业在三产业中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第四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知识阶层将成为社会主体。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知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变化上。据预测,再过10年,美国蓝领工人人数将从现在占劳动力的17%下降到10%以下,劳动力中知识型人员则从现在的32%上升到60%以上。

知识经济的形成,是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联的,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把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联系起来,通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为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发展动力,也就是寻求一种科技进步与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此过程相适应,正在形成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大型企业,有些行业寡头垄断的格局已经很明显,这也意味着我们已进入另一关键时刻,即要靠企业自身的知识创新参与竞争,占领市场,这也是朱镕基强调的科教兴国的应有之义。同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不会是企业制度的终点,知识的演进会对制度创新提出

新的要求,目前,我们尤其应该关注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将造成的影响。“知识——制度”互动中的创新向每一个人都敞开,中国能否继续扩展之路,这不能不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事。

作者曾凡清、黄建军、丁志铭,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200437)

责任编辑:谭湛明

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转化的最佳实现模式。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如下几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历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目前居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列地位的是美国。早在 1956 年,美国劳动力人数中白领工人就已超过蓝领工人。这是美国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其在全球率先出现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和社会结构根本性转型的标志。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低通胀下的高速增长,联邦预算赤字逐年减少,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产业等关键技术领域,美国至今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的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引进欧洲技术开始的。南北战争以前,美国也拥有一些发明和技术,但都没有超出欧洲的技术水平,更没有基础理论的突破。面对现成的技术,尽管直接引进可以节省教育投入和基础研究费用,但是美国还是选择了对外实行保护主义来扶持本国工业的自强能力,对内实行政策调控,加大政府投入促进教育科技的发展。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案,旨在促进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这些法案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促使美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近几年,美国以开发信息技术产业为龙头,1996 年对信息技术产业投入 2531.5 亿美元,占全球同类总投入的 41.5%,1996 年美国经济增长有 1/3 是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预计在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 90%。

2、在建立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转化的实现机制方面,德国选择了对教育和科技均衡投资的模式,由此促进了人口素质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的高教育含量,生产能力的高科技含量,必然形成教育密集型和高科技密集型的产出。

3、20 多年来,日本迅速崛起,除了众所周知的政府对教育的大量投入外,还有一个最显著的原因是政府对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较高。日本政府对企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投入主要是对高科技产业在税收、风险等方面给予相当优惠的政策,实际上等于政府的间接投入。虽然日本政府对企业科技投入只占科技投入总额的 11%,但产出率却高于美国。

4、爱尔兰是欧洲的软件之都,吸引着全球的外资投向,成为当今欧洲经济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其主要原因在于爱尔兰重视科技投入和发展教育,使近 20 年来,爱尔兰劳动者的素质大大提高。爱尔兰早就实行了免费中等教育,中小學生已普及电脑。因此,爱尔兰除了政府的政策倾斜,有利于吸引外资外,更关键的在于其科技普及率高、人的素质高,因而吸引了大量外资和高新技术的流入。

二、广东发展知识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分析

在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广东在工业化、社会机制、技术创新能力、社会知识化和资金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处于弱势,尤其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机制尚未健全,面临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挑战。但和国内许多地区相比,由于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具备了发展知识经济的相对优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经济承受能力。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依托是智力资源,但必须配以相应的资金和自然资源。也即必须建筑在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广东改革开放前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为知识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1997 年广东 GDP 占全国的 9.77%,居全国首位,人均 GDP 超过 1200 美元,出口贸易占全国 40% 左右。从总体上看,广东已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工业化水平相对更高一些,人均 GDP 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信息产业已成为骨干产业,标志着高新技术产业和社会知识化水平较高。因此,在珠三角地区发达城市实行跳跃式的、有选择地发展知识经济的相关产业已具备较好条件。

2、社会知识化水平相对较高。广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教育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 1995 年普及了初中教育,拥有 41 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 17 万多人、成人高校学生 13 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2 年广东从全国各地吸引了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126 万人,目前全省中专以上学历人才 263 万多人,增强了广东知识技术创新能力。

3、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大。发展知识经济实际上就是发展产业化的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项目,同时既有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又具备对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的创新能力。广东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 39% 以上,1997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 1200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值 12%,其中深圳达 35%,珠海达 22%。全省专利申请量及批准率位居全国首位,全省新产品试制有 20% 以上是专利产品,专利已成为高技术开发的重要来源。

4、信息产业起步早发展势头好。广东 1997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 912 亿元,增长 34.9%,占全国信息产业产值的 1/4。全省初步建成大容量光纤传输网络系统,同时以微波和卫星通讯为辅,基本形成完整的立体传输系统。计算机数据通讯网络在全省各大城市中的经贸、财税、科教、交通、城管等部门中广泛应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5、广东最早拥有全国多媒体教学软件制作与培训基地,为现代教育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实验场,有助于加快广东教育现代化的步伐。1995 年,国家教委批准在广州华南师大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制作培训基地。目前,该基地已建立起一套功能较为齐全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拥有较先进的多媒体教学网络系统和多媒体软件制作设备。几年来,该基地在全国教学方法和手段现代化研究和实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广东发展知识经济还存在着以下一些制约因素:第一,近年来,广东工业化进程速度放缓,产业结构

调整难度加大。广东工业目前已形成买方市场,企业重复建设严重,边际效益低下,技改投入逐年下降。企业技术创新仍然受到机制的约束,致使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和产学研结合不灵,一般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形成市场竞争的能力。第二,尚未完全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表现在:(1)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的领导机构。(2)缺乏权威的、行之有效的产业技术政策。(3)政府关于科技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协调不够。(4)政府职能有待规范。第三,科研开发能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后劲不足。目前广东科研经费仅占 GDP 的 0.3%,科技活动经费占 0.9%,与广东 GDP 在全国的份额极不相称。在大多数企业,科技队伍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只能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缺乏开发高新科技成果的能力。第四,广东科研机构适应市场的能力仍然较差。广东省内许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提供的科技成果的成熟程度较低,实验室的成果搁置现象仍然存在,缺乏商品意识。第五,缺乏高新技术和尖端科学人才,人才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据统计,广东目前每万人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为 202.8 人,全国平均为 206.5 人/万人,而北京为 1379 人/万人,上海为 919 人/万人,既大大低于三个直辖市,也低于东三省和江苏。人才结构与素质未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广东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广东应抓住契机,充分利用时代给予我们参照与选择的机会,在相对紧缺的能源、资源和相对脆弱的政策和生态环境下,找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营造知识经济发展的环境优势,承接国际知识经济的辐射,带动、促进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加速工业化进程;力争到 2020 年左右,建立起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创新实力和科学基础,努力在高科技前沿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科技发展新机制。根据广东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优先在有条

件的城市和地区,发展知识经济的相关产业,走跳跃式的发展道路,来增创广东的新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当前,应从如下三大方面着手:

(一)逐步建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的运行机制

1、继续建立和培育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一是要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明确企业的产权关系,通过股份制等方式改造理顺各种产权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二是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产权市场,使产权和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合理流动,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成果转让和成果应用的巨大动力和压力;三是要繁荣技术市场,拓宽技术交易的领域,多形式地发展技术贸易,建立健全技术贸易经营服务体系、法律保障体系、管理监督体系和资金支持体系,促使技术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保证成果转化主渠道的畅通。

2、建立和完善新型科技宏观管理体系。首先,要在现有的科技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组建由科委、计委、经委、教委、农业厅等部门领导共同参与的综合领导决策机构,对科技转化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共同研究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促进科技力量的联合和集成。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多种职能作用。第三,在建立产学研联合开发基金的同时,要组织力量,把广东省较重要的和新近开发完成的科技成果收集起来,从中选出效益好又适合广东的转化项目,向企业推荐,并投入部分资金,扶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切实地负起“放水养鱼”的责任。要建立产学研工程示范点,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从而形成良好的成果转化机制。

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调整广东省的科研机构体系,改善政府对科研机构的管理方法,从组织结构和宏观管理方面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首先,要进一步改善科研环境,迅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科研技术创新动力机制。通过创造条件和制定政策鼓励科

技创新、鼓励科技冒尖、鼓励多出成果,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形成强有力的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的关键。第二,推动科研机构从事业型向企业型转轨,逐步实现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按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科研机构,创建股份制的科(技)工贸一体化的企业,要明确其产权关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第三,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支持他们到生产单位兼职、挂职,要创造一个有利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进行交往的良好环境。第四,突出重点,选择一批对广东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项目进行联合攻关,开发高技术成果,并进行大项目的转化和成果推广,要通过实施有关科技计划,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同时,要重视形成规模效益,对已有的技术优势、潜在的优势、具有发展前景的技术,要加强政策的优惠力度、资金的投入强度,促使更多的科研成果出现。

4、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对科技的需求机制,真正把企业培植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主体。(1)大力扶植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把政府技术开发投入从“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企业自身的依托。(2)营造具有强烈的科技意识和较强鉴别力的职业化企业家队伍。(3)增加政策投入,发挥利益导向作用。对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科技转化工作的创新者,要加大奖励力度和利益倾斜。(4)对企业的落后产品或技术实行淘汰制度,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制定技术开发战略。使企业树立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究一代、设想一代的循环思想,产生依靠科技进步的强烈愿望。

5、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中间环节,疏通转化渠道。(1)要大力发展技术、信息和人才市场,进一步加快上述市场的网络建设,要建立省级信息库,力争用较短的时间解决建库、规划、信息库运行机制与省内外联网运行问题。(2)要支持和加

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创办中试基地和工程技术开发中心,提高科技成果向产业化、集团化转化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3)建立科技成果推广与产业化项目的科学评价体系。以便于购买方及时确认科技成果的潜在价值,及时作出吸纳及投资意向,以加快科技成果价值的实现。(4)制定促进成果转化的法规和政策,以此来规范技术交易行为,保证技术贸易的公平和公正,使成果转化各方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5)健全技术市场,形成经纪人交易制度,保证成果转化主渠道的畅通。

(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高新技术产业

1、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广东经济新的增长点。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大力研究开发高技术并使其商品化、产业化,尽快形成大的产业规模,促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开辟新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根据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和智力资源、自然资源分布状况,发展高新技术应当立足于现有基础、突出重点地区和重点技术领域,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为龙头,以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为基础,以出口创汇型高新技术产业群为重点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高技术经济格局,因此,广东应尽快从现有科技基础着手,在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高级精细化工产业、轻纺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与环境保护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展开攻关,先在技术上突破,再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以此推动广东整体经济的发展。

2、加速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以高新产业为龙头带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发展高科技产业有两个途径可供选择:一个是通过上新项目、建新企业来发展高科技产业,一个是利用原有企业来发展高科技产业。广东从实际出发,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要重视现有的企业和产业的高科技投入,

要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制、改组的同时,加大用新技术改造的力度。另一方面,要继续创办若干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广东已有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今后要继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要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产业带,在适当的时机,还要继续加大投入,创办更多的、范围更广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和产业带。

3、发展广东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要注重消化吸收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更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过去,我们发展的重点放在引进上,今后,要使广东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光靠引进是不够的,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这应该是广东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发展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每年都要淘汰30%的现有产品和技术,只有不断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研究开发出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建设强大的民族高技术产业,才能减少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度,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使广东的高科技最终挤进世界先进行列。

4、以市场为导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通过培育、发展高新技术消费市场来拉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商品化、产业化,其最终目的在于市场化,因此,必须重视市场、重视需求。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必须依赖于在激烈竞争中渴求生存发展的企业。高新技术一般具有高效益,但同时也有高风险,对于未完全熟悉市场规律、效益状况欠佳的广东企业,一般是不敢轻易去投资有一定风险的高新技术项目的。因此,必须建立高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风险基金及风险投资机制,由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从而增强企业对高新技术的需求。

5、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看,在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比例中,开发比研究费用要高5—10倍,产业化投入又比

开发费用高 5—10 倍,目前广东的研究发展费用仅占 GDP 比重的 0.3%,而发达国家为 3—5%,如此有限的费用,要开发高新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科研开发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自身也加大投入。

(三)加快广东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人才队伍

1、办学体制向多元化发展,通过各种途径加大教育的投入。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1985 年各国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5.7%,其中发达国家为 6.1%,发展中国家为 4%,而广东多年在 3% 以下徘徊。教育投入的短缺,使教育投入的结构难以达到平衡,投入效益差。今后,应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5.7%),使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办学体制向多元化发展,广开财源,大力吸收社会力量办学。

2、深化教学改革,要重视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切实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培养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1)在教学内容改革上要克服学校教育不同程度地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滞后现象。吸收中外教学实践的最新成果,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2)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上,要真正改“填鸭”式为启发式,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等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发展,利用互联网远程教学开辟第二课堂,扩大学习知识面,使学生富有创造性和多样化的完善人格,从而达到主体潜能充分发挥。(3)缩短中小学学制,尽快普及高中教育,将职业教育融入中学阶段完成。通过教材更新,提高教学质量,早出多出快出人才。(4)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完善学分制、选课制、主辅

修制、双学位制、工读交替制、学士硕士连读和硕士博士连读制等。

3、应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高等教育结构。(1)调整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2)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扩大高校的办学规模。(3)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的多元化、开放型和多功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专业结构上进行调整,重点发展工科教育,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科比重约为 2:8,基础学科与工科比重约为 2.5:7.5。(4)配合发展知识经济的高新产业需要,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可借鉴韩国和台湾 80 年代产业调整升级的经验,采取与发达国家合作培养的模式,选派应用性学科具有一定造诣的博士生到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所和实验室留学或合作科研,使他们既对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有深刻了解,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水平,从而对广东未来科技发展提出新的思路。

4、改革高考制度,逐步过渡到实行“开门进,关门出”的大学入学方式。大力兴办各种成人教育,推动终身教育制度。目前,应着手先行改革高考制度,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待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最终取消高考,实行“开门进,关门出”的就学制度。这是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最终途径,是教育的根本出路。今后在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获取途径方面,均可尝试采用多种形式,如某一领域有独特建树的专才,可通过论文答辩或成果鉴定,获得相应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而不用参加考试。这样,将最终解决教育的规模化和效益化的问题。

作者湛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助理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韦 前

所有制结构的演变逻辑及当代尝试

□ 陈甲优

作为人类社会财产权力体系集中表现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定的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因素。当我们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中国未来宏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基本解决,现在面临的必然是如何解决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即所有制改革问题。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对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优化的当代尝试作深入探讨,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方向。

一、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个社会的所有制性质不是单纯人为的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人们有权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依据特定的所有制结构优化标准,这似乎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的背后,隐含着必然,隐含着生产力强制为自己向前发展开辟道路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社会形态的更替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同样,一种所有制形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也是不会消亡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如果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取代旧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将成为必然。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完全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推动经济运行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表现为以

行政权力为纽带的控制权和调动权,企业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执行上级指令,没有什么独立性和自主权可言。在这种体制下,必然要求单一纯粹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竞争性经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表现为以财产占有的基础增值收益的权利,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牟取利益主体,就必须独立决策和运行,这就客观上要求对原来单一纯粹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因此,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是客观要求同主观选择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为:

1、自发性变革与引导性改革相结合,充分利用自发性的积极作用和原始基因的创造精神。我国从解放初期至目前所采用的公有制形式,一直处在不断实验和不断筛选的过程中。在“三个有利于”标准面前,只有那些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才有存在的理由;而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形式,就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由各自市场主体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发地进行所有制的变革。

自发性变革为新的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和成长提供原始的基因和自然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新的所有制结构的成长是与经济发展对新结构作用条件的成熟相联系的,比较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避免了人为的干扰和扭曲。自发性结构变革由于是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以分散的决策为基础,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改革目标相一致,有利于促进市场的发育。从原则上说,自发性变革只有在变革的预期收益大于变革的成

本时才会发生。

2、局部推进与整体转变相结合,充分发挥局部渐变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无疑是一个整体过程,需要整体推进。但是,整体推进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各项改革措施要同时展开,新的所有制结构的各个要素要同时引入,应采取由易到难、逐步过渡的战略,不一下子打破旧的利益结构,不正面触及所有制的深层次问题以减少摩擦成本。

局部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必须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维护秩序,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在理论上破除一些束缚所有制变革的传统观念,自上而下地推动变革,减少改革的阻力,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选择比较有利的制度模式和改革路线,尽可能少走弯路。

3、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公有经济的变革引导作用。所有制结构变革的重要特点就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相结合的改革逻辑,即不是通过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而是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并在同时逐步改革国有经济来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非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存在天然的一致性,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市场为导向,以竞争为动力,不存在政企不分和“铁饭碗”、“大锅饭”等弊端,因而,体制外的发展是市场化的重要动力,所有制结构变革从体制外入手改革显然比体制内更容易。

从增量部分入手发展非国有经济,目的是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避免经济体制的严重破坏、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和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体制外推进的结果,非国有经济大量存在,对市场竞争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而市场竞争的形成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迫使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活动,改革内部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

二、所有制结构优化的当代尝试

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实质,而且它肩负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多重使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是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进行的,具有多样性、交错性和渗透性,既不是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也不是单一地顾及微观生产效率,而是看这种所有制结构能否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经济效率,能否最大限度地改进社会福利。

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与改进,仰赖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最优。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所有制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结构及发展要求,是否有利于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也愈高。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之中,各种所有制形式都具有各自相对的效率优势。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形式的优势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结构相联系,如果硬把某种所有制形式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惜以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上的巨大损失为代价,那无疑是本末倒置了。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应当是一个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所有制成份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决于这个所有制结构系统功能的最优化。这就要求我们应把各种所有制结构看作是彼此相关、交互作用、组成一个有序的统一体,而不应当局限在某一种具体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上,人为地将各种所有制成份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其个体的作用,并用一种所有制去排斥另一种所有制。因此,尽快转变思想观念,确立起所有制结构的整体观、开放观和竞争观,并在当代改革的实践中,努力寻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极大地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开放的所有制结构形式。

1、建立开放所有制结构体系,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是封闭性的板块组合,其特点是每一种所有制都相对适应于国民经济的一块,整体的国民经济被不同

的所有制分割为孤立的板块,各板块之间各自独立、相对封闭,国家根据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板块,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管理办法。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就是要鼓励和支持各种不同成份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打破行业、领域的界限,使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形成共同互动的联系。

2、不同所有制结构形式相互补充,以实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的客观要求。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有其强点和弱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国有经济,容易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的规定运行,因而对于保证完成国家的某些特殊任务,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和协调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国有经济应当成为国家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掌握国民经济的大方向。但公有制经济中利益的刺激和约束不强,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不够灵敏,其微观经营效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公有制经济有巨大的宏观社会效益,但如若其微观经济效益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积极性,削弱其宏观社会积极效益,使国家的宏观能力减弱,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与公有制相反,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由于经营者的利益与经营风险联系较为紧密,它们的财产约束关系也相对较强,因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比较灵敏,经营也更灵活多样,在微观经济范围内往往有较高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当然,非公有制经济固有的自发性作用,它们的经济活动同国家的共同目标不易协调,它们的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也容易发生矛盾。特别是私营经济中存在着劳资之间的利益对立,容易造成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损害社会的公平。在现存体制下,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有其强点和弱点,因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可以促进公有制经济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使非公有制经济更注重社会利益,从而使它们各自的强势和弱势得到互补。互补性效益的发挥,取决于

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比例,取决于宏观效益最大化的要求。

3、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的竞争,有效地促进各所有制功能的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中成为可能,每一种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仅仅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且是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而独立存在了。

竞争就其本质来说是优胜劣汰,这种优胜劣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的竞争,应当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管理、有控制的竞争,尽可能地减少竞争的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状态,从而减少竞争会带来的资源浪费的消极作用。

所有制结构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优化,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竞争来实现:一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竞争,二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三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从所有制结构配置的角度来看,第三种竞争是最主要的竞争,缺少这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竞争,各具体的所有制在经济运行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而相对孤立,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都可能是效益低下。相反,各种所有制经营主体展开公平的竞争,不仅使非公有制形式的企业更具效率,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增强公有制经济的生机与活力。总之,有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竞争对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而且有利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发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作者 陈甲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510053)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 社 会 现 代 化 与 青 少 年 教 育 网 络 化

青少年教育是引起党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网络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一种创新形式。本文结合中国现代化的需求和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探讨网络建设的科学性及其价值。

一、网络化——青少年教育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青少年教育的网络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的新趋势。

其一,社会变革复杂性的影响

当代中国经历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全国上下一致追求的目标。然而,“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①并且,“所有复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普遍都卷入多重角色”。^②这样,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因素日益复杂,导致青少年的思想与行为亦越来越复杂。教育工作就难以依靠单一途径获得成功,而必须运用多因素组成的网络实现教育的效益。如教育工作者经常讨论的“5+2=0”问题(即五天的学校良好教育,受两天休息日不良家庭风气、社会风气影响而抵消效果),就必须与家庭教育网络、文体教育网络、社区教育网络共同合作,引导青少年在充当不同角色、参与不同活动时都自觉接受正面教育、抵制负面因素,才能真正寻找到解决办法。必须看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决定它在整体上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夹杂负面的冲击,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也是利弊兼

存。青少年教育网络互相配合,一些系统激励积极因素的成长,一些系统抑制消极因素的滋长,才能营造对青少年健康发展有利的社会环境。

其二,市场经济分化性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分化性与整合性的不断交替。基于市场交换、市场竞争、产品创新、企业盈利的需要,经济组织、管理机构不断分化调整,以保持生机活力;同时,各种横向联系、集团联合、企业合并等趋势也出现,以追求规模经营效益和垄断竞争优势。因此,青少年成长也受到这种社会上分化与整合的波动性影响,思想发展变化不定,知识技术不断调整,行为模式经常改变。当然,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没有采取剧烈变迁的方式,而是保持适度的弹性。“体制的适度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可以使蕴藏在无数人内心深处的生存发展冲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产生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往往低估了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它给体制的适时调整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让时间和实践去修订和弥补理性设计的欠缺。”^③这样也是给青少年教育网络建设留下过渡与调整的余地。一方面,青少年教育充分发挥传统党政重视、齐抓共管的优势,把群众性思想工作、社会性教育活动的长处继承发扬;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组织网络发展、市场交换网络发展的趋势,把青少年教育网络延伸到各行业、各部门、各社区,并且依据现实变化而不断分化与整合。

其三,人的发展全面性的影响

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对青少年的素质提出不同于过去时代的要求。传统

社会的青少年,按照单一角色发展的需要而塑造基本的素质。如农村青少年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想当官的青少年学习儒家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只有少数开明的富家子弟才学习工业技术和经商知识。解放后,由于单纯强调政治进步,青少年除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外就主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那时,虽然是各行各业都关心青少年成长、支持青少年教育,但教育内容主要是提高政治素质。改革以来,青少年面对的社会环境不同,其理想抱负也变得丰富多样。我们可以从调查资料得到启发。

表一,香港、广州、北京、深圳青年“未来五年最大的愿望”调查数据。

项目	香港 (533人)	广州 (500人)	北京 (505人)	深圳 (419人)
多赚钱	17.0%	18.0%	19.2%	18.9%
事业成功	19.0%	38.8%	38.6%	46.5%
学业有成	22.9%	20.6%	16.3%	3.2%
家庭平安	1.5%	0.3%	5.3%	6.2%
有理想伴侣	1.2%	1.8%	3.0%	2.6%
生活快乐	6.7%	3.4%	4.1%	11.0%
身体健康	1.0%	2.3%	11.2%	8.4%
其他	13.6%	8.4%	0.5%	0
无愿望	9.5%	1.2%	0.2%	0.5%
说不清	7.8%	5.0%	1.4%	1.9%

资源来源:香港、广州、北京的数据引自香港青年协会出版《京穗港青年比较调查主题一:个人与社会》合作调查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等单位。深圳的数据引自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学系主办、本文作者主持的一项调查。

现代人的发展具有全面性,其利益需求具有丰富、多样、灵活的特点,使得青少年教育改变单一智力培养或政治塑造的模式,转向综合素质的提高。国家教委近年多次强调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但是,综合素质教育并不是单由哪个部门重视就能够实现的,而必须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青少年教育工作网络,就是根据青年发展的全面性特

点,调动有关部门、行业的积极性,使综合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其四,教育服务系统性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复杂和多样,决定了各项工作都要有系统性的思维。青少年教育是影响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习惯及深层心理变化的持久性工作,必须由社会多方面组成的网络支持与配合。教育专家曾指出:“考虑到社会系统对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建议建立这样一种模式:社会系统中的所有成员——家庭、教育工作者、同学、社区成员——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要互相予以厚望、又互相承担责任。建设性的交流和合作方式非常重要。”^④况且,涉及青少年综合素质提高的全面性教育活动,更是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多单位的共同作用。首先,教育效果受到系统诸因素的制约。学生的智力培养需要社会的重视与开发;青年的技术教育需要企业的重视与发挥;少年的生活技能教育需要家庭的理解与配合;青少年的文明教育需要社区提供宣传资料等。其次,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协调、支持,往往产生更佳的效果。如汕头市直属机关开展“助长行动”(即支持青少年教育、帮助青少年成长的活动),市里的各部、委、办、局由199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开放一些单位内部的活动场所、资料中心,供中小小学生开展活动、组织学习,其中穿插各行各业的知识教育,取得良好的成效。同时,汕头农村的村庄,在村的小学里建立起“村青少年文化活动室”,借助学校拥有的音乐、美学、体育及其他专业教师优势,利用学校的场地,在闲暇时间开展青少年活动,受到大家的欢迎。因此,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的互动是客观存在的,积极地进行引导就能产生良好效益。建立教育网络,就将系统涉及的多部门、多行业联系起来,形成合力,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青少年教育网络的结构

从各地区的实践看,青少年教育网络的建设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将对青少年成长有影响作用的各种部门、单位团结起来,互相

配合、共同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人才。

第一,建立指导核心。有些省、市、县成立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或青少年德育领导小组),由主管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主管的市委常委与文教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任副组长,十多个有关部门的厅局长(或副职)是领导小组成员。这种机构设置,在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青少年教育工作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后来,在1994年前后的机构改革过程里,许多地区取消了这一机构。近年来,有些地区的领导发现青少年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而且是关系社会未来前途、需要社会共同努力的问题。正如汕头市委书记许德立同志所说:“如果全市青年的素质都有一个大的提高,具有正确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又具备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那么我们就能经受住21世纪的严峻考验,实现汕头的全面振兴就大有希望。”^⑤因此,他们就恢复了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的设置,并以这一机构作为指导青少年教育各个工作网络建立及开展活动的核心。

第二,横向网络联系。过去许多地区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其工作在组织几次大的活动之后往往流于形式,较少办实事、出实效,关键在于是一个虚设机构,缺乏长期的工作联系。如今,根据实践需要而建立的青少年教育工作网络,其特点一是落实各部门对青少年的教育责任和工作任务;二是充分发挥各网络的自主性,鼓励网络操作者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活动;三是容易形成相互促进氛围,使各网络之间竞争,多做工作、多出成绩。广东省汕头市建立起青少年家庭教育、青少年学校教育、青少年文体科技教育、违法青少年帮教、外来青工教育服务、青少年维权法制教育、青少年卫生保健教育、青少年国防教育、老干部关心下一代、青少年教育研究等十个工作网络。^⑥湖北省襄樊市农村则建立起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农村干部培训、党员团员教育、广播电视教育、文化娱乐教育、报刊书籍学习、电影放映教育、

通讯报道教育、成人业余教育、科技普及教育等十个网络。^⑦这样,每个网络都明确自己的教育任务与内容,在此基础上设计日常教育的措施和重点教育活动,逐渐产生成效。

第三,纵向网络延伸。一种方式是要求县、镇相应成立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建立青少年教育网络,使省、市的教育设想通过基层网络具体实施。另一种方式是在镇、村建立青少年教育与活动中心,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活动将青少年吸引过来,再逐渐充实教育内容。再一种方式是建立社区教育与服务网络,即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由政府、学校、社区共同设计青少年教育活动,如公民教育活动、社区管理活动、义务服务活动、社区形象宣传活动等,使青少年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提高素质。总结过去青少年教育的经验教训,最突出的问题是上级非常重视、下级无暇顾及,上面热热闹闹、下面冷冷清清,从而使青少年教育无法落到实处,最终将责任推回给学校。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探索的重点,就是怎样将教育网络延伸到基层、到社区,如建立各种家庭教育小组、社区热心教育小组、兴趣活动小组等,逐渐取得成效。

第四,无形网络拓展。这是通过大众媒介、民间舆论及其它渠道,为青少年教育工作扩大影响、增强效益。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促使社会各方面的工作方式都要发生相应变化。青少年教育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关心的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都反复强调青少年健康成长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性。但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的战略思想通过组织贯彻、行政渠道就能够落实;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形发生变化,单纯运用行政途径开展青少年教育工作遇到困难,只能在短期内取得轰动效应,很难长期、持久和逐步完善。因此,各地区由党政力量促进下建立的青少年教育工作网络,也必须通过社会传播的方式,逐渐影响和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之中,使帮助青少年成长、发挥青少年积极性成为社会风尚,才能长久

取得成效。首先,必须借助大众媒介的作用。通过大众传媒的反复宣传,运用生动形象的影视作品去普及思想,就会使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接受青少年成长的目标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为青少年教育服务。其次,充分利用民间舆论的影响。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人人关心青少年利益与成长的风气,通过无形网络使得社会出现鼓励为青少年教育做好事、抵制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因素的趋势。再次,发挥文化习俗和传统规范的积极作用。在清除传统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注意,中华传统亦有许多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因素,它也是无形网络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选择文化习俗中的有益成分,融入青少年教育的网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五,协调反馈机制。现代化的教育网络,其协调机制、反馈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建立各部门、各行业、各级机构参加的青少年教育网络时,必须由其中的宣传部门、共青团组织、教育部门共同组成协调、反馈中心,具体机构就是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其功能:一是制定青少年教育实施方案,供各网络参照执行。二是调节各网络的教育活动安排,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三是广泛收集青少年教育网络工作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研究,探寻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途径。协调反馈机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研究,既分析青少年的心态变化与需求变化,力求帮助教育措施有针对性;又研究各网络的运行特点、作用发挥情况,指导有关部门不断改进教育方式。

虽然在目前教育网络的建设仅仅是一种试验;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与教育的改革,在传统行政指令性教育权威相对减弱的同时,利用社会网络支持青少年教育的趋势会日益明显。我们认为,为了完善青少年教

育的网络,必须重视几项工作:一是制定青少年发展规划,为青少年的成长确定总体目标和阶段性要求,使教育网络的工作安排更加科学化。二是稳定青少年教育机构,包括国民教育部门和青年工作部门,同时提高其工作效率,注重发挥社会经济效益。三是设计青少年综合素质教育内容和系列活动方案,使各网络在开展工作时得到指导、可以参照,能够取得更好的实效。四是建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评价体系,设置具体的评价项目,对各网络的教育工作定期检查、评分,年终进行总结表彰。当然,青少年教育网络的建设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思考、在探索中完善。

①【美】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比较现代化》第45页,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第30页,梁向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③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第189—19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瑞典】贝肯罗斯:《青年——明天的领导???社会在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未来教育质量提高方面所起的作用》,解其刚译,载《未来教育面临的困惑与挑战》第7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⑤许德立:《发展中的汕头与成长中的青年——在汕头市纪念五四运动78周年暨共青团建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7页。

⑥中共汕头市委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汕头市青少年教育十大工作网络方案(试行)》,1996年11月18日印发。

⑦涂在奇、赵怀德:《当前农村思想工作的难点与对策》,《理论月刊》1995年第3期第35页。

作者谭建光,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副教授(510507)

责任编辑:冯 生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价值思想的阐发

——浅析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许斗斗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处于世界观根本转变时期的马克思,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并力图以人类的解放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在这一《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几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并把人类的解放表达为“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①这些论断表明,马克思把人本身的存在看作就是目的,而且是最高的目的,在这些肯定人自身的目的性存在中,表明了他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肯定,并把人类的解放过程看作就是人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过程,看作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过程。

当然,此时马克思的世界观还只是处在转变中,他所立志的创立新世界观的任务还远未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此时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立场的表白,或一种政治上的宣言,而要为这一宣言找到现实基础上的理论依据,则是他后来思想的着力点,也正是他后来理论所表明出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马克思对其人的存在价值思想的有深度的说明之一。

关于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论述,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时期,人的问题是他的哲学主题,而当他的思想走向成熟并趋于更高的综合时,人的问题则降到从属于社会规律问题的地位,成为其哲学的一条辅线。^②因此,作为成熟时期完成的这篇《手稿》,马克思虽没有明确

提出“人的存在价值”的概念,也没有太多的对人的问题的论述,但与上述的《导言》相比,他在对人的思索中体现得更具社会性和历史性,更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性。

马克思承续了他在《导言》中提出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是最高目的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明显超越《导言》时期之处在于,他把人的这种最高本质和目的的实现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基础上,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如马克思在考察了亚细亚的、日耳曼等古代所有制形式后指出:“根据古代人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③可见,马克思认为,在古代社会里,任何不同的民族、任何不同宗教的和政治的观点,在对待人和人的生产活动上却是一致的,即以人为最终目的。当然,人们的生产除了为维持和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外,(马克思称这种生产为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再生产,这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同样是人们生产的目的所在,正如他说的:“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④由此可见,马克思始终是把人当作最高目的。尽管他自己也知道,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极大限制,人们的生产活动只能是为了维持和满足人的生存,是在此基础上的以人的存在为目的,但我们仍可体会到,马克思是通过以人为生产活动的最高目的来说明人的存在的根本价

值。

以生产是以人为最高目的为标准,马克思抨击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特性,他说:“在现代世界(指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引者注),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⑤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与古代社会刚好相反,人的目的是生产,生产的目的是财富,于是,人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反而人的生存目的是财富,人为财富而生存,这样的生产不仅是异化的生产,人也成了异化的人(对此我们还将下面详细说明)。人的生产和人的存在都“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⑥这就是完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与这样的社会相比,马克思认为,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观点显然就“显得崇高得多”。^⑦可见,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以人的目的、人的存在价值为标准而展开的。

无疑,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价值决不是无以展示的抽象价值,人的存在也不是毫无根基的空洞存在。人虽然在主观上能独立地表现自己,但在客观上必须现实地依赖于自然界,这是人类存在的大前提。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仅有这些是不足以说明人的现实性,也无法充分体现人的存在价值,因为人的存在价值在于他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或者说,更主要地体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作用上,这就是人的生产活动。为此,马克思以人的存在条件为分析的切入点,认为,“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这一点为条件”。^⑧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个体人的“生产存在”和“主体存在”。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这决不是两个简单的概念术语,它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看作是“生产存在”和“主体存在”,而正是这两种“存在”方式体现了他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洞见:即人只有在“生产”状态中才能展示自己的存在,只有在“主体”状态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人的存在价值是在人的生

产实践作用于其生存环境时显现,是在人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主体的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状态中体现,或者说,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就是人的存在价值。这一思想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然,不要忘记,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的条件是人属于他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的存在是社会实践的存在,人的价值是社会实践的价值。人在社会中所创造与生产出的产品、财富,只是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佐证,它们反过来成为人的价值的再创造与再显现的条件。产品、财富决不是人存在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⑨这也再次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把财富这一外在形式当作目的的异化生产的批判。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公社所有制共同体发生了解体,这种解体的过程在西方主要是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外地人的交往,需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即商品)等促成的;而在东方,几乎是由于外界的刺激影响而造成。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解体,马克思认为,这都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新的劳动方式、新的结合的产生,意味着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类社会的这种解体 and 重构,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必然性中,包含着劳动者对原有土地、生产资料的丧失而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包含着这些原有属于劳动者财产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丧失而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以及包含着基于上述二者丧失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

为交换价值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志,这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导致异化劳动的生产。马克思从人的存在价值的角度对这种生产给予了以下三方面的批判:第一,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劳动不是以人的最高目的为生产的目的,而是为了交换价值、获取财富和资本等这种纯粹的外在目的,这可谓是人的最

高价值目的的异化。第二,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者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他们就要受制于商人,“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之内,这种劳动形式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⑩因而,人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异化,商人通过占领流通过程而占有工人的劳动过程,从而占有工人的活劳动,最终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于是产生了剥削,产生了商人资本家。这样,人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异化了,人因而最终地失去存在的价值。第三,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者只为交换价值而生产,那么,一切的社会关系也就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关系。因为只有经过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价值的实现中,每个人的活动才成为现实的活动,他的活动产品才能成为现实意义上的产品(即商品),因此,“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⑪这样,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建构起的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联系,由于交换价值的中介而产生了异化,成为纯粹物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货币与金钱的关系。于是,人的存在活动的结果(社会关系)及其存在活动的环境(同样是社会关系)产生了异化。这是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生产之负作用的三方面系统揭示。

马克思上述的三方面批判显然是深刻的,充分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方式的无情否定,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交换价值生产之历史必然性的肯定。正像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包含着对它暂时性方面的理解一样,马克思在论述交换价值生产时,也展示了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暂时性方面。马克思曾把这异化的劳动过程称为错乱和颠倒的过程,并认为“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

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而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⑫或许这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代价,没有这种极端的异化形式,没有这个必然的暂时性,人类就无法创造和建立充分发展的生产前提,也就不可能创造和建立个人生产力的全面而普遍发展的物质条件,人类的存在价值也就难以在生产和实践中获得更大的展现。这正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他眷恋于过去的古代社会,而是着眼于人的发展和存在价值展示的未来。同时也说明,与众人熟知的1844年《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相比,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已克服了早期从哲理、人道和伦理道德上对异化劳动的否弃,而达到从异化劳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过渡性上所给予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了。

那么,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如何使自身(即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暂时性呢?如何成为人的存在价值全面展现的“过渡点”呢?笔者认为,这种交换价值的生产瓦解了原本自然地形成但却束缚人的各种血缘和氏族的纽带,使人进入了依赖于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较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是人处于丧失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的自由人和独立人这种状态,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内的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也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⑬的矛盾,也就是说,在世界市场内,生产与消费使每个人都发生联系,而每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都是绝对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的商品交换的联系,但是,这种商品交换的联系又是不为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所能控制和把握。换句话说,人展现了其创造与建构新联系的存在价值,却并没在其所建构与创造的联系中展现其控制和把握它的能力。人的存在价值在此受到了限制,表现出了片面性。马克思认为,这种物的联系“借以同

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⑭可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狭隘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并没有开始其真正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控制和把握这种生产关系,并没有在这种“狭隘的生产关系”中体现出真正存在意义上的人。尽管这种生产关系使个人的交往联系进一步普遍化,并增长了人们力图控制和把握这种还是异在的生产关系的能力。而且它在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上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⑮此处的限制就是喻示着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这种交换价值的生产只能成为一个不断被消灭的暂时现象,一个人展现其存在价值的“过渡点”。

人们如何“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与未来真正意义上人的存在价值问题相联系。虽然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的联系”的普遍化和财富的丰富性上,但是,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人的生活,因而,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是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类交换价值生产的历史阶段性后所特别强调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真正的社会生活)应具有两个条件:

首先是人的现实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⑯对这“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的详尽说明在于,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⑰这可谓是马克思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价值的深刻说明。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价值就是全面发展了的人,就

是他们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地包括生产关系)不是异己的,而是自己的关系,并且他们有能力控制和把握这种关系,使之成为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即自己的社会财富)。而上述这些现实关系的实现,无疑都是人们对它们观念的把握,即观念关系的结果,但所有这些关系的实现则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存在上。人们在这些自己的和能控制的社会关系中,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体现自己的才能和发展自己全面性,从而能充分地证实并展现出他的存在价值。不过,马克思认为,人的这种才能的全面发展和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的暂时性克服上,因而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一个过程本身。人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一部自身趋向全面性和存在价值不断展现的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是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因为只有自由时间的增加,个人才有充分发展自己、展示自身价值的时间,反之,倘若“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⑱那么,个人就不能全面地发展自己、展示自己的多种存在价值。而一旦人们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就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即“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⑲这时,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最充分展现。

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只有在自己的社会关系普遍化、自己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时间的不断增加中才能开始生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想的社会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⑳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具有真正的和自由意义上的存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只作为历史产物与结果的人的存在价值之展现的论述,也不把人的存在价值仅限于对某

“富而好礼”

□朱宝信

古老的中国在崭新的 21 世纪必将全面实现现代化,当完成经济、社会的转型并最终成为现代国家之时,也必将形成新的哲学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不可或缺地具有中国特有的民族形式或传统特色。最能体现二者之有机融合的,笔者以为,就是“富而好礼”,(《论语·学而》)以现代社会的观念意识来解说“富而好礼”,可分述为两大系列、三大部分和十大观念。

—

“富而好礼”之第一系列显然就是有关“富”的系列。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是新价值观念首先关切的事情。

“富而好礼”之“富”的首要观念是创造观念。创造首先是创造财富,这是创造的基础或主干,狭义的创造观念也就是致富观

念;不过创造远不只此,凡是有助于社会财富增加的活动,诸如科学研究、技术应用、行政管理 and 艺术创作等,都是创造活动,这可谓广义的创造观念。现代中国人应当牢固地树立创造观念,把创造当作个人的本质、存在的方式以及人生的义务和职责。创造的观念首先表现为一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在世,不能安于现状、默守成规,而应有所作为、不甘落后,时刻保持一种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创造的观念还表现为自我的实现。人生在世,总要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亦即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如何实现呢?就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里,努力做出比别人更多的成绩,努力发现别人未曾提供的新东西;这样,自我在群体中或社会中凸现,个人的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自我的价值也

种社会形态的依赖,在他看来,这些都使人的存在价值的展现有可能陷于停滞,与人的存在过程和价值展现的过程相违背,从而最终否定人的存在自身。因此,他精辟地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①换句话说,人的存在价值是不满足于在某种具体的单一的存在特性上来重复地再现自己,而是要趋向全面性的追求;人的存在价值也不是停留在已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实际状态和关系上,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在具体“变易的绝对运动”中,在其存在展示的路途中。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价值不仅包含在实践活动的目的中,也体现在实践

活动的成果上,而且更主要是展现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15 页。

②参见孙承叔、王东著:《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学林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21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⑬⑭⑰⑱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486、496、486、486、486、491、493、514、103 - 104、108、108、108、104、486 页。

⑫⑬⑭⑮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361、36、36、222、225 页。

作者许斗斗,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200437)

责任编辑:冯 生

由此得以实现。创造的观念还表现为造福社会。创造是一种个人的活动,创造活动产生社会财富,当个人所创造的财富大于个人的索取或消费时,多出的财富就成为社会的财富,即可被其他人享用的财富;这样,创造就成为一种造福社会的行为,通过个人的活动促进社会富裕或他人富裕,这也就是创造的奉献内涵。

“富而好礼”之“富”的其次的观念是竞争观念。创造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本质力量的行动,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创造活动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体现出来,要想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就要敢于参与社会竞争。竞争是一种对抗性的相互取胜的活动,也就是说,在竞争中,谁都想获得成功而避免失败,竞争失败的后果是严峻的、无情的,因而竞争具有对抗性。竞争后果之成功和失败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机遇和风险。抓住机遇、赢得机遇意味着成功;遭致风险、承担风险则预示着失败。因此,竞争观念要求具备强烈的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所谓机遇意识,就是要求竞争者有胆量、有远见、有谋略,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机遇,最终将机遇化为成功。在这里,远见卓识也许最为重要,只有远见卓识,才能采取相应谋略,捕捉和利用机遇。而要做到远见卓识,关键是要通晓各种信息,以达到胸中有数、随机应变。所谓风险意识,就是要求竞争者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竞争中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做好可能遭致风险的心理准备;二是要竭尽全力减少风险,避免导致全盘失败的大的风险;三是要设法化险为夷,风险只是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往往风险可成为成功的契机,在这里,关键仍然是要通晓各种信息,把握变化的各种可能性,抓住时机,促进转化。

“富而好礼”之“富”的再次的观念是效率观念。竞争为的是取胜,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效率。何谓效率?效率就是竞争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特定的目的,或者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耗费了多少活动;它本质上是人的竞争活动的有效性比率关系。具体说来,以一定的活动实现较高的目的,这种活动的效率就是较高的;相反,同样的

活动实现的是较低的目的,这种活动的效率就是较低的。当人的活动的目的不变时,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过程亦即活动本身越节省,这种活动的效率就越高;或者说,当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过程亦即活动总量不变时,所达到的目的越大,其活动效率也就越高。可以看出,效率的本质在于节省,即力求最大限度地节省为达到特定目的所进行的活动。节省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可有两点。第一是时间的节省。竞争活动必须注意时效性,亦即每一活动过程的时间计划性,在这里切忌旷日持久、经久不决;即使是时间跨度较大的活动,也要力争每一阶段的时间节省。时间的节省意味着活动周期的增加,而活动周期的增加则意味着财富的增加。第二是成本的节省。竞争活动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现有财富的消耗。人的活动效率不仅表明人实现了什么,而且也表明他消耗了什么;在相同情况下,成本消耗越少则效率越高,因此,成本的节省是提高竞争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富而好礼”之“富”的最后的观念是科技、管理观念。竞争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增加财富,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传统观念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构成,并且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然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者说是生产力中的第一因素。那么,首要因素是劳动者和第一因素的科学技术,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原来,生产力三要素是生产力形成的要素,劳动者在生产力形成中当然是首要因素;而科学技术则是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生产力要发展,离开科学技术就无从谈起。科学技术为什么是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就在于它是一种智能因素,它与生产力构成三要素形成乘数或倍数关系。科技智能的渗透,可使生产力发生翻番的增长。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应当努力学习研究科学技术,力争成为科学技术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从事经济活动的竞争者也应当积极引进、开发最新的科学技术,以增强现代竞争的高科技色彩。科技研究可分为基础

研究、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三种形态,三种研究都是社会行为,它们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取决于社会的管理水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管理直接服务于竞争的目的,它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科学技术向经济竞争领域的渗透,也就是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经过开发研究再经过应用研究而成为科技产品的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必须经由社会行为的管理这一关口,通过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和控制等五个环节,科学技术才能成为生产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管理也可以说是生产力。

二

“富而好礼”之第二系列就是有关“礼”的系列。“礼”指的是社会文明礼仪,因而礼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或者说礼由两个部分组成,其第一部分是社会礼仪即法制,其第二部分是社会文明即道德。

关于“礼”之法制的含义,荀子曾做过卓越的说明,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而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荀子·礼论》)礼是为节制人的无限度的欲望而产生的;礼的作用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既“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又“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以达到众人合理分享而团结一致,互相尊重而结为一体的目的,依此促进人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创造财富的活动。

“富而好礼”之“礼”的法制意义的首要观念是自由观念。自由即个人自由,它指的是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不受限制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一切活动。因此,自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必须限制在不妨碍别人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妨碍别人的活动不是自由;其二是除此限制外不再受其他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受到限制的活动也不是自由。可以看出,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每个人只有在社会地位上平等时才能获得自由。现代社会是致力于社会平等的社会,它要打破一切诸如血统、出身、地位和财

产等不平等因素,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为什么生来就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创造的能力,只要社会不给予限制或压制,每个人的创造才能都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有了平等的法律保障,个人即可自由地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活动。个人的自由可能是无限的,但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其一是创造的自由。创造的自由也就是择业的自由,即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经历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只有对从事的职业产生热爱感而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的创造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其二是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也就是信仰的自由,即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某种价值观,可以对自己不欣赏的价值观发表批评和反对意见。其三是发展的自由。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要不停地改变自身、提高自身、完善自身,此即所谓发展自身,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个人在这方面享有的自由越广泛,其全面发展的程度就越高。

“富而好礼”之“礼”的法制意义的其次的观念是权利观念。权利即个人权利,它指的是个人所应获得和享用的各种权益。人为什么能够获得和享用各种权益?因为人是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财富的创造者,如果社会不给予限制和压制,每个人都能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做出出色的成绩,因而人们有权获得自己创造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天赋人权论”显得空洞抽象,那么,“行赋人权论”则以其充实、真实的内容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此所谓“行”,就是实践、创造的意思。可以看出,权利是个人的权利,因而个人权利的一大特征就是个人对社会的要求性。每个人都处在由上到下的层层的社会组织机构之中,然而社会组织机构不会自动地充分地满足每个人的权利,这就需要法律一方面规定社会应当满足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规定个人有权向社会组织机构提出权利要求。现代社会是十分重视个人权利的社会,因而个人也应明白自己的应得权利,利用法律提出并获得自己的权利。那么,人的权利主要有哪

些呢?按现代社会生活的划分,主要分为人权和公民权两个部分。人权是有关个人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它的主要部分是生存权,即个人的食、衣、住等方面的基本需要,随着个人创造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权的需求水平也随之提高,个人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提出自己不断提高的生存权利。公民权是有关个人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权利,它的主要部分是选举权,即个人推选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权利。通过选举活动,个人不但可以取得获取人权的可靠保证,更重要的是,个人还获得了社会性的规定,促使个人从狭隘的物质生活中走出去,达到对普遍的社会生活的关注。

“富而好礼”之“礼”的法制意义的再次的观念是法制观念。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为何如此呢?因为现代社会是以保证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律。因此,可以说,现代法制社会是以保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根本目的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现代社会才成为法制社会。因此,现代法律观念不同于传统法律观念之处,就在于现代法制不像传统法制那样主要地是管制人们不准如何如何,而主要地是指导和确保人们应该如何如何,这“应该”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和实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现代法制社会的法律体系,可相对地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活动的法律。此层意义上的法律主要是告诫人们不可如何。其二是关于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的形式,竞争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展开的。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其三是关于社会监督的法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社会,各级管理人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这一行政机构很有可能滥用行政权力,以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对它必须实施监督。法律监督的基本方式就是赋予民众以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以行为的优劣来取舍行政机构的管理人员。

三

“富而好礼”之“礼”的第二层含义或第二部分是道德。关于“礼”之道德含义,孔子曾作过完整的说明。他自称“三十而立”。立什么呢?他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此所谓礼,显然指的就是社会文明道德礼仪。中国传统道德以“仁”为最高范畴。何谓“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就是以爱怜之心去对待别人,或者说是克制自己,努力维护和重建社会礼仪。由此,孔子进一步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二者的结合,就是忠恕之道,即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道德就是要求我们不但不要妨碍他人,而且还要尽力地去帮助他人;这种系统的道德观念体系在现代社会将会显示巨大的价值,应是毫无疑问的。

“富而好礼”之“礼”的道德意义的首要观念显然就是道德观念。此所谓道德,主要指个人依照传统的道德规范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早就系统地形成了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具备的各种品格,总括起来,可称为“三道”、“四德”和“五常”。孔子指出,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是仁德,即仁者“爱人”,广施爱心;知是知识,即有知识有学问;勇是勇敢,即刚毅果断,富有原则性。“三道”即“仁、知、勇”。孟子提出“四德”,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仁就是怜惜他人,富有爱心;义就是正义,为不义之事而羞愧并敢于反对;礼就是文明礼貌,对人恭敬并彬彬有礼;智就是知识和智慧,能辨明事物之对与不对。“四德”就是“仁、义、礼、智”。孔子还很重视“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如何立身处世。后来,南宋圣贤朱熹把“信”归入“四德”,构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形成了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五种常道。

一个人全面具备了这五种品格,就可以算是“志士仁人”或现代社会中有道德的人了。

“富而好礼”之“礼”的道德意义的其次的观念是宽容观念。现代社会是经济充分发展了的社会,因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由此而生的不同的思想观点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当以道德的观念来对待他们时,就形成了宽容的观念。所谓宽容,就是对不同观点有存在的权力的承认以及对不同观点之存在理由的理解。从心理上达到这种确切的承认和深入的理解,不同观点之间就要相互接触和沟通,而要实现这一步,其基本的手段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心怀诚意的主动的行为,对话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理解之后会更为宽容。因此说,对话和理解也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思想观念。然而,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是现代多元化社会的基本表现,即使通过对话达到理解,它们之间的对立也不会消失,如果处理不好,有些对立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手段使这种冲突不致于发生,这一手段就是妥协。所谓妥协,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相互做出让步,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谅解。达成妥协,既消除了冲突,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思想观点还可以和平相处。妥协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足以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即妥协观念。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宽容观念,就是从宽容的态度出发,通过对话达到理解,最后实现妥协的结局。

“富而好礼”之“礼”的道德意义的再次的观念是和谐观念。文明礼貌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社会,有道德的人与别人交往必定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欢愉的感觉。依照个人交往范围的大小,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可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家庭关

系。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确认个人道德修养即“修身”之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齐家”,即把家庭建设成符合社会文明要求的小单位。由于家庭由三代血缘亲人组成,其不同年龄、职业和趣味所组成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就产生了一种特有之乐,即天伦之乐。第二个层次是邻里关系。邻里之间的和谐主要表现为相互帮助,一家有难各家来帮。更重要的是,邻里之间总有一些同龄幼男幼女,长期在校学习就发展出一种同学关系,而当同学之间由趣味相投而产生了依赖感时,就形成了朋友关系;人生若有几个知心朋友相伴,则是人生一大乐事。第三个层次是同事关系。同事之间以共同的事业建立起团结互助的气氛,从中即可营造出和谐的关系。若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则可成就一种特有之乐,即事业之乐;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奋斗,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和挫折的考验,久而久之,即可结下友谊。第四个层次是社团关系。所谓社团,就是按年龄、专长、爱好、志向等分别组成的团体,诸如各种形式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在这样的团体中,大家的兴趣完全一致,谈论的是同一话题;如果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社团,则各自专业研究还会带来新的收获,由此可产生一种特有之乐,即同道之乐。第五个层次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之事业的成功,从家庭开始,经由邻里、同事和社团,最后体现在社会之中。此时,个人与社会结为一体,以个人之微联结社会之大,自然使人心旷神怡、倍受感动,由此产生一种最大之乐,即物我同乐之乐。人心廓大如同天地,个人以天地之伟大自娱人生之辉煌,为何不感到其乐无穷呢!

作者朱宝信,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卫生学校副教授(463000)

责任编辑:罗 苹

错案的成本分析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 刘 伟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深刻认识错案的社会危害性，研究如何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当前法学界、法律界应当注意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成本分析的角度尝试一种研究的思路，并提出一些建议，以就教于同仁。

一、错案的社会危害：成本分析表明，错案必然产生法律上的错误成本，包括经济成本、道德成本和制度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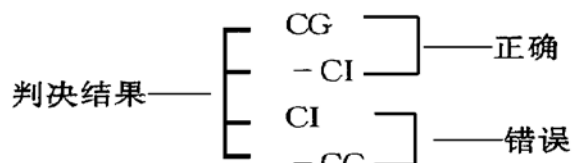
人们早已认识到，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十分慎重，否则，就会产生错案，危害社会。《尚书·吕刑》提出：“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教非刑？何度非及？”^①表明古人已认识到要选择善于理刑的人，谨慎地考虑用刑轻重是否合适，才能使百姓安定、社会稳定。同时，也认识到错案的必然存在，因为审理狱案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②《尚书·吕刑》为此建立了早期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错案的责任者严厉制裁：“其罪惟均”，^③即狱官因五过而出入人罪，其罪与犯法者同等。当然，统治阶级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所谓“佐王刑邦国，诂四方”。^④因阶级的局限性及为统治的需要，历朝历代都不可能杜绝错案现象，甚至不惜以制造冤假

错案，利用法律工具为维护其统治服务，以致冤狱错案层出不穷，统治者暴虐无道，民不堪命，最后只有靠揭竿而起，通过朝代更替来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但社会生产力却为此遭受巨大破坏，有时很长时间也难以恢复。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不断进步，人们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保护生产力免遭破坏。因为人们已认识到，通过付出必要的制度成本建立法律制度，包括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及错案成本，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这一现代观念，是建立在法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上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法律之经济分析成为法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分析模式，并在法学的各个领域广中广为运用，成果颇丰，在错案的成本分析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系统的运作产生直接成本，但这一成本是必要的，因为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查明真相、解决争执，实现法律的正义、公平和效率诸价值，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社会关系得以规范，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有序化，减少混乱带来的损害。法律程序总是追求费用最小化，而一旦错案发生，法律之查明真相、解决争执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不能止争意味法律程序的直接成本扩大；歪曲真相则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不能实现，从而侵犯合法权利，引致人们对行为规范的误解和对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即产生道德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是错案的成本分析的思想基础。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法学和哲

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指出：“作出错误判决时，即产生了法律上的错误成本。”^⑤因为对于一个案件来说，其结果不外乎两大类：正确的和错误的。一个刑事案件的被告经审理后，要么判决有罪，要么判决无罪。在一个实际的案例中，则可能存在四种结果：对有罪者治罪（CG）；对无罪者治罪（CI）；对有罪者不治罪（-CG）；对无罪者不治罪（-CI）。其中，CG 和 -CI 这两类是正确的，另两类 CI 和 -CG 是错误的。可图表如下：



在这里，我们不对量刑的畸轻畸重等情形作量化分析，而只作定性分析。这一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民事案件。

在一个错误判决中，冤枉无辜与放纵罪犯成本虽有区别，但其成本的构成方面却是相同的：经济成本、道德成本和制度成本。

1、错案的经济成本

一项错误的判决在两造当事人中引起的直接反应是，错误判决的受害一方会尽可能运用上诉、申诉程序去纠正这项错误判决，而上诉、申诉程序毫无疑问地扩大了法律系统的经济成本，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公共成本包括法官薪金、法官辅助人员薪金、法庭场地设施费用及办公费用；私人成本包括当事人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如果判决公正，则上诉、申诉可大大减少，由此引起的费用也可以大大减少。当然，当事人滥用上诉权、申诉权的例外情况除外。可见，错案的经济成本首先直接体现在法律体系运作成本的扩大方面。此外，错案还扩大社会的经济成本：放纵有罪者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为防范罪犯及个人为避免不法侵害都不得不增大投入，用来设立防盗设施系统和类似的防范系统；冤枉无辜者则使无辜者个人和家庭正常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使其创造财富的时间精力受到影响，也使其教育和生活投入的产出减少，对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害。而民事

诉讼中的错案则经济成本更显著：错案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社会信用恶化，使交易成本急剧扩大；错案也使人们不愿投入资金改善生产、生活方式以免损害他人和社会，以至他人、社会因被侵害而付出更大代价。环保案件的处理错误致使环保责任者不重视环保投入引致环境进一步恶化，为防治疾病、改善环境使个人和社会要投入更多资金，从而扩大经济成本，则是最典型的案例。此外，交通事故案的处理、工伤事故案的处理等，也有类似情况。

2、错案的道德成本

一个错案除引起经济成本扩大外，还会产生道德成本。以刑事案件为例，放纵有罪者使人们对因犯罪而被惩罚的恐惧减少，甚至对犯罪没有负罪感，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犯罪活动中去，并以此作为有能力、有作为的表现。这在诈骗、走私、赌博、贩毒等案件中表现最突出。犯罪的泛滥使人们道德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正义、正直、诚实、荣誉等道德观念日益淡薄。反过来，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又导致更多犯罪，犯罪率的上升使社会要投入更多去惩治犯罪，从而又扩大经济成本。而冤枉无辜者则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当国家司法机器有意识地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时，这种侵权行为产生道德上的损害即是道德成本，其表现则为人人自危，其对国家的热忱、对政府的拥护等心理转变为敌视、仇恨、恐惧，这种道德成本是巨大的，尤其在国家危难需要人民支持时，人民的淡漠可能是致命的。这种日积月累的道德成本很容易忽视，等到统治阶级醒悟时，往往悔之晚矣。此外，冤枉无辜的错案，还使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低估和对自身权利的漠视。一个轻视自己生命价值的人最容易轻视他人生命的价值，一个自身权利容易被侵害的人也很容易去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这样，从另一方面引起犯罪率的提高。冤枉无辜者由于不仅可以导致犯罪率上升，还侵犯了无罪不治罪这一人权权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冤枉无辜者比放纵有罪者道德成本更大。

3、错案的制度成本

人们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认同,总是从一些个案中获得的。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错案总是大量案件中的少数,可能仅仅体现为一定百分比的错案,即错案率。但对人们而言,尤其是对当事人而言,一个错案则具有百分之百的意义。当司法机关对个别的案件处理不慎时,人们从这个处理不慎的案件中看到是整个司法制度的黑暗。人们的这种认识方法尽管不可取,但制度不能苛求人们的认识方法。而量的积累达到一定度时,质变不可避免要发生,司法制度的腐败成为必然。此时,人们对法律的遵守会变为对法律的反抗,因为,在人们看来,这样的法律是邪恶的,正如圣·托马斯所言:“这种法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以服从”。^⑥而当人们不认同一个法律制度时,人们就会寻求制度外的解决争执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复归到血亲复仇、用暴力对抗暴力、用野蛮的暴力解决争执这样一种原始状态,法律制度就会荡然无存,社会不复安定,国家也就要解体。不仅一项判决错误的错案会导致制度成本,一项拖延的判决,或者一项判决得不到最终的执行,都会导致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产生制度成本,因而也应归结为错案。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不仅仅是一个困难,而是司法的一项错误;拖延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也不仅仅是司法效率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公正的问题,而拖延案件审理和判决的行为本身是违反程序法的,因而是一种错案,同样会产生错案的制度成本。这种状况的后果是人们在程序外解决争执的心理越来越强,对法律制度则不屑一顾。

二、追究错案责任,首先要研究引起错案的原因,再针对性地建立错案责任追究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

一个错案的背后,总是隐含着众多的原因:制度上的或实际操作上的,程序性的或实体上的,社会的或个人的,知识层面的或心理层面的,不一而足。导致错案的原因不同,其错误成本的构成和大小也不同。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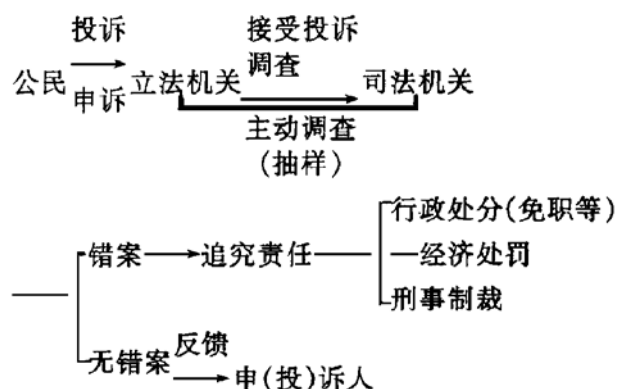
而言,因制度的原因产生错案其成本要高于因操作的原因产生的错案成本;程序性错案成本高于实体性错案成本。法律制度本身不公正或不健全,其造成错案不仅概率要大得多,其危害也大得多,其成本往往大到无法估量。实体的错误容易纠正,况且实体法的适用弹性较大,因此对实体上的不公正总是可以补救,并且较易接受。但程序上的错误往往人为因素居多,且十分明显,其对法律制度本身直接冲击较大,其错误成本也较高。可见,导致错案的原因不同,其错误成本不同,因而对错案责任的追究也不同。如在西汉时,“受财枉法”是入在盗律里的,^⑦因为官吏受财枉法其贪心与盗无殊。大明律对官吏贿赂的处罚十分严厉,“凡官吏受财者……官追夺除名,吏罢役”,^⑧受财枉法者,凡受财“一贯以下,杖七十”^⑨“八十贯,绞”。^⑩受财不枉法者,折半科罪。^⑪可见对贪赃枉法的处分是十分重的。此外对虐待罪囚,决罚不如法、告状不受理等错案责任者都予以严厉追究。虽在不同时代,对贪赃枉法引起的错案,追究其责任却同是十分严厉的。

在现实司法中,错案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如司法人员素质低劣,对法律陌生的人任司法官员,错案在所难免;又如司法程序繁琐,透明度不高,极易引起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又如缺乏法律监督机制,司法不独立,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等制度性问题;在程序问题上,拖延办案习以为常,当事人为求尽快解决争执,只好贿赂办案人员。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立法问题,更多还是执法问题。如何针对这些痼疾,建立错案责任追究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是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问题。

1、错案责任追究程序制度

错案责任追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程序问题,即如何发现错案,由谁调查错案,怎样追究错案。错案并不难发现,一个错案,直接受害的是一方当事人,只要当事人有渠道投诉,错案并不难发现。在我国,当事人投诉无门是主要矛盾所在,似乎很多机构可以管,似乎又无机构来管。在这方面,瑞典的

督察官制度值得借鉴：由立法机关任命的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外、有充分调查权的督察官，可以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司法、警察、监狱和公共行政事务，通过发现错误、迫使错案责任者受到刑事起诉和纪律处分来行使职权。^⑫追究错案责任由立法机关作为发现者、调查者、处理者是适当的。现行的由司法机关自查、自纠的方式，存在的弊端不言而喻。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可以得出错案责任追究的程序模式，图表如下：



2、错案责任追究实体制度

对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错案责任追究的实体法规定，在《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中都有所规定。我们认为，还应建立更为具体并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这些实体规定应包括：

(1)承担错案责任的主体：应确定一个原则，即谁对案件处理有决定权，就由谁承担错案责任。这个原则一旦有效确立，目前独任审理、会议庭职权，院、庭长审批制度、审判委员会职权等法院审理案件中存在的职能重叠、职责不明的状况就可改变。而公安刑事侦查职能，检察院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职能也能进一步明确。办案公安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检察院公诉人诉讼主体地位，也能从目前的混乱状况中得到理清。因此，通过明确错案责任承担的主体，使司法人员责、权、利高度统一起来，可作为理顺公检法机关之间关系的契机。

(2)错案责任的类型：应将错案责任区分为几种类型，如渎职型、贪赃枉法型、徇私枉法型、工作失误型等。不同类型的错案有

不同的原因，其错案成本不同，错案责任承担也不同。如工作失误型，主要由于办案人员政策法律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引起，这类错案的成本主要是经济成本，错案责任主要是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而贪赃枉法型则是办案人员收受贿赂，利用职权，作出违背事实 and 法律的枉法裁判所致，其危害很大，错案的道德成本和制度成本也很大，因此，应承担的错案责任也很大，除追究行政责任外，还要追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

(3)错案责任承担方式：错案责任者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承担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主要是对错案责任者进行行政处罚，如降职、开除、警告、记过等；经济责任则有扣发奖金、工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刑事责任则对错案责任者凡触犯刑律的，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三、对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若干设想

1、在立法机关设立专司错案责任追究的委员会，并聘请职业法律人士作调查员，行使错案调查的权利。

近年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系统都建立了内部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且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种内部的机制有其较大局限性，特别在涉及较高层次的错案处理上，显得缺乏力度。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处理机制，公检法机关违法违纪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有效遏制，错案日益增多，公检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越来越差。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没有人……能够不承担责任地控制一切人类事务而不变得极端骄傲和不公正。”^⑬因此，除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内部的错案自查自纠外，还应在立法机关成立专门的负责错案责任追究的委员会，或由已有的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错案责任追究。委员会相应设立立案、调查、处理及公共关系等职能部门。其中调查部门可以聘请法学、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担任调查员。立案部门根据书面审查，凡决定立案

的,交调查部门办理;调查部门根据案件情况成立调查小组或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交处理部门办理;处理部门负责与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联系,责成有关部门纠正错案,同时上报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司法人员任免及将有关需追究刑事责任者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建立错案的评议制,正确认识法律许可幅度内的案件处理的正常偏差与错案的区别,对错案成本能量化的就量化,以便正确评估错案责任。

由于立法的原因,我国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则性的较多,从而使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较难具体掌握,对因此而产生的案件处理上的正常偏差与错案应严格区分,但这种认定,应由权威人士组成的评议小组或专家顾问团论证后作出,避免确属错案而不追究或不属错案却被追究的事发生。此外,为使错案追究准确适当,还应根据错案成本的构成和大小对错案进行评议,包括定性和定量评议。定量评议应与当事人因错案造成的损失及错案当事人获国家赔偿的金额结合;凡属贪赃枉法的,应与办案人员收受贿赂的金额结合,进行等级划分,作为错案责任追究的量化指标。

3、建立对抵制错案责任追究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弹劾制度。

立法机关应确立错案责任追究的权威性,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接受监督,不配合调查,拒不处理错案的,应建立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的弹劾制,消除部门保护主义。

4、建立错案责任追究的公布制度。

包括错案调查结果及处理结果的即时

公布制度和年度错案责任追究的统计结果公布制度,通过舆论监督加强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5、建立错案责任追究与错案预防的综合制度。

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仅仅是为了惩罚错案责任者,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错案的立案、调查和处理,纠正错案,同时通过研究错案发生的规律,提出防止错案发生的意见和建议,供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参考采纳,以杜绝错案的发生。此外,通过公共关系工作的开展,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络,争取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则不仅可收到及时、准确追究错案责任的效果,还可收到普及法律,使人民群众学会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及依法办事、知法守法的效果。

①②③高潮主编:《古代文选》,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④同上,第6页。

⑤[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⑥[美]埃德加·博登海默著:《法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⑦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3页。

⑧⑨⑩⑪同上,第806-807页。

⑫参见刘春萍文:《瑞典的督察官制度》,1997年4月12日《法制日报》。

⑬同⑥,第11页。

作者刘伟,广东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律师(510030)

责任编辑:童 轩

论历史、历史学与历史意识

□陈 新

人们将研究、叙述历史的学科称为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主、客体二分法,历史学家便是研究的主体,历史是被研究的客体,而研究成果,即历史叙述作品则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它是一个包含着主体意识的客观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自有“历史”一词以来,人们回答“历史本质上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各有侧重,于是造成了对历史学目的的多种表述,就此虽然还难以获得一致的见解,但每一种回答都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学思想,增强了探讨这些问题的能力。笔者试图从历史与历史学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的根本特征,它们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并就历史的意义、历史学的目的及其实现途径提出几点想法,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历史与历史学的观念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观点。当我们思考,历史的这种通俗定义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一个等待着历史学家研究的纯粹的客体吗?涌现出的问题促使我们对历史与历史学的观念作一番历史考察。鉴于人们关于历史的一般观念往往与同一时代史家的看法相近,因此,我们不妨以西方史学史为例略作说明。

在希罗多德之前,希腊已经有神话、史诗、谱系等作品存在,但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希罗多德首次将他的著作称为《历史》,从而率先确定了历史一词的含义,即它是有关“人类的功业”、“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和希波战

争的原因这些内容的叙述方式。①修昔底德也认为历史是叙述那些发生在过去、经过考核的可信事件之方式,②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诗与历史进行比较,认为历史是一种“记述已经发生的事”的叙述文体。③可见,古希腊意义上的历史属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历史叙述类型中的一种,它是历史学家(精确一些应称为历史家,就如我们称小说家、诗人一样)的叙述成果。由于后人象修昔底德那样追求事件的可信度,并将因果解释给予了历史,于是历史体现了早期历史学的要素,它们便是叙述加解释。然而,自公元前二世纪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时代开始,历史逐渐既指关于过去事件的叙述,又指这些事件本身。历史一词于是具有双重含义,基本与现代观念相同,也可以说,现代“历史”一词的歧义,一为历史事实,二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历史编纂),便从此产生。

中世纪是由神职人员来确定历史的含义。已经过去的事固然被称为历史,但它们是上帝创造的,是神的意志之外化。历史因此只在表面上是过去的事件,而在深层次上却内涵着深奥的基督精神,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神意,历史学的目的就是将这种神意昭示众人。依照柯林武德的说法,欧洲中世纪“根据基督教的原理而写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④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人性与理性是思想家们最为看重的精神动力,于是历史要么被马基雅维里视作人性的体现,要么被伏尔泰用来表现理性的进步。此时,在历史的观念上,近代与中世纪的最大区别在于人们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是神创造的,这

样,历史又回到了人的手中,而且,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观点似乎是人们的共识。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⑤阿克顿认为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⑥鲁滨孙将“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⑦这样的陈述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不过,共同之处在于,学者们作出上述种种陈述时都蕴含着一个历史学前提,即历史是一个存在于过去而有待于发现和研究的实体。既然如此,历史就不可能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了,它还富于深意,否则象 19 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派那样对事件“如实直书”不就可以完成历史学的任务吗?客观主义史学派以失败而告终,其结局恰恰证明历史学研究必须围绕着阐释一种埋藏于历史之中的深邃思想而展开,正如基督精神是中世纪之“历史”的本质,这种深植于过去事件中的思想才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真正实体性的“历史”。值得进一步质疑的是,这些实体性的“历史”在各个时代及不同历史学家的叙述中有根本不同的表现,这不同样说明它们也是历史学家依据自己对历史的信念在历史叙述中构造而成的吗?

每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在解释什么是历史。单单说一句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十分容易,然而它却不带给读者任何可资利用的东西,况且历史学家从不想就此三缄其口。我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之时的层层隐喻吗?既然历史学没有落入如实直书的坟墓,说明历史学家正在努力从历史中为我们寻找某种现实意义,不然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说,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不是历史恰当的定义,它的真正定义应该与历史的价值相联系,至少其表述在句法上应该是:历史是能够赋予人类……的事物,就象历史赋予古希腊人人本精神、赋予欧洲中世纪臣民上帝的启示与博爱、赋予近现代人民理性与进步观念。这样,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不再仅仅局限于重现过去的事件,而是肩负起将历史的价值揭示给众人的

职责,历史学家应该继承希罗多德、格雷戈里、伏尔泰、兰克、马克思、布罗代尔等人的事业,再现过去之事件中暗藏的精神与价值,再现历史的本质与意义。

既然历史学家事实上并没有将历史只当作过去发生的事件而做毫无意义的“客观描述”,那么我们重新问起:历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逻辑上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首先考察历史学实践关注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说明将从关于历史学的讨论开始。假如我们同意鲁滨孙所说的,广义的历史包括人类过去发生的一切思想与行为,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之间二者择一,要么取消历史学,要么取消除历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因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研究从根本上讲正是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它们都是历史学的分支,如若不这样做,哪一块领域又是历史学家能够养活自己的专有领地呢?显然没有。历史学的领地早已被鲁滨孙所说的社会科学同盟军瓜分完毕。只不过,现实情况并不是很糟糕,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都长盛不衰,这种违背经济原则的学科重复设置如果要想合法化,就必须给予另一种合理解释,即历史学研究根本目的在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之外另有它物,正是它体现着历史的意义,维系着历史学的生存。我们认为,这种它物就是历史学应特别关注的时间性以及对其有着充分认识的历史意识。

二、时间观念与历史学研究

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物,这种观念在人们思想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当我们将历史视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时,我们便将自己的目光引向了过去。普遍的看法是,过去是现在时间的消逝。时间一点一滴地从现在化为过去,人们由此认为现在发生的事件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成为历史。往事早已烟消云散,但它仍留下了某些踪迹,有两种形式的存在物可以见证它,其一是人们的回忆、文件档案;其二是前人制造的物品。通过这些见证物,人们将事件凝结在上面,作为历史的内

容,进而也将时间理解为一條由动向静逐步固化的线索。凭借着这条线索,自公元前几千年前到今天,事件在时间上的排列也就一目了然,人们在这条线索上找到适当的位置让各种事件各就各位。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变成过去不过是在这条静止之线上增加一点长度。再者,将来也会成为现在,并在瞬间变成过去,再一次延长静止之线。于是,在多数人的心中,时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事件正在成为历史,将来的事件也将成为历史,过去、现在、将来这时间的三维组成便以已经静止的过去为核心构成了历史显现的形式。作为历史内容的事件,随着这种形式由动态转为静态,二者结合于一体组成不变的历史存在。

人们将这种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经验主义时间看作一种当然的存在物,因此对它并不在意。以历史学寻求的历史的垂训作用为例,历史学家视经验与教训是历史研究的产物,如果它们能作用于现在,就意味着现在与过去之间必然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永恒人性或理性,不然,源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可能运用于现在呢。静态时间观致使人们将历史活生生地割裂成形式与内容两部分,并将它们截然分立,似乎历史的本质完成是由所谓的内容决定,时间无非是表述历史本质的一种标示物。

历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历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历史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人们逐步认识到,历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其它国家的近现代史可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历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历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

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历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究其源,造成这个巨大缺陷的原因恰恰在于人们对历史时间静止、僵化的认识。

时间在历史学中并非无足轻重,相反,它与历史及历史学的意义直接相关。把时间静态化之后将它忽视或忘却的结果是,人们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在时间上的发生与历史的本质及意义存在什么联系。我们不能因为设想历史中那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内容而将时间理解成静止物,事实上,正确处理时间三维之间的动态关系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与历史学得以存在的基础。

只有对人类有意义的存在物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千百年来,人们不懈地研究历史,其目的就在于从中获取意义。不过,任何意义在时间上都有一个立足点,它既不是传统客观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的过去,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认为的现在,真正的立足点是将来。时间三维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是一种实体性存在,我们始终处于现在之上,它是一个转瞬即逝而难以捕捉的点,在消逝为过去之时现在把将来化作自身。如果我们在现实中的任何社会实践都带着确定的意图,那么它必将是指向将来,是在进行现实实践的时间点上为将来筹划。历史的意义同样依赖于这种以将来为基点的时间观,最终实现于筹划将来的现实实践之中。

传统历史观念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仍旧是历史学研究的必要对象,但是它们同时也是体现历史学之时间性的多种形式。历史学研究不再面向过去,而是面向将来。鉴于人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目的性与历史性,现实中的历史学实践在时间上表现为向前与向后观照的两个方面。它首先向前表现为现实的将来性(或称目的性)。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做法早已被人摒弃,我们与其象克罗齐那样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如说一切历史都是为着将来的历史。当我们研究历史,寻求一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研究在现在进行,而目的是为社会的将来的发展;当我们研究农村

宗族组织的功能与演变时,我们归根结蒂是想利用或规范它在将来的运作;即使我们寻求历史的垂训作用,它也是为将来而吸收养料。历史只有被我们纳入了关涉将来的筹划,它才成为有效的存在,也就是说,历史不再是作为一种封闭、静止的过去存在,而是由于研究者的参与成为向将来敞开的存在。其次,历史学的时间性向后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过去性(或称历史性)。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在历史中生成,理解现实与理解历史同一。历史学研究并不是滥用自由意志来随意解释各种现象,我们的理解必将受到历史中生成的意识传统的约束,这种被伽达默尔称为成见的东西也是我们进行理解的必要条件。倘若我们设想自己研究的某个课题有利于现实筹划将来,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目的的最终实现将依赖于对三种历史性的充分认识,即被研究的主题的历史性、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性以及研究者身处的现实之历史性。

历史学研究是我们在现实中筹划将来的一种方式,而在我们筹划之时也思考着现实的历史性,这样,在历史学家的参与下,过去经由现实实践的桥梁通向将来。当历史学家自身实践的时间性引起了他的注意时,他就具有了获得历史意识的可能。历史意识由人们对自身行为的目的性与历史性的理解构成。如果说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学科史的研究,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可被称为历史学家,因而历史意识将是每一个人都必需的;如果说历史学家形成的历史意识能有效运用于任何社会实践,那么每一个社会实践者都应该具备它。尽管如此,现实的情况是,历史学家以研究人类以往的实践方式筹划将来,并将此视为己任,所以较之其他人,他更易于接触、认识历史学的时间性,获得拥有历史意识的优先权,只是这种优先权要求历史学家履行一项神圣的职责,即将历史意识传递给一切需要它的人。这样说来,将获取历史意识与履行传递历史意识的职责二者结合,才真正构成了历史学区别于其它任何学科的根本任务,这也是历史学应该存在的确切理由。

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义

以往的历史哲学家对历史意识已有诸多阐述。在狄尔泰那里,认识者的历史意识致力于发展一种“历史感”,以便能够超越由自身所处时代造成的偏见。这显然是狄尔泰追求历史存在之客观性的结果。它指出了认识客体具有历史性(客体自身的时代特征),为了理解这种历史性,认识者应该依靠历史意识摆脱自己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批评这种对历史意识的不完全认识时说:“狄尔泰的认识论反思试图证明的历史意识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兰克学派那种诗意的自我忘却。”^⑧克罗齐认为:“历史意识是逻辑意识而不是实际意识,事实上是以前者为其目标的;一度存在的历史在历史意识中变成了思想,原先表示抗拒的意识与感情方面的对立物在思想中不再占有地位了。”^⑨持有这种历史意识,历史学家将抛弃感情因素去为历史辩护,因为克罗齐深感历史学家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于是寻求一种逻辑意识,企图从历史中找到逻辑关系来阐述历史,而这种逻辑意识在他看来就是真正的历史意识。上述两种历史意识到头来还是想促使历史学家追求客观实体性的历史存在。历史既然依旧被看成是存在于过去的客体,等待着历史学家去客观描述,那就说明狄尔泰与克罗齐仍有着一种旧式时间观,将历史与过去都静止化了。

对历史学之时间性的全新认识促成了历史意识的深化,并由此给予历史之本质一种新的解释。试想,小到个人,大到文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存在在时间中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是时间上一个无限可分的点,过去已经消逝,将来尚未到时,个体的存在只在现在实现。然而现在却是由整个的历史来表现,如同我们吃完第七个饼饱了以后不能埋没了前六个饼的功劳,个体作为历史的产物存在之时,它的一切都源于历史。从这种意义上,历史就是个体的存在本身。当一个个体诞生之时,他便被抛入了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特定地理、气候、风俗、习惯、文化、社

会发展水平等等是历史的外化,它们无时无刻不代表着历史影响个体的生命进程。每一时刻的生命都发生在现在,并在瞬息之间变成过去,因此历史总是越来越丰富,这并非纯粹量上的增加,而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当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不断由现在转变为过去时,我们还能指望作为整体的历史依然保持原状吗?历史在现实中通过个体的存在性显现自身,但它并没有因为代表着个体的全部而阻止个体生命的延续与存在的更新。个体对历史的认识同时是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认识,他在一种生命欲望中期望着未来,在现实中筹划以便应付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这种筹划能力的高低与他认识历史的水平成正比。每一次筹划在现在实现即意味着它转变成了历史,而它产生的效果将左右着现在面对将来的下一次筹划。历史就是这样,从将来到时成为现在,再从现在转化成过去而被生成;与此同时,历史也是这样,为筹划将来提供思考的依据。时间三维都与历史互为关联,这就是历史意识的真切内容。

以人类社会为限,最大的历史个体莫过于作为类的人,而最小的则是个人。人与人之间由于认识能力上的差异,对历史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可能幻想人们对自身存在有一致的想法。然而,历史意识揭示出历史意义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它告诉我们,历史意义的大小取决于有关将来的筹划是否能在将来到时为现在所实现,这是因为我们的筹划全赖认识历史的能力,对个人而言,这种能力也就是保持个人存在(生存)

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历史的意义,即以它是否能促进个体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的生存为标准。不过,要实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历史学之时间性有着充分认识的历史意识深入每一个人的思想中,让人们认识到历史与自身存在的同一性。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乃是历史学家一个艰巨的任务。

①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一版,第1页。

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一版,第16-19页。

③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一版,第81页。

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第一版,第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⑥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9页。

⑦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6月第一版,第3页。

⑧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204.

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67页。

作者陈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200437)

责任编辑:郭秀文

衙前农民运动性质辩证

1921年，在浙江萧山的衙前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动民众，组织农民协会，发表《宣言》和《章程》，和地主阶级进行抗衡和斗争，其范围波及萧绍平原80多个村落，时间持续了半年左右。这一重大事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广大党史研究者的关注，在党史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人认为这是“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斗争浪潮。”^①以后这一观点相继被其它一些党史著述所引用。

笔者以为，衙前农民运动的意义和地位是巨大的，不容低估，但将其性质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运动还可以商榷。

一、衙前农民运动在组织上体现不出共产党的领导

沈玄庐是1921年4月由广州回家乡萧山衙前组织农民运动的，此时和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尚距三个月。他回衙前后，为发动和号召农民，8月19日在萧山坎山东麓草庵向农民作《谁是你的朋友》的演讲，9月23日在坎山北土地庙，向农民发表《农民自决》的演讲，同时和其他领导人朝夕相处。萧山市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走访了目前尚健在的当年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徐梅坤老人等。但这些演讲和调查资料，都无法证明，他来萧山衙前组织农民运动是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派遣，这是其一；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得到任何党组织的指示，这是其二；衙前农民运动发生期间，正是党的“一大”前后，党处在筹建和初建时期，还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是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认他们为不

能革命的”，^②没有将领导农民运动提到议事日程，对号称富庶的江浙农民运动，更没有注意，^③不可能派沈氏前来领导衙前农民运动，这是其三。杨之华回忆说：“1921年至1923年萧山‘农民学校’和农民抗捐抗款等活动，并没有共产党或共青团的组织在进行领导”。^④沈玄庐当时在组织上确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我们不能将一个党员的个人行动称之为党的行动。况且沈玄庐当时虽名为共产党员，但其思想还停留在主观社会主义上。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二、衙前农民运动在思想上同样体现不出共产党的领导

有的同志认为衙前农民运动的《宣言》和《章程》中有关“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⑤这种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是进步的，难能可贵的。它表明衙前农民运动已突破了旧式农民运动的模式，已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运动。

而且，我们也看到《宣言》和《章程》的这些思想确是沈玄庐思想的反映，他在《农民自决》的演讲中说：“如今你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间的斗争……不能调和”。^⑦

我们党确是主张“阶级对立”和“土地公有”的，但不能说凡主张“阶级对立”和“土地公有”就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流行着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中也有不乏主张“阶级对立”和“土地公有”的。

就“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论,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可以看到首先提出的是资产阶级。为此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党一成立,就明确规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⑧

就“土地公有”的思想而言,首先提出的同样是资产阶级。19世纪末,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者亨利·乔治在他的著作《进步与贫困》中首先提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土地的私有制是人民群众贫困的根源,“如果不使土地变为共同财产,则贫穷永远不能消灭。”⑨孙中山对亨氏的理论极为崇拜,几乎完全把它吸收过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据孙中山的解释,“平均地权”就是“土地国有”。

科学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不同点主要在于:不仅主张“土地国有”,而且主张其它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而且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⑩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呱呱坠地,就在党纲中规定:“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沈玄庐在经济上只侈谈“土地公有”,从不强调其它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有。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否定了土地私有制并不等于就否定了资本主义;政治上,他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说:“你们要知道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的行为便是你们劳动者的行为,你们对于赋税等等,不应取消极仇视态度,应该从组织上面谋得国家的主权归你们掌握”,⑪“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害本来冲突在两个阶级要争宪法上的权利”。⑫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沈玄庐在这个问题上离马克思主义太远

了。鉴于此,由他起草的《宣言》和《章程》岂可能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三、衙前农民运动期间沈玄庐的一系列言行是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

沈玄庐是1921年4月回萧山衙前的,其主观目的并不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他是去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三届议会的换届选举。在他途经家乡时,衙前农民运动势在必发。衙前所处的南沙由于紧靠钱塘江,连年遭受坍江之苦,农民开垦出来的土地完全被有势力的绅士们所霸占,而且要先交一年租(称为“现租”)才能到自己开垦出来被绅士们占领的土地上做牛做马。1921年仁字号一带地方,歉收断粮,饿死达百余人,所以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尤为尖锐。1907年坎山附近的农民就联合起来,捣毁了坎山厘长;⑬1912年11月,赭山、西仑、蓬山、培新等乡佃户组织“大荒会”抗租;⑭1919年10月,南沙一带瘟疫流行,每日每乡镇死约十余人;1921年夏初,李成虎率领农民捣毁坎山、瓜沥镇上哄抬粮价、盘剥农民的米店。加之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的影响,使衙前农民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更激起了摆脱、改变困苦现状的强烈愿望。沈玄庐面对着这一形势,为了在即将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他投身到了这场农民运动中。在衙前农民运动过程中,他一方面反对农民采取暴力行动,“不可以无组织的暴动”(他认为暴动总是无组织的),“应该从组织上谋得国家主权归你们掌握”,⑮妄图使衙前农民运动纳入自己的主观轨道;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到杭州发表演讲。8月22日他发表题为《制宪问题》的演讲;10月5日发表《我所希望于浙江第三届省议会》的演讲,热衷于议会斗争。衙前农民最终冲破了沈玄庐的思想羁縻,发展到武装暴动。是年底衙前农民运动遭到弹压,农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被逮捕。此时沈玄庐却正在杭州参加由浙江省长沈金鉴召开的会议,和那些农

民阶级的死对头聚坐一起,安然无恙。有种说法,认为沈玄庐之所以免遭逮捕,是由于他的名望太高,统治者不敢碰他。这实在是悖于事实的。沈玄庐一方面同情工农群众,决心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我想替你们设法,避免痛苦”,^{①⑥}实现“土地归农民使用”,“归农会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改良的方式,即通过议会,通过向统治者的呼吁来实现这种目的。他的这一思想,对稳固旧社会的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理所当然地得到统治者的默许和拥护。

党的一大在讨论关于党员能否担任政府官吏和国会议员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党员可以去做官,也可以加入国会;另一种意见认为,党员参加国会,就会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利用国会不会使党的情况有所好转,因此不应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会议最后决定:“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能担任政府官吏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①⑦}如果说党的一大以前,对沈玄庐从事的议会活动,我们无须多加指责的话,那么在党的一大有明确决议之后,他仍热衷于议会的斗争,则是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所有这些只能表明沈玄庐是一个主观的社会主义者,虽然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并不和党的主张一致。当年衙前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徐行之说得好,“他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参加党进行种种活动,目的都是为自己找出路,并不是相信共产主义。”^{①⑧}

沈玄庐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根据对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轨迹分析,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改良的社会主义。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个时期的先进分子,正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小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

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①⑨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921年爆发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并没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运动。

衙前农民运动的性质到底该是什么?笔者赞成杨之华的说法。杨之华在1956年9月回忆本次运动时说,虽“没有共产党或青年团组织在进行领导,但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领导”。之所以这样判断,原因是:

首先,它的领导力量是具有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都是震惊全国的杭州“一师风潮”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刘大白曾参加过讨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杨之华于“五四”时期,就投入爱国运动,后在上海《星期评论》社工作;沈玄庐也受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说。还有王贯三、张春浩、赵并欢等都是浙江早期党团的负责人,潘垂统、楼廷藩、郦翰臣、张维祺等也都是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青年。这个群体在衙前致力于对农民的宣传教育,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农民。他们一是创办衙前农村小学。该学校于1921年秋开学,小学有5—6个班级,学生近200人,除学文化外,兼学农事:成人班设在晚上,一面扫盲识字,一面宣传革命道理,“从切实方面和真挚质朴的农民携手”。宣中华、刘大白、徐白民等亲自执教。二是创办阅书报社,免费出借《星期评论》、《新青年》、《觉悟》、《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革命和进步的书籍、报刊;三是在各地进行演讲。沈玄庐和农村小学的教员们先后在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进行演讲。听讲的人数从起初的百十人增至数千人。最多的一次汇集了二三十个村落的农民;四是走出校门,进行家庭访问和实地调查,“认识农民底生活状况”,“将知识阶级和农民沟通”。^{②⑩}他们通过上述途径,向农民讲解城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情况,讲解减租减息、抗捐抗税的道理,启发农民提高觉悟,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

地主阶级作斗争。

其次,这群知识分子制定了一个比较好的纲领,即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和《章程》。这一纲领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正确估价了中国农民的自身力量和地位,分析了造成广大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尖锐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主张,这对启发农民觉悟,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有着十分重大的鼓动作用。它和旧式农民运动相比,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容的进步性方面要高明得多;其改造社会的方案,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再次,他们创办了农民协会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他们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发布告示,作出减租规定,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使之很快在萧绍平原上扩展开来。仿效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各地农民协会还联合组织农民到萧山、绍兴县城进行“请愿”活动。农民群众的联合斗争,使地主、田主不敢出门收租,有的同意了佃农三折还租的要求,有的还向农民顺情说好话。它大长了农民阶级的志气,使地主豪绅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后首次出现的号召和团结农民起来的新型组织形式。所以1926年冬,中共上海区委所属的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决议说:“1921年,萧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②1}

所有这些表明,衙前农民运动既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农民运动,但因缺乏党的领导,又有别于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它是旧式农民运动向以广东海丰为先

导的党所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过渡。

①胡华:《衙前农民运动》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②《沈定一先生被难哀启》,见《衙前农民运动》。

③②《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节录,见《衙前农民运动》。

④《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

⑤《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的调查和考证》,见《杭州党史资料》1990年第二期。

⑥①⑤沈玄庐:《农民自决》,见《衙前农民运动》。

⑦⑫沈玄庐:《制宪问题》。

⑧⑰《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英文译稿)。

⑨转引自(美)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260页。

⑬徐和雍:《浙江近代史》。

⑭新编《萧山县志》;大事记。

⑮沈玄庐:《谁是你的朋友》,见《衙前农民运动》。

⑯《党成立时期浙江的工农运动》,见《“一大”前后》第二册。

⑰《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6页。

⑱转引《沈玄庐其人》第85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

作者陈志根,浙江萧山市地方志办公室(311203)

责任编辑:郭秀文

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古永继

贬流,指贬谪与流放。贬谪限于仕宦阶层,秦汉时已见端倪;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惩罚罪人的强制性手段,二者虽不尽相同,但性质类似,故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唐代为中国历史上贬流之人产生的高峰时期,而岭南,^①则系唐代发遣贬流者的主要地区。据统计,唐代仅贬流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左降官近200人,其中皇亲国戚37人(家),宰相49人(次),还有一批高官显贵名士高人等。^②至于史籍无考者,自然更多。如长寿元年(692),有人告发岭南流人欲谋反叛,武则天派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查办,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滨,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并命”。^③贬流之人数量既多,身份各异,他们的流入,对唐代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

据有关记载,发遣至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大体有如下几类:

(一)官吏贪赃枉法

唐代对官吏贪赃枉法惩处严厉,规定:“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十五匹(绢)绞”,“不枉法者……三十匹加役流。”^④官吏有犯者,死罪之外,往往或贬或流。如中宗神龙间,左台御史王旭在审理剑南令赃案时,逼奸其妻而杀其夫,并“纳赃数百万”,后被告发劾治,“获奸赃不贲”,贬龙川尉而死。^⑤另一左台御史姚绍之,坐赃五百万,法当死,经皇后之妹救请,减死贬琼山尉。^⑥玄宗时宋浑、宋恕弟兄,分别任东京采访使、剑南采访使判官,赃私各数万贯,被分别流放岭南高要郡、海康郡。^⑦司农卿陈思问,“隐盗钱谷,积至累万”,被流岭南而死。^⑧

(二)触犯封建礼教

礼法合一,为我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触犯礼教即触犯法律。唐律规定:“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⑨“不孝流。”^⑩如高宗时,宗室淮南王李茂,在其父徐王元礼病重时,逼奸父姬赵氏,遭父斥责后,竟断其药物饮食,使其病饿身亡。事泄,流配振州(治今海南崖县)而死。^⑪大臣许敬宗之子许昂与其后母虞氏私通,敬宗怒黜虞氏,奏请朝廷流昂于岭外,数年后才回。^⑫宪宗时进士刘师服,与正居母丧的驸马都尉于季友“欢宴夜饮”,结果于被削官爵,笞四十,忠州(今四川忠县)安置;刘笞四十,流放连州(治今广东连县)。^⑬男女间如有违礼教,弄出丑闻,也会受到惩处。如德宗时蜀州别驾萧鼎、商州鄠阳令韦恪、太子詹事李升等,出入寡居的肃宗之女郾国公主府第,“秽声流闻”。德宗大怒,幽禁公主,贬李升于岭南,萧鼎、韦恪笞决四十,长流岭表。^⑭

(三)思想言论得罪

唐律规定:“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⑮“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⑯太宗时监察御史陈师合,上疏批评大臣杜如晦一人兼总数职,被以“离间君臣”之罪,斥流岭表。^⑰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德宗晚年为监察御史,上章指斥时弊,贬为连州阳山令。后召回官至刑部侍郎,宪宗时又因上疏谏迎佛骨入宫,触怒皇帝,被贬潮州刺史。^⑱玄宗时河南府福昌县主簿魏萱与前睦州桐庐县尉王延祐,“朝夕谈议,既涉非违”,各被杖后,长流宾州(治今广东信宜)。^⑲

(四)军事将领犯罪

军事将领贬流岭南,主要有两种,一是指指挥作战失败。如高宗永隆二年(681)五月,定襄道总管曹怀舜与突厥可汗阿史伏念战于横水(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官军大败,怀舜减死罪一等,配流岭南。^⑳宪宗元

和间,承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抗命朝廷,义武军节度使浑镐率军征讨,中计失败,师丧其半,坐贬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刺史;后又被奏中饱“供军钱绢十余万贯匹”,再贬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刺史。^②二是不恤士卒,引起兵变。如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四月,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朝廷于是贬季荣于岭南。^③懿宗咸通末昭义节度使高湜也因“为下所逐”,贬连州司马;后回原地复职,又“为乱将所逐”,贬高要尉。^④

(五)内部斗争失利

有唐一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此起彼伏,武则天夺权、中宗复辟、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每次都产生一批失败者。这些人有的被诛杀,有的被贬流。贬流者中相当部分被发遣岭南,著名的如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刘禹锡、韦执谊,牛李党争中的双方首脑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等。

(六)受诬陷与诬人

武则天时任用酷吏,受诬而遭贬流者最多。如宰相韦方质,受则天侄武承嗣忌恨,被酷吏周兴、来子珣诬构,“配流儋州(治今海南儋县)而死”。^⑤长寿元年(693),才任宰相不久的李游道,被来俊臣诬告下狱,后免死,与袁智宏、王璇、崔神基、李元素等同流岭南。^⑥也有一些忌贤诬人者,干尽坏事,自己也落得贬流下场。如德宗时宰相卢杞,“忌能妒贤”,曾陷害杨炎、颜真卿,排斥宰相张镒等,并残酷搜刮百姓,“恨诽之声满天下”,建中四年(783),被贬新州司马。^⑦

(七)亲友犯罪株连

唐代有“反逆缘坐”法,规定:“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⑧“反逆缘坐人,应没官者,年至十六以上,并配岭南远恶州为城奴。”^⑨故当时往往一人犯罪,全家甚至全族遭殃。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株连产生了大批的贬流之人。如贞观时大将侯君集,曾随太宗征伐有功,历官吏部、兵部尚书等,因参与太子承乾谋反案被诛,太宗“原其妻子”不杀,“徙岭南”。^⑩德宗时镇海军节度使李錡谋反被杀,从弟宋州刺史李钊、通州舍人李诜、从子李师偃

流岭南。^⑪有的非罪者亲属,但因相互关系密切,也受株连。如玄宗天宝八年(749),咸宁太守赵奉章拟奏告宰相李林甫之罪,疏未上,即被以妖言罪抓捕杖死,著作郎韦子春因平素与赵“厚善”,坐贬端溪(今广东德庆)尉。^⑫如果罪者为朝中显赫人物,株连则更多。如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以权势过盛及贪黜等罪被诛,与载关系密切而坐贬者“凡数十百人”,^⑬韩愈之兄,时任起居舍人的韩会即被株连贬为潮州司马。

(八)其他

还有其他犯有各种罪行的贬流之人。如贞观二年(628)七月,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将高元礼,因原先参与宇文文化及兵变杀死隋炀帝,被加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配流岭表”。^⑭又如高宗时右史董思恭,主持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⑮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翰林医官董宏景、程准,游医李元戢、田佐元,因“医方不精,药术皆妄”,皇帝下诏“并流岭表”。^⑯玄宗开元时,幽州张衙将后妻,“悍妒虐遇五子,日鞭捶之”,被下敕“决一百,流岭南”,^⑰宪宗元和六年(811)九月,陕西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后投狱自首,特赦免死,“决杖一百而流循州”。^⑱等等,不一而足。

二

唐代岭南地区贬流之人的地域分布,总体上看,贬降官多安置于粤北的韶州、连州,粤东的潮州、循州,粤西的端州(治今广东高要)、康州(治今广东德庆)、雷州,海南的崖州等地;流放者多安置于雷州半岛及海南的崖州、儋州、振州等地。他们虽同是因罪发遣,但根据贬流不同及身份地位的差异,处境待遇及影响各有不同。

(一)处境待遇

玄宗天宝五年(746)七月六日曾下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⑲说明往贬流之地途中,二者虽都规定每日行程,但左降官是前往异地赴

任,可享受公家的驿传马匹之便,而流人则属囚犯被人押送,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且流人在行前往往往遭受笞杖之刑,押送途中有的还被“枷锁传递”。如德宗时监察御史崔蒨,“笞四十,配流崖州”;^{③⑨}进士赵博宣,“杖四十,流康州”。^{④⑩}文宗太和时兴元监军使杨叔元流康州,“锢身递于配所”。^{④⑪}

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七月曾下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年考满,许量移。”^{④⑫}遇有皇帝赦令,还可提前。如德宗贞元间,裴瑾谪循州为佐掾,“会赦,量移吉州(治今江西吉水)长史”。^{④⑬}流放,则有三年、六年、长流几种。“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④⑭}遇大赦,也多可提前放免。如贞观末儒生罗琮道,“上书忤旨,配流岭南,岁余遇赦还”。^{④⑮}但长流之人则往往不在赦免之列,犹如无期徒刑,除非遇有特赦,否则难有出头之日。

贬流者人身自由均受限制,不得随意离开辖区。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四月下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④⑯}而在此之前,不少人即因擅离禁地受到惩处。如德宗贞元间,被诬贬雷州司马的判度支元琇,因“私入广州”而被“赐死”。^{④⑰}中宗时受武三思诬陷流番禺的御史李福业,因亡匿吉州参军敬元礼家,二人俱被抓捕处死。^{④⑱}

(二)对当地的影响

贬流之人到岭南,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左降官尽管是有罪之身,其官职、待遇及各方面条件大不如前,但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最终身份并未改变,不少人身任相当一级的地方官如刺史、司马、参军、县丞、县尉之类,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们同正职官员一样,须接受一年一度的政绩考核。因此有的左降官到贬地后,即恪尽职守,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及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

如太子校书王义方,因与谋反被处死的刑部尚书张亮有过来往而受株连,于贞观二十年(646)三月贬为儋州吉安(今海南昌江)县丞。吉安“蛮俗荒梗”,文化落后。义方

“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把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原先进文化介绍给当地人民,几年之后,出现了“清歌吹簫,登降有序,蛮酋大喜”,“人人悦顺”的局面,^{④⑲}为当地黎、苗族的开化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宪宗元和十四年(815)贬为连州刺史的刘禹锡,在任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积极扶植后进,连州文化教育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发展很快,登科第人数之多,仅次于韶州而居岭南各州前列。他在连州四年,写下了80多篇诗文,成为研究连州的宝贵历史资料。^{⑤⑩}御史中丞魏元忠,武则天时被诬贬端州高要尉,在任“治戎旅,备洞寇,居期月,民谣恬謐”。^{⑤⑪}剑南府从事许远,玄宗时贬端州高要尉,办事公平,深得民心,民有事诉讼,不找县令而找他解决;后遇赦放还,百姓“遮道留之,几不能去”。^{⑤⑫}中书舍人崔嘏,宣宗时贬端州刺史,在任尽心民事,“笞榜不加,狱市自清”。^{⑤⑬}翰林学士张昺,懿宗咸通末贬封州司马,当时“封民语不可解,昺时教以文义,渐知诗书”;士子学人常有请教,他热情认真,“与论文章无倦”。^{⑤⑭}太仆卿韦覲,宣宗时贬潘州(治今广东高州)司马,当时潘州十分落后,韦覲“不鄙夷其民,安辑抚恤,……峒落服焉”。^{⑤⑮}礼部尚书辜玘,顺宗时贬琼州(治今海南琼山)军民指挥,在天旱庄稼受灾时,“劝民凿井,导泉灌溉”,直至清朝末期,当地村民仍享其利。^{⑤⑯}而所有贬流者中,对岭南地方发展影响最大者,则数韩愈。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发生严重旱灾,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上疏请宽民徭而免田租,被诬贬连州阳山县令。在任年余,躬行教化,奖掖后进,移风易俗,百姓十分感戴,民生子,多以“韩”命名。后人对其在阳山治绩给予高度评价:“自昌黎教行,而民始知有制度、诗书。”“天下因昌黎,而知有阳山。”^{⑤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官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入宫又被贬潮州刺史。他在潮仅8个月,即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如:振兴文教、遏制蓄奴之风、关心民间疾苦等等。所以潮人对他十分怀念,修建“韩文公祠”,“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⑤⑱}并把他登临过的“东山”改名“韩山”,

把他驱鳄的“恶溪”改名“韩水”，把他手植的橡木取名“韩木”，妇女蒙头帕称“文公帕”。真是“令百世血食而山川草木尽蒙姓韩”。^{⑤⑨}

流放者则各方面限制极严。唐律规定“诸犯流应配者，……妻妾从之。”^{⑥⑩}“有配长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减等者，并勒将妻同去，有儿女情愿者，亦听。”^{⑥⑪}到配地后由当地政府统一管理。原无官爵的平民，要按规定居作，即在规定的地方无偿劳动一至二年，然后附籍当地，同当地百姓一样从事生产，纳课服役，期满后流人身份才得解除。官员流放首先要“除名”，即“除籍为民”，到流放地后可免居作而附籍当地，同于百姓，身份相对自由。但有的流放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及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在巨大的反差面前，难以忍受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往往流放期未滿或赦免无望，生命之火即已提前熄灭。如高宗时太子洗马兼侍读刘纳言，为当时《汉书》学宗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⑥⑫}则天时凤阁侍郎胡元范，坐疏救中书令裴炎，“流死琼州”。^{⑥⑬}而大多数人，则在痛苦的煎熬中苟延残喘，企盼着流放期满或提前赦免。他们原有的权利被剥夺殆尽，自难同贬降官一样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史籍中少有见到他们在流放中有所作为的记载。但另一方面，流放者比贬降者在数量上要多得多。武则天时补阙李秦授在其面前曾有“今大臣流放者数万族”之说。^{⑥⑭}这些人到了荒芜落后之地，为了生存，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奋斗，去拼搏，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征服荒莽草莱，建立新的家园，从而在开发岭南、建设岭南方面，同样作出了贡献。

另外唐自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严重，中原人士纷纷南徙。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期满后有的量移或回归原籍，有的则寻求安宁落籍当地，即便贬流而死者，也“往往有子孙……客岭南”。^{⑥⑮}如驸马都尉王敬直，“贬死岭南，子孙留者，因为曲江著姓”，“世袭簪绅不绝”。^{⑥⑯}李德裕贬死崖州后，其子弟流落当地，后世“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⑥⑰}这些人扎根当地，世代繁衍，成为岭南先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变岭南人口布

局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按：岭南，亦称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约当今广东、海南、广西大部及越南北部。本文所述，则限指今广东、海南两地。

②⑤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597、59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③⑧《唐会要》卷四十一酷吏、卷四十一杂记。

④⑨⑩⑮⑯⑥⑩《唐律疏议》卷十一职制下、卷一名例一、卷二名例二、卷十职制中、卷十七贼盗一、卷三名例三。

⑤⑥⑦⑬⑮⑰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新唐书》王珪传、姚绍之传、杜如晦传、韩愈传、浑瑊传、侯君集传、李錡传、元载传、赵涓传、刘晏传、桓彦范传、裴炎传。

⑦⑧⑪⑫⑭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旧唐书》宋璟传、李尚隐传、徐王元礼传、许敬宗传、萧复传、高宗纪、韦方质传、卢杞传、豆卢钦望传、太宗纪、董思恭传、李皋传、德宗纪、儒学传、刘纳言传、裴炎传。

⑬⑳《旧唐书·宪宗纪》。

⑲⑳⑳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六五谪宦录四。

⑳《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

㉑㉒㉓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六二谪宦录一。

㉔《新唐书》来俊臣传，则天皇后纪。

㉕㉖《新唐书·刑法志》。

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

㉟《旧唐书·文宗纪》。

㊱《新唐书》、《旧唐书》王义方传。

㊲㊳㊴㊵㊶道光《肇庆府志》卷十七谪宦一。

㊷光绪《高州府志》卷二十七官职十·谪宦传。

㊸道光《琼州府志》卷三十二官师志六·流寓。

㊹民国《阳山县志》载清陆向荣《阳山县志序》。

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㊻林熙春：《重修韩祠碑记》。

㊼《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㊽余靖：《武溪集》卷十九《宋故大理寺丞知梅州王君墓碣铭》。

㊾光绪《崖州志》卷二十二杂志二·遗事。

作者古永继，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650091）

责任编辑：郭秀文

南方都市文学：专论与笔谈

【编者按】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的《子夜》和“新感觉派”的创作，开始把工业文明带给上海的电、光、声、色作为描写对象，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滥觞，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都市文明有了新一轮的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形象、经济运作方式、都市人新的价值观念等，加上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先后东渐，中国都市文学在新的文化背景下随又崛起，并引起评论界的关注。1990年初《广州文艺》曾组织“城市文学”笔谈，1994年深圳《特区文学》又开展了“新都市文学”的讨论。在此期间，由于南方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且有着毗邻港澳台的地缘优势和南方固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南方都市文学已发展成为中国都市文学的重要方面，为促进都市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本刊1998年5月16日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该校合作组织了一次“南方都市文学研讨会”，以下是会后编发的论文和笔谈，“现代的”观念常新，我们希望“都市文学”的话题能够延续下去。

岭南

都市文学

特点

张 绰

在中国，广州是西方文化最先过境的都市之一，是最早崛起的商贸城市，也是近现代文化学人和革命志士的重要发祥地。而今，广州市已成为世界大都市协会60多个会员城市之一，其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日益显著。随着都市现代化过程的加速，其都市文学的发展，便成为当代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新课题。

岭南的都市文学早有过耀眼的记录。老一辈作家有黄谷柳的《虾球传》、欧阳山的《三家巷》，中年作家有余松岩的《地火侠魂》、朱崇山的《流动的雾》和《风中灯》，女作家有何卓琼的《祸水》、曾应枫的《广州故事》和《省港人家》、张欣的《冬至》和《今生有约》、张梅的《赴爸爸的婚宴》和《酒后的爱情观》，深圳作家有吴启泰的《千年等一回》、杨秀生的《公平竞争》等等。不过，这几年总的发展势头，电视连续剧的成绩大大超越了文学创作的成绩。进入90年代，先是《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获得大奖。接着，从1994年起，《情满珠江》、《农民的儿子》、《英

雄无悔》、《和平年代》等电视剧连续4年获国家级最高奖。最近,电影《安居》又获得了大奖。影视剧本也是文学,而且有些电视剧如《商界》、《省港人家》等,就是从长篇小说改编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开阔些,我们可以看到岭南都市文学的某些特点,从包括影视文学在内的岭南都市文学中得到某些启迪。

岭南都市文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对现实的极大关注,反映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和市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同是表现90年代市场经济促进社会转型的作品,北方作家如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李贯通的《天缺一角》、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张继的《黄坡秋景》等,都是正面揭示改革过程中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努力,带有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广东无论是电视连续剧还是长篇小说的作者,他们都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变化,追踪市民关心的热点,但是,他们不是从正面去展示矛盾,描写矛盾解决的过程,而是重视写人,写人的精神状态、人的价值观念、人的理想追求。它不像北方都市文学那样给读者一种巨大的震撼,同时也留下了困惑和无奈。岭南都市文学并非都以大团圆结局,他们也有牺牲,也有挫折,在爱情的追逐上也会留下刻骨铭心的遗憾。但是,这些作品的整体风格是积极进取的,是昂扬向上的,是开放兼容的。因此,它总是给人一种精神上的美的感受和满足,一种前进的动力和追求。南北都市文学的不同风格,究竟奥秘何在呢?说到底,也就是两地的环境不同,文化精神不同。广东改革开放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在全国已经先走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广东最大的得益是从香港学到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规范,培育起了自己的现代经济意识,内地在改革中碰到的多矛盾、困惑,广东早些年也碰到过,而且已经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逐步解决了。所以,人们的思想已经不是再去回味那一段苦涩的日子,而是一边分享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一边在思考和探索前进的道路。因此,人们

的精神状态是乐观的、昂扬的,同时又是求实的、进取的。

岭南都市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含有岭南文化的因子。岭南文化的特点,人们大致把它归纳为开放性、兼容性、务实性,进取性。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岭南都市文学所创造的人物,都带有新生、超前和独创的意义。如果从80年代初期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说起,这是影坛第一个出现的个体户形象;《商界》出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干部转为商人的形象;《公关小姐》是市场经济才有的新人物形象;《外来妹》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涌现的新工人;《情满珠江》、《农民的儿子》更是塑造了新一代企业家的不同形象;《英雄无悔》是公安与企业嫁接的新人物;《和平年代》既塑造了和平时期新一代军人的理想追求,也塑造了和平时期新一代军人的理想追求,也塑造了从军人转为企业家的具有军人素质又具有企业家魄力新人。朱崇山的《风中灯》描绘英资杜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杜尼斯和华资集团代表人物孔希伦的勾斗和较量,又刻划出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大企业家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以及它所具有的超前性,又是和岭南文化的特质有关。正因为它是务实的,作家对当下社会转型期历史发展趋势的感应就特别灵敏,他们就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发现新的人物,创造新的形象。正因为它是开放的、兼容的、进取的,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就不是扁平、单一、定格的,知青可以发展成大企业家,公安局长可以具有企业家的才干,牧民的儿子在和平年代仍有一份对军人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些人物无一不是扣紧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为我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形象。从作家们在各个时期所创造的文学新形象,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所走过的足迹。

岭南都市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雅俗共赏。应该说,雅俗共赏并非广东作家所专有,许多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得高雅一些,又有更多的读者认同。但是,岭南都市文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追求,一是故事生

动而富有岭南地方特色；二是语言精彩而带有南国的韵味。

故事是文学作品中语言和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文学建筑的框架，它决定了小说的结构、主题、人物活动的天地。只有好故事的小说，才能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只有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才能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也只有好故事的电视连续剧，才可以让观众追着看。从故事来说，前面所举的几部电视连续剧都有生动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否则不可能创下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收视率的最高记录。那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因为抓住了人们关心的热点，演绎了一篇篇跌宕起伏有姿、波澜壮阔的生命体验，它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当然，岭南都市文学的作品也是多元化的。有的作家如张梅、张欣等，就不是刻意去编织故事。张欣所关怀的人物是在市场经济转轨中人们灵魂的安顿问题，表现出他们心灵的感受。张梅则更多地关注平常人的心境，写出他们如何享受改革开放果实的舒畅情怀，她所营造的文化语境是那样清幽、恬静，但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一股涌动着时代潜流。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情节紧张、引人入胜的故事也好，或者是以生活的感受连结的、似有似无的故事也好，它只能发生在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东，而不可能与其它地域的人物故事混同。

再说语言。这些电视连续剧的语言是通俗的、生动的、鲜活的，有些话还是精辟的。特别是翻译成粤语的电视连续剧，更是显出浓郁的粤味，那种情趣，那种韵味，令人心田熨贴回味不已。就是那些长篇都市小说，也是注意了通过语言制造氛围，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叙述生动的人物故事。雅俗共赏不是要淡化作品的文化内涵，而是要用喜闻乐见的活泼语言提出

能激发最大多数人共同欣赏和关注的文化课题。

我们在探讨岭南都市文学的特点时，当然也不应忽视它所存在的弱点和缺陷。岭南都市文化（包括影视文学）最大的弱点，就是文化的穿透力不强，它倾向于对世俗的认同，却忽视了对市民日常生活世俗价值的超拔和提升，缺少对历史深度的拷问，也难以引起哲理的反思。如果我们承认小说在本质上是人类精神自我追问的一种样式，是对生命意义深入思索的一分考卷，那么，岭南都市文学恰恰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因此，撼人心魄的大作并不多见。这种弱点，又是由于岭南文化的缺陷所带来的。岭南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岭南文化就具有浓重的世俗享乐的人性情调，它催人为追求幸福的人生而积极进取，又诱人追求高度的物质享乐。这种追求享乐的功能，也就导致人们常用感官享受和实惠的心理取代深层的哲理思考。

岭南人毕竟是聪明的，他们善于扬长避短。岭南都市文学的文化底蕴不厚，它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它敢于先走一步，但没有那种文化优越感。它不想抢夺发言权，它也实在没有太多新潮话语，也没有足以使它永远骄傲的荣光。这种淡泊的文化心理和承传意识，就使得他们在创作活动中更能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读者和观众的需要，也更敢于广采博纳，求变求新。岭南文化的这种缺陷，它所顺应的变化，是否又多少弥补了岭南都市文学中文化穿透力不足的某些弱点呢？

作者张绰，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陶原珂

南方都市文学的定位

黄树红

南方都市文学主要指以长江以南的上海、广州、香港、深圳等一些发展较快的都市为题材的文学。南方都市文学已成为我国都市文学的主体部分。

一、我国都市文学发端于上海

30年代初,我国还没有都市文学(或城市文学)的命名。茅盾《子夜》的出版,被人们看作是我国都市文学的发端。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30年代初上海大都市的生活。虽说它只叙写一个家族,未对整个城市生活进行全局性观照,但我以为它已经抓住了都市生活的实质,那就是都市性。都市是商品经济所结之果,《子夜》对股票市场的描写,正是茅盾对都市人在商业、金融背景下现实的物质关系、经济关系、货币关系的关注、探寻和表现。

二、我国都市文学拓宽于上海

40年代初,上海“孤岛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都市文学作品。张爱玲的作品以都市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写出她们的命运遭遇,折射出都市所特有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刻画出都市独特的生活方式渗透在人际关系与人的深层心理所形成的张力。“新感觉派”的作家们则“写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从舞女、公司职员到各类市民,以及劳动者、流氓无产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宽都市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

50年代,我国都市文学进展甚微,仅有《上海的早晨》、《不夜城》等少数上海作品,把题材拓宽到对民族资产阶级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社会问题上。

三、我国都市文学成型于香港

六、七十年代,当国内还处于闭关自守之时,香港已打破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倾销,也包括西方世界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输入。香港承受着西风吹拂。都市的无序发展与资本势力的急

剧膨胀,使得香港五光十色、多彩多姿。表现这一正在深刻变动的都市现状、都市故事和都市景观,剖析这一特定的中西文化冲突的现代趋势,成了香港都市文学勃兴的主要原因。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文学的都市色彩越来越浓,作家不仅展示了跑马、买股票、购物等各式各样的都市生活,也揭示了香港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态及心态。香港文学都市化特色的浓烈,标志着我国都市文学的成型。

四、我国都市文学发展于广州

80年代,全国卷起改革大潮。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又有着毗临港澳台的地缘优势的广州,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经济的启动,商品法则的弥散,使广州人的欲望结构中的金钱物质因素日益抬升与激荡,使社会原有的人际关系及情感纽带加速分化与重组。面对这一“历史时段”的现实图景,广东作家纷纷以自己审视都市的主体意识与情感,推出一批描写都市的作品,他们以独特的笔触,展示着现代都市的活力与忧虑,一些年青的作者也抒写出他们在都市中生存的体验。例如,张欣,作为长期生活在广州的女性作家,便以这座南国都市为背景,展示其现代化的运行轨迹和这一过程中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都市丽人,无时不在感受着都市生活的诱惑,又无时不在努力固守。她以比较成熟的都市意识和文化心理去观照这个现代都市的一切,通过对都市丽人的崭新精神品质与人格操守的再现,来显示作为南国都市作家对现代市民生活品位的提升的密切关注。张欣的小说代表了南方都市文学的一种特色。长篇小说《商界》则属全景式地描绘南国都市的作品。作家以全方位的视野表现广州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瞬息万变的商界。公司经理、银行家、个体户、知识分子、“右派分子”,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管理才干与经验,雄心勃勃地旋转着都市生活这架“万花筒”。从他们身上,我们谛听到当代都市经济改革的足音,感受到都市风景,同时也看到市场经济的剧烈竞争。

标志我国都市文学发展的,除了南国都市小说

外,还有南国都市电影、电视。仅从1984年到1989年,广东就出现了一批耀眼的影片:《雅马哈鱼档》、《都市流行曲》、《花街皇后》、《绝响》、《女人街》、《给咖啡加点糖》、《太阳雨》、《商界》等。这些影片,让我们触摸到南国都市及都市人、都市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南国都市电视则出现了像《公关小姐》这样获奖的作品。

五、我国都市文学繁荣于南方都市

90年代,我国都市文学有意识地走向繁荣,尤其是南方沿海都市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许多作家去关注,去描写。都市生活已经以不可拒斥的力量进入作家们的视野,成为文学描写的聚焦点。在上海,俞天白推出了“大上海人”系列——《大上海沉没》、《大上海漂浮》、《金环套》和《大都会》,这四部小说都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上海人作为重要表现对象。第一部所展现的是80年代上海市民的心态,一种封闭的心态。小说归纳为“衰弱巨人综合症”,具体表现为“老大”自居,“先前阔”的阿Q相。这种心态正在抵消着上海的技术优势。作家通过小说对改革初期上海市民心态的剖析,向上海人发出了警示。这部上海市民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显示了对国民精神揭露和反思的深度。后三部则把金融作为透视现实的切入口,围绕金融展开生活画面,表现大上海人对时代的积极参与。《大上海漂浮》中的环球证券公司总经理沈笑澜、《金环套》中的华茂证券公司事业部部长林洁、《大都会》中的八婺经济开发公司总裁褚婉敏等人,都是在经济改革浪潮上显身手的弄潮儿。他们的心态和拼搏精神,展示着时代的风采和诸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作为金融业的新生力量,他们都富有挑战意识和献身精神,都以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投入和搏击这股壮阔的时代大潮,都在显示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股票市场是现代大都市的重要标志,李其纲推出的小说《股潮》以上海当下生活为背景,直接以股市为窗口透视都市生活和人际关系。当股潮激荡着上海时,无数上海人神奇地被卷了进去。股市神秘地影响、改变和塑造着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欲望结构和价值观念。《股潮》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这幅现代都市生活与心态的出色画卷。李其纲的小说一直以“都市性”为重要支点,开掘着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方方面面。王安忆的上海都市题材小说,则较典型地反映出她的都市心态与看法。如《本次列车终点》等,表现出她对都市生活陌生又向往的矛盾

心情。《长恨歌》等近作,诉说她对都市既眷恋又无望的悲哀情绪。在广州,则出现洪三泰的《闹市》等一批都市小说,它们写了一群群都市开拓者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经济大潮中各色人物的表演,雄心勃勃与脚踏实地的、精明能干和唯利是图的、追求虚荣与哭穷藏富的、骄傲自大和自卑怯弱的、灵活敏捷和稳重务实的……交织在一起。张欣的小说人物,基本上都爱“钱”,无论是《伴你到黎明》,还是《驶出欲望街》,都表现出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时代的某些特征。在深圳,《世纪贵族》迸射出了深圳特区国营企业向开放型转换的历程中所遇到的尖锐复杂矛盾冲突的火花,我们称之为改革精神,它直接与经济联系着,其商业性更强烈,不仅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性,也给人以更大的自由度。香港的本质特征,不妨说是“钱”与“利”。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就是典型的现代商埠都市文学。以上这些南方近海城市,作为现代商埠大都市,这里充满着浓厚的商业主义气息,具有开阔、迅疾、新奇、时髦的文化个性。这里的文学无疑体现了商埠都市讲求实效、实惠观念的美学特征。

除了都市小说,“小女人散文”的出现,也为我国都市文学的繁荣出了一力。“小女人散文”产于广东而兴于上海。90年代初,以黄爱东西、黄茵、张梅、石娃等为首的一批广派女性作家带着她们独有的散文在上海“登陆”了,其欢迎者之多难以统计。一时间,忙坏了上海的报刊、出版社,又是发作品,又是出集子。作家们端出了一碟碟“粤菜”,让读者品尝到小康型的滋味。她们笔触所至,既有宾馆、商场、美容院、影院、歌舞厅、广场等一切现代都市场所,又有家庭里太太群的种种心态、白日梦般的幻觉等,无不让人感受到现代都市气息。南方都市话剧、电影、电视也处在繁荣中。

现代商埠都市在呼唤作家的现代都市意识,诸如新的心理结构、新的价值坐标、新的观念形态、新的人文体系的萌芽与形成等等。南方都市已有许多作家对都市未来发展趋向作着诗意的设计,他们把眼光往前看,努力挖掘和表现都市生活的诗意,那就是不断催生人类新文明的东西,它将使人类从中看到明天的曙光。南方都市作家在为创造出具有雄浑、崇高美学品格的都市文学而努力着。

作者黄树红,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510030)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新都市文学：文学现代性的实践与期待

□ 宫瑞华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90 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国文坛可以说是“新”旗帜林立：新写实、新现实、新乡土、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也就在这个标新年代，深圳《特区文学》（1994 年第 1 期）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

本世纪的后 20 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与此同时展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虽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形式和内容都急剧变化的时期，但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想，这就是大家都共同感受到了、并努力想总结、把握的东西。也由此形成了“文学的标新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大时代的现象仅从某些特征去总结，势必会造成某种缺失。为了避免流于表面性，我们必须抓住它的元初话语。

“新都市文学”的元初话语就是现代性。

一、“新都市文学”：“现代性”话语

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规定和把握，更应当理解为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型的价值秩序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

在西方，现代主义 60 年的繁盛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现代主义精神作为一条主线，从 16 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

关于现代性对中国的进入的考察，应该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了它在本世纪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峰中也有着这个潮流的涌动。

可以这样说，20 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便是对世界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延迟进

入，而本世纪最后 20 年形成的高峰是对现代性更加自觉的进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都市文学”所调用的“现代性”元初话语，是非地域性的，应该是当下中国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也是一个历史范畴。

二、“新都市文学”：“现代性”的“中国情境”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深圳是一个有着独特意义的城市，她同整个珠江三角洲、已经回归的香港和回归在即的澳门，正在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新都市带。在这个新都市带中，她又因地缘优势占有独特的文化位置。

早在 80 年代，深圳年轻的女作家刘西鸿以一个短篇小说，为中国人创造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你不可改变我”。而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国曾一度时髦的是“你别无选择”。从“你别无选择”，到“你不可改变我”，由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变更新了人们的经济观念、文化观念、人关于自身存在的观念。观念的更新导致了文学新质的产生，也导致了文学语境的重构。

在刘西鸿的这个短篇的前后，深圳和我国其它沿海开放地区的文学出现了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当时中国文学的中心话语的一支。这些作品极敏感地捕捉到了现代城市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躁动。这就是梁大平的中篇《大路上的理想者》、谭甫诚的长篇《水之华》、王小妮的中篇《热的时候》、李兰妮的中篇《他们要干什么？》、林坚中篇《别人的城市》、黎珍宇的长篇《界河儿女》和中篇《咸水淡水》、郁秀的长篇《花季、雨季》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尚未形成文学上的大气候，却给文坛带

来了一股新的气息。

当然,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话语。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划分方法,可以把社会分为三大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效益原则”,在政治领域中起作用的是“平等权利”,而在文化领域当中,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效益原则”,也不是“平等权利”,而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贝尔说:“生产效益较高的机器或工艺自然会取代效益低的。这其中的含义是进步。但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

在上述作品中,就其文本的形式、语言探索等方面来说,并没有超出甚至达到同时期文学的水平。但却在另一层面上形成了与时代“对话”的特征。

《你不可改变我》中的令凯,几乎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个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选择生活道路的女性形象。《大路上的理想者》中的“我”,在新价值观的激荡之下,开始了漂泊式的选择。现实也许并不尽如人意,在这样的满怀理想的选择的周围不乏“连月亮也敢卖”的荒诞氛围,但是理想者的理想具有永久的魅力。《水之华》中才华横溢的小个子马波利在形而上的思辩和现实的夹缝中难以平衡,但现实毕竟造就了一个在以前的时代完全没有成功可能成功的安琼;林坚的长篇《股市大炒家》中的主人公曾在股市上叱咤风云,完成了世俗的历程之后,却从人间“蒸发”,成为一个自我价值判定的寓言;因深港地缘而形成的价值冲突,是黎珍宇的系列作品中的一个主要情境;这种冲击并不仅仅局限于成人世界,甚至连未成年的中学生都面临着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花季、雨季》)。

仅从深圳这样一个局部就可以看出,作为文化的一个主要层面的文学,就是这样以“中国经验”的独特方式参与了中国正在展开的这场跨世纪的变革——中国的现代运动。

其实,对于深圳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的。批评家和学者们对于特区文学的探讨,更多地是着眼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上。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一批直接讴歌改革开放的作品在深圳产生,内容和题材上的新鲜感给人们带来了兴奋,于是大家都在探讨“特区文学”的“特”味。深圳由一个两万人的边陲小镇迅速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而且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给深圳带来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因此有人又由此提出了“移民文学”的说法。稍后,在深圳的大批外来工中有灵性者又写出了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于是又有了“打工文学”的说法。应该说,这些探讨都给深圳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实践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又都有一定的局限。第一,过于侧重题材;第二,强调了新观念,但更多地关注了经济生活观念的改变,而不是从社会整体的价值评价着手;由此而产生了第三点,使得这些批评话语实践游离于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整体的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之外。

作为“新都市文学”的批评实践和创作实践,它所期待和强调的是作家的自觉的现代意识,即作家自觉地实现现代价值评价的转变。这也是“现代性话语”的基础和核心。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自觉地建立起现代价值评价体系,他自然无法进入“现代性话语”实践的领域。

三、“新都市文学”:现代都市精神

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在文化——文学发展上也开始引人注目。以上我们所论及和没有论及的“新都市文学”文本,都是以新兴都市为背景展开的叙述。

城市文明是现代性文化的文明。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是以现代工业大生产为支柱、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底蕴的经济结构形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也必然是以这种经济结构为依托所产生的价值评价。

对于“中国情境”来说,整个20世纪文化,艰难但坚决地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但是,城市意识仍然薄弱,仍然需要现代性价

值体系的冲击。如同当年美国用其冲击小镇意识。而中国面临的仍是诸多的封建价值评价。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散地。建立在现代价值评价体系上的文学,也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学。这无论是19世纪以来的欧洲,还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都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以城市为背景的叙事空前增多。“新都市文学”的提出,就是要大力倡导作家要在独特的“中国情境”中完成价值评价的转变,并完成我们“中国情境”五彩纷呈的多元的宏大叙事。

现代人对于城市的感情是多元的、复杂的。我们常常听说现代人的孤独,可现代人的孤独也有城市诗意,这种孤独又是不能远离人群的孤独。“采菊东篱下”是陶渊明的孤独,不是张爱玲的孤独。本雅明说:“波德莱尔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孤独是稠人广座中的孤独。”但孤独也是一种魅力,是城市的魅力。狄更斯外出旅游时,常常抱怨没有热闹街道,因为这对于他的创作是必不可少的。波德莱尔憎恶布鲁塞尔,因为那里的街道没有橱窗,影响了他的想像。而张爱玲则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

随着城市的增加,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增强了。这是经验的融合,它提供了一条通向新的生活方式的捷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城市也越来越扩大,到1994年,中国已经有622个城市。广东现在就有50多个市。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3亿,这3亿人有大量涌入城市。打工仔打工妹他们这个年纪原本是在农村生孩子养儿育女的年纪,可是现在大量涌入城市,接受现代化工业的洗礼,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极有特色意义的事情。

作家面对的题材可以是农村题材,是荒原、远古式的题材,但它所贯穿的却必须是现代价值评价,是都市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都市文学”并不局限于都市题材。

“新都市”也不是相对于“老都市”而言,“新都市文学”也不是相对于旧有的城市文学而言。它们的分野,不仅仅是题材上的,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最典型的比如说《废都》,写的是城市生活,体现的却是农村意识。

《废都》可以说不是是一部城市小说,起码不是一部现代城市小说。《废都》的中心人物、中心语汇、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都不是关于现代化城市的言说,它是一部诞生时代倒错的中国式的旧文人小说。特别是作品中“牛”的笨拙的所谓“思辨”,更是封闭的旧文人哲学、封建农民意识对现代精神的直接否定。甚至对戴口罩、洗手洗脚、刷牙都要提出质疑。

而刘震云最新的一个长篇的第一章《故乡的面和花朵·东西庄的桥》中有一段写两个上了年纪的农村老太太闲谈,背景是60年代。作者将强烈的主观心理分析和充满机智的描写揉合在一起,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现代叙事。

经过历史检验的文本所凝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历史赋予的时代精神。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新都市文学”,我们更多的不是从一种题材方面来探索,是要探索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富于个性的时代精神。就这一点来说,广东作家们有着“地缘优势”,得风气之先,应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新都市文学”:对文学遗产的征用与创新

在中国,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甚至会出现“现代性话语”实践先于现代化社会运动的情形,五四时期就是如此。在后发达国家中,“现代性话语”实践往往会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防止的是将“现代性”话语的狭隘化理解。

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文学作为一把政治——社会批判的利剑,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之后,新时期文学走上了以模仿与借

鉴为主的“探索”、“创新”的旅程,10年间,“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作家们和目不暇接的读者们匆匆领略了西方文化的百年历程。作为一种历史的群体补课和启蒙,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80年代确实使我们眼界大开。

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到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文学昔日的雄风和灵光已经消失,始自“伤痕”文学的政治——社会批判所引起的那种“轰动效应”已不复存在;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所带来的“新奇效应”也已是昨日黄花。

想当年,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曾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焦点。到如今“前卫”、“先锋”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性。文学的“现代性”话语实践当然包含了对僵化结构的扬弃,与传统的艺术表现观念决裂。但是,“前卫”、“先锋”决不是现代性话语的全部,如果那样理解就太狭隘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现代性话语是一个宏大的叙事。

单就小说来看,《追忆似水流年》、《喧哗与骚动》是现代小说的杰作,但谁又能说米兰·昆德拉的《不朽》不是现代小说?谁又能否认昆德拉对现代小说的贡献?真正的现代艺术家也追溯原始,顾念传统。所不同的是,他们是把人类的全部文化遗产超时空地征用和重新组合,以达到创新的目的。在这里,“征用”和墨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如果流于晦涩、抽象或单纯地耍小聪明,用文学自我意识的糟粕来取代传统主义的糟粕,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都市文学”所强调的“现代性话语”指涉,并不同于“前卫”、“先锋”,它强调的是对文学遗产的征用与创新。还需要提及的是,在艺术探索上,深圳的创作实践,还有许多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广东的创作也如此。

作者宫瑞华,深圳《特区文学》副主编(518008)

责任编辑:陶原珂

都市文学与“都市”象征

金 岱

都市文学这个说法,似乎是有一道都市作品的风景在逐渐可观起来。但我总觉得,这都市文学的所指,并非某种或某类作品,而是朝向现代文明之观念、意绪的一种总体趋势。

这都市文学,首先应当区别于先前便有的那种都市风情作品。一些当代文学史中谈及的都市风情作品,关切的是某些城市的风俗人情,而都市文学不是。都市文学的兴奋点应是都市意识、都市情绪、现代观念。

中国的确正在相当迅速地都市化起来。和发达国家比,我们曾经,或者说现在仍是,一个巨大的乡村,北京、上海、广州其实都还是乡村。我们以前的文学基本上是乡村式的,尽管写到城市,写到干部,写到工人,却仍是乡村式的,因为意识和观念是乡村式的。而这一、二十年来,中国以非比寻常的速度朝着城市化前进,作为中国式“圈地运动”的民工潮以及乡镇企业的笋立正在使中国的乡村城市化,观念和面貌的刷新也正在使中国的城市渐渐名实相符起来,总之,经济形态的转轨,深层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更替,互相滚动着,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学,这一社会的感觉神经与此一大势是不能不密切相关的。

都市化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不是全部。

所谓现代化,我以为便是十四、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经由葡萄牙、英国、法国、欧洲、美国、俄国、亚洲、中国……………这样一种巨大的人类文明的转移过程。这一看似漫长,实则短暂(和整个人类历史比较起来)的文明转移过程中,包含着各样的方式和极多的现象,都市化只是其中的现象之一,而且到了后现代时期,都市化正在成为弊病,需要尽力设法克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随着通讯和电脑的发达,随着远距离的,分散的,居家即可的集体性工

作成为可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都市乡村化(这一乡村当然已非传统文明意义上的乡村)。

为此,我有时会发出疑问,都市文学这一概念是否会缺乏足够的涵盖力。然而,我又很快转念,如果不是把都市文学中的都市一词看作一种完全的实体概念,而是看作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现代情绪、现代体验的标志和象征,那么,都市文学这一说法仍然是有力的,它的形象可感性,尤其实实在在地代表了当下中国人的进步的渴念。

我想,都市文学应该是有别于政治文化氛围下的文学,而属于经济文化氛围下的产物,它应既具有从众的、通俗的、消遣的一面,又具有与之相平衡的、个性的、高雅的、张扬着新的人文精神的一面;既具有赞赏着我们的都市化进程的一面,又具有着批判这一进程带来的新的弊病,新的危害的一面;既具有表达现代观念、现代生活和都市意绪的一面,又具有相应的审美态度和艺术形式的一面……

总之,只要不是站到中国这一文明进程的对立面而横加阻拦的文学,或者自以为是现代,却抱着传统思维方式不变的文学,我看都可以算作都市文学。

作者金岱,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510631)

南方都市: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话语

喻季欣

南方由于特有的地缘优势和地域文化传统,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内涵和发达,十分引人注目;南方都市产生的生活倾向和时尚,也因此容易被人们视为时代潮流。因此,南方都市文学在生活 and 时尚的层面,有了先声夺人的影响力。南方都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话语就具有可能。

但现实是,这种可能没有达到应有的力度。

为什么?我想可以从以下这些角度考察。一是没有形成阵势的作家群和作品群,尤其是个性鲜明的以南方都市生活为作品主要图景的作家不多,真正把握了南方都市生活特质的作品甚少。尽管我们对南方都市文学可以下许多定义甚或肯定它的优势,但真正举例分析时,难以如愿。二是对南方都市文学特色或个性的界定与把握,我们始终停留在生活的一些表层,注目所谓的优势(也无非是变化快、富裕程度高、杂以港澳影响),而未深入到文学应有的历史积淀、审美情趣和文化氛围。从文明的进程说,都市的物质特色并不重要,而人的文化内容和生活情操才是最有审美意义的。这方面,倒是南方的影视脱颖而出,产生了有美学意义的特色。这很值得深入探讨。三是我们对都市的认识与理解,真正从文明的高度与广度去思考、反省的不多,或不太深刻。都市并非尽善尽美,并非真的那样“优势”十足。恰恰是在都市,引发了人类的巨大困境,尤其是我们刚刚“进入”都市,显得盲目而粗陋,对人类命运、大自然环境关怀甚浅,没有真正具备作为生活的先导者应有的博大情怀和自省气概。比如,最近的电影《铁达尼号》就足以让我们借鉴与反省。我始终认为,这部影片是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反省,物质的巨大与先进,解决不了人类的困境,没有亲和自然与关怀人的异化的胸襟,我们总是无法避免自以为不会出现的悲剧。如此说来,我们期望的南方都市文学还在萌芽状态中。

然而,南方都市文学成为一种话语是不用怀疑的。从积极的角度说,需要我们更坚定、更深厚地去推动它。这里有两个方面尤要执着。一是从“都市”的向度体现南方。对南方都市文学,关键词是都市而不是南方,如果总是强调文学的地域范围,意义不长久。都市是生活,是文明,是人的价值观与时代观,这个向度,文学的矿藏才是本质的。从“都市”体现南方,可能成为文学的一些特质。二是从南方反省都市。如果把南

方作为一种参照,对都市的感受与把握会更诗意一些,也可能更理性一些,文本的开掘也会更厚实一些。我们对都市的思考,包括对南方的思考,是在对立统一中比照,在进步的欢乐与异化的苦涩中交融,我们可以展现文学真正的美学诗意。

因此,南方都市文学的话语身份,能而不易。

作者喻季欣,《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编辑记者(510620)

中产阶层: 南方都市文学的审美焦点

柯 可

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化的时代剧变中,反映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生活、以活跃在都市舞台上的现代人为形象系列的都市文学,无疑以中产阶层为其审美焦点。中产阶层尤其应该是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社会变革风浪漩涡中心的南方都市文学的审美焦点。

所谓中产阶层,从来是一个相对于社会富裕上层与社会贫穷下层之间的中间阶层,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消失。

如果说,社会上的财力雄厚者、高官厚禄者(含巨额隐形收入),即把握社会经济命脉和政权的一族,可视为位居要津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上层阶层,而文化素质较低,靠体力吃饭,时常受下岗困扰的打工族,可视为受制于人、位居社会基层的下层阶层的话,那么处于二者之间,有技术、有文凭,文化素质较高,靠脑力吃饭,有的进入管理阶层、公务员系列或有各类职称,无决策权却有参谋权、设计权、处方权、鉴定权、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活跃于科教文卫部门、信息部门、管理部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及因离退休、离职、转行等各种原因由上层而中层,或因深造、转业、特聘、发达等各种原因由下层而中层的一群,构成了当今都市结构复杂、活力非凡的社会中产阶层,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膨胀且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阶层。

正如众多社会科学家所阐述的那样,社会中产

阶层是当今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阶层。它是上下阶层的中介,是缩小两极分化、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比起冲动而难免盲目的社会下层,它多了些平和与理智,而比起养尊处优,高视独步的上层来,它又显得不太安份而更热衷于变革与创新。

显然,当代都市文学的审美焦点,应更多地集中于中产阶级这一反映时代脉搏最敏感、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潮流的最积极的中坚力量身上。事实上,不论是货币分房的新房改措施出台,还是各级政府机构的大裁减与再就业,或是大工业型大都市向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型大城市的转化,其巨大的风险和浪漫的传奇都将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和不竭的动力,向上的追求和坠落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对世界格局的清醒观照和自觉承负历史责任的民族自尊心。显然,过去那种以为越写上层的决策之争,越显出作品的“高深”的倾向,以及越写下层的“打工仔”的艰窘和都市痞子的粗暴,就越显其“通俗”和平民化的倾向,其实都陷入了都市文学的审美误区。

在深入探讨都市文学,尤其是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南方都市文学的今天,明确中产阶级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审美意义,对其生态和心态均予以适度的审美聚焦,在都市文学的批评导向上加以强调,是时代的必然,是文学的使命,是批评的职责。

作者柯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510620)

南方都市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张墨琴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任何一种思潮只要研讨会一开、专辑一出就预示着不日即成“昨日黄花”。不知道都市文学是否也循这条路?但显然我们今天开这个南方都市文学研讨会其宗旨毫无疑问是要促其发扬光大而不是加快其死亡。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尽可能地帮助它绕过这个致命的暗礁。

“都市文学”这个口号由《特区文学》1994年提出,我以为有着很大的随机性、自然性,是随着深圳、广州、上海等准都市或都市相继出现、形成,人们信手拈来的一个词。这种随机性、自然生成性赋

予了这个名词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气”。金岱老师在这次研讨会上就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欧洲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就已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我们的背景。都市文学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界定:一与“现代化”等同,凡是支持这个进程的、体现现代意识的,无论城乡、古今历史题材、儿童类小说都可算在都市文学之列;二是现代化进程里面的都市文学,既同样要求支持这个进程,具有现代意识,又要是反映都市生活的才算都市文学。可以看到,即便是后一种“窄都市文学”也仍然是一种空前自由的思潮:内容不限、形式不拘,只要是都市的就行。这种自身多元性特质就回避了以往自己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的尴尬,赋予了都市文学现实生存的能力:不会因题材或手法的极端、偏狭而日趋萎缩。至于将来,既然“现代化”和“都市”都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事物,将自此永远发展下去,那么都市文学又何以要萎缩呢?所以说都市文学在自身内涵和外延上不同这种文学的特质,使它大可以继往开来、永保生命力。

赵长天在《为了诗意地居住在新都市——96新都市文学理论研究会纪要》里的话“深圳不同于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上海’,不易淹没,很有力量,这种冲突就更加强烈。对上海这个城市,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之感……”。言下之意有了“老上海”作参照系上海作家比起其他作家更感棘手。

我以为,有参照系统反而使文学创作有章可循——洞悉“彼”,再观察“此”,彼此一相连就可挖掘出可写的东西。所以上海的作家不是比深圳的作家难,而是容易得多了。但是容易不等于好,更不等于能写出好作品,因为这太有可能把作家思维套在一个模式里——“比较出文学”,而忽略了当前生活中某些不能对比、也或许没有可比的“新质”。这是上海文学的隐忧。深圳一样有,虽说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就这个城市而言,它似乎没有前身;然就这个城市里的人而言,他们是有一个“旧我”的存在。所以,南方都市文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参照系的都市文学,它不同于上海是新、老上海的对比,这里的“参照系”大体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空间上的对比——南方开放城市与移民前的内地的对比,如《深圳人》、《小个子马波利》;一是时间上的对比——昨天与今天生活的对比,尤其体现在知识分子下海前后的矛盾冲突中,如《吾人下海》、《路过你的路》;还有一个是文化意识上的对比——都

市文化心态与他种文化心态(主要是农村)的对比,像《城市独白:不安的视线》这种“反都市”的精神漂流的故事。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这在中国尤其突出,特别是中国还有一段“文章下乡”“向工农兵学习”的“传统”与历史,这更使得中国人形成一种生活形式上追求都市化,心理、价值评判上倾向乡村化的别扭局面,于是文学被纳入了农村⇌城市的张力系统中。这种有参照系的文学同上海文学一样,若处理不好就会掉入“简单化对比”创作的陷井中。

南方都市文学里还有一类是没有参照系的文学,商战文学、情战文学、打工文学可属此列。有没有能力处理好一个没有参照系的都市,这对南方都市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作为一个没有历史、没有积淀的移民城市,没有过去,有的只是现在和未来;如果文学不能把握、驾驭现在,则最终会成为失败、枯竭的文学。这最重要的又是现在最弱的。目前这一类文学,首先题材面不广,大多圈在商场、打工层面,也顺便涉及一点感情纠纷,没有发掘更多属于都市风景的东西;其次是流于肤浅、浮躁,只写了浮在城市表面的泡沫,对泡沫下面的东西揭示很少。这方面创作的明显劣势是南方都市文学最大的隐忧。第一、第二代移民作家还有个“旧我”可以咀嚼,第三、第四乃至以后呢?所以,立足当前,寻找一条写好、写深没有参照系文学的路

子的确是南方都市文学的当务之急。

没有参照系的文学不好写。它不能像有参照系文学那样在创作心理、思维上有某种模式可依,它完全得靠作家的感悟力,靠作家发掘生活、思索生活并演绎生活的功力。而没有参照系的文学又是如此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参照系的文学最终也是为没有参照系的文学服务的。因为文学总是为了揭示常人所不易察觉的现实生活表面下面的东西,拿过去作参照系也是为了说明现在。都市文学不能仅仅流于描述动态的生活或者写写感性的文学这一层面,应该有人静下心来真正做个都市的冷眼人,好好地观察这种生活,然后发掘出某种“意义”。真正的都市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它衍生出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别的文明的东西(或说“都市文明”为何物),都市人的生存状态。“都市”对人意味着什么,……最后,怎样用文学的手法把这些抽象、形而上的内容表现出来?南方都市文学缺少的就是这些。我想,我是在要求一种哲学意蕴上的都市文学。否则,都市文学要么和其它流行文学一样淹没在浩荡的文学史潮中,要么沦为与通俗文学相同意义的东西。只有这两种可能。

作者张墨琴,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东·西·方·史·诗·比·较·论

□ 刘劲予

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古罗马,分别是后世的西亚——东南亚宗教文化圈和欧——美西方文化圈的发祥之地。远在古代传说时代,这里的先民便通过长期的口耳相传,各自创作了下列的伟大史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罗马的《伊尼德》。这两组东西方史诗在内容、形式及历史形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思想内核,结构原则与膨胀机制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比较它们的异同,探索其文化史上的意义。

一

巴比伦史诗的雏形在苏美尔时期已经形成,公元前18世纪编订成书。印度两大史诗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荷马史诗基本情节约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用文字记录下来。古罗马史诗是文人史诗的范本,成书于公元前8年。史诗的形成与扩充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充分发展,二是史诗题材的获得和加工。荷马史诗的描写与考古学所发现的特洛亚城的第六次毁灭有多处吻合,说明荷马史诗的题材源于特洛亚战争。印度两大史诗则是基于原本是同一家族的两个支系——般度族与俱卢族的部落战争。当古代人历经氏族融合、部落争战和国家产生等阶段时,有关的重大事件影响到民族集体的生存与发展,引起民族集体的关注、思虑、怀想,或有关英雄人物的行迹受到公众的景仰、推崇,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英雄人物就成为集体口传的题材和艺术加工的“故事”。特定的“故事”提供给人们解释世界、演绎民族历史变迁,表达思想愿望的理想题材,经过人们一代又一代的

传唱,加工、演绎,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其容量越来越大,就构成篇制宏伟的史诗。

述“史”是史诗的基本主题。《吉尔伽美什》叙述部落首领吉尔伽美什英勇善战,为民建立功勋的史实。《摩诃婆罗多》的主干故事叙述婆罗多族中般度和俱卢两家族为争夺王国统治权的斗争。《罗摩衍那》叙述罗摩王子由流放离国到复国为王的复杂经历。两者综合反映了古印度由氏族社会到列国纷争的历史轮廓。《伊利亚特》叙述希腊和特洛亚两个部落集团的一场战争。《奥德赛》的故事情节是前者的延伸,叙述希腊英雄俄底修斯战后离开特洛亚,返回家园的曲折经历。它们保存了关于迈锡尼文明的模糊记忆,也透露了荷马时代的有关信息。《伊尼德》叙述罗马帝国产生的历史,神化了屋大维王族,歌颂了屋大维本人。

然而东西方史诗所述的“史”并非严格意义的史实,历史印记与神话传说水乳交融是它们共同的特征。这有着人类文化史的深刻原因。神话是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最早也是最粗放无羁的反映和投射。“在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中,神话证明是初始的因素,历史是第二位的派生的因素。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①史诗固然要在一定的“故事”中叙述特定时期的“史”,但那“故事”对于史诗的传唱者来说,是可以而且有必要向前溯源和向后演绎的。溯源必然要到经验事实与神话传说交融的迷离世界中去寻找人类的起源,民族的产生等。于是便出现史诗“故事”对神话传说的吸纳,或神话传说向史诗“故事”的渗透。正由于此,世界许多民族的史诗同时也是神话传说总集。

当史诗在集体中代复一代地口头传唱演绎时,它们的融合了历史题材与神话传说的“故事”总体就逐渐扩展为一个“松动”的

框架,从而溶进更多的后世添加的内容,甚至“非故事”的种种成分。印度两大史诗在主要情节之间吸收了大量的“插话”,并且包含了政治、哲学、宗教、法律等方面的成分;荷马史诗也汇集了古希腊的天文、地理、宗教、艺术、哲学等一切知识。这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各种精神文化因素还没有独立分化,它们的传承又大都以诗歌为载体,因此它们就被浑然一体地编织进史诗的结构中来,从而使史诗成为包罗万象、珠玑满目的“百科全书”,成为后世各类精神文化的源头。

古巴比伦史诗把战争史实及祖先与大自然的斗争(海上漫游)合在一起。古印度史诗则一分为二,《摩诃婆罗多》主要是记叙战争史实,《罗摩衍那》记叙森林中的漫游。古希腊史诗也分两部,《伊利亚特》记叙战争史实,《奥德赛》记叙海上漫游。古罗马史诗又把战争史实与海上漫游合成一部。但不管是东方史诗还是西方史诗,无一例外地都对战争中双方的英雄给予歌颂。他们把不怕死,勇敢战斗视为最高美德。对阿喀琉斯如此,对赫克托耳也不例外。对罗摩如此,对罗波那也不例外。歌颂英雄主义成为史诗的主要倾向、女子的贞洁被看成是高尚的操守。悉多受到赞颂,珀理罗珀也受到赞扬。它们显示了人类文学和文化发展的某些共性和一般规律。然而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心理结构等毕竟各有特点,这使他们的文化建树既有人类共性又呈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当印度两大史诗与荷马史诗在恒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互不相干地传唱的时候,它们已在两个不同文明母体中孕育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二

从人物构成上看,东西方史诗都是神人杂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只是表层的相似,当我们走进它们丰富斑斓的内在世界时,会发现二者的结构及其重心并不相同。西方史诗主要是对“人”的关注,东方史诗则重在说“法”。

尽管神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奥德赛》的

描写重心在人而不在神:它是以主人公艰险曲折的回国历程为线索来展示“人”的智勇谋略。《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情节主线,他的两次“愤怒”决定了战事的发展和结局,其作用远比宙斯代表“命运”的天平来得重要和突出。同时,史诗穿插其他英雄人物和奥林匹斯诸神的活动,经纬交织地铺叙战争的发展,这种安排是把人放到了整个故事画面的前台,神则被置于模糊的背景位置。

西方史诗在以人为主的安排中刻画了人的高大形象。《伊尼德》和《奥德赛》自不待言,《伊利亚特》向我们讲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俄底修斯、赫克托耳等,他们是大写的“人”的群像。作为大写的“人”的典型代表,史诗还对一两个最突出的人物作了“个人特写”,展现了他们丰富的人性特点。如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史诗刻画了他作为战士的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也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丈夫的温柔、作为父亲的慈爱和为人兄长的仁厚。阿喀琉斯是所有神、人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中心人物。史诗表现了他的非凡神勇,他的天真任性和率直暴躁,甚至残忍。黑格尔说,“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②

以人为本,但不作善恶评判,不去区分人物行动的正义与非正义,而是着力设计,表现和讴歌屹立于天地间的“人”的伟大品性,这是西方史诗的内核所在。就是它所描写的若隐若现的神界,也曲折指向和反映这一内核。其神没有东方神祇的神秘和威严,不像东方的神那样三头六臂、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有着人的形貌、人的七情六欲和各种缺点,他们互相争斗,与人交往密切,和人恋爱婚配甚至发生纠纷被人打败。除了长生不老和比人具有更大威力外,神与人同形同性。神话是将人的力量异己化,又将异己的力量人格化。西方史诗在这种“人神同形同性”的神性表象里实际蕴含着人性的提升:作为“实体”的神,他们的“缺点”衬托了人对自身的自信和肯定;作为“偶像”的神,

他们的自由翱翔、长生不老,有超凡的威力,是人对自身形象和能力、智慧,美质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理想追求。

就在人性与神性的交相辉映中,西方史诗充分展示了人的个性、才能以及与自然抗争的精神,突现了人的价值、地位和意义。这表明了人本主义精神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滥觞,这是主导方面。西方史诗的思想构架还有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高举人性理想大旗的同时,它也发出了“人无完人”的感叹。历经磨难的“智多星”俄底修斯说:“可见得生人赋性不均匀,美仪容,聪慧心,善辞令,不能兼备一人身”。③特洛亚战场上的群雄个个身材魁梧,勇武有力,但人人都有缺陷,连“神样的阿喀琉斯也会失错”,他的血“注定要染红特洛亚的土地”。作为人性提升的神也并非万能,人、神都受到“命运”的制约和摆布,宙斯也得服从。但这不是简单的“宿命论”。大写的“人”与“命运”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不断进取的“人”与“命运”抗争,这里已隐约露出人对世界的怀疑精神和求知冲动的曙光。

东方史诗以《摩诃婆罗多》为例,它的内容大体由主干故事、“插话”和关于法制、风俗、道德规范等论述三部分组成。表面上看似似乎杂乱无章,其思想结构却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就是“法”。金克木先生指出“我们的传统是‘文以载道’,他们的史诗传统可以相应说是‘诗以传法’”。④两大史诗无论是叙述故事还是穿插进格言谚语,都时时处处在说“法”。《摩诃婆罗多》插话《莎维德丽》的女主人公说:“智者们都称道道德正法,因此善人们称道法为第一宗。”⑤她还说“唯有善人以真理引导太阳运行,善人以苦行法力支持着大地”。她所说的“道法”、“正法”、“真理”都是“法”的别称,天、地、神、人以及自然就是靠着“法”的维系才整然有序,循环无终。

东方史诗向我们展示了由“法”所维系的世界图景,即神、人、自然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神、人、物处于不断轮回因果报应的宇宙“三界”中。大梵天能创造、预言,但不能毁灭或命令,毁灭的任务交给

了湿婆。有毁灭也就有保护,保护之神是毗湿奴。天神和他们的敌对者阿修罗不能互相消灭。在世的人不是“无区别的大写的‘人’的群体”,而是一个有着神圣宗教——政治等级关系的共同体。如《罗摩衍那·童年篇》所言:“从来没有不事法的婆罗门……刹帝利服从婆罗门,吠舍又把刹帝利来服从,首陀罗忠于自己的职责,他们服从前三个种姓”。前三个种姓可以“再生”,非再生者的首陀罗则必然是前世作恶的报应。所有这些关系和现象都是“法”的具体显现,“法”是世界构成的形而上原因,也即是世界的本原。

“法”是源于婆罗门教的一个宗教信仰体系。史诗虽然没有对“法”作出理论的阐释或界定,但表明了“法”就是一切。“法”是世界的神圣原则。“法”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传统秩序,社会中人的不平等的结构关系是永恒的规律。“法”是真理,是正义,是道德,也是最高价值标准。依“法”苦行的婆罗门仙人,或代表正义却又失去国位流落到森林修道的王族武士,可以获得征服自然、改变现状的威力无穷的“法力”。例如《摩诃婆罗多》中有一位达刹仙人,他将27个女儿嫁给月神为妻,月神不一视同仁对待自己所有的妻子,也就是不遵循“法”,被达刹仙人用咒语诅咒而变小了。史诗时时告诫世人要“遵循道德正法”,“永远德行崇高始终不渝”,如此才能“掌握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摩诃婆罗多》所传的“法”具本体论色彩,其中的主干故事——般度族与俱卢族的斗争,主要显示了正义对非正义的斗争和正义(“法”)的必然胜利。坚战遵守正法,难敌违背正法,因此弱小的坚战一方最终打败强大的难敌一方。《罗摩衍那》的“法”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了罗摩兄弟、罗摩夫妻之间的家庭伦理法。罗摩的克己、正义等美德比起他的武艺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古巴比伦史诗也一样,前吉尔伽美什被批判,后吉尔伽美什受颂扬,原因正在于他的为人道德的转变,善恶之分是衡量英雄的标准。

“法”是宗教的,也是理性的。东方史诗籍着“法”对世界、社会、人生等作出了既丰

富复杂又系统完备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不仅需要世代积累的宗教热情,还需要世代积累的智慧 and 思辩才可达到。它们全方位地铺开了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等的画卷,显示了宗教理性在东方的巨大影响及其所达到的高度。

三

史诗如神话一样,也是人类童年的艺术。由于东西方史诗同是产生在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折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推崇的时代精神十分相似,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愿望和追求,因而东西方史诗产生了许多契合点。从文学渊源上看,西方史诗的形成曾受到东方史诗特别是《吉尔伽美什》的影响。青铜时代的希腊世界与西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完整的利凡特文化区。《吉尔伽美什》中的一些情节场面或细节在西方史诗中也可以见到。如吉尔伽美什在旅途中遇到海峡女巫西杜利,她劝英雄放弃寻求永生的辛苦旅行,从此过享乐的生活,但遭到吉尔伽美什的拒绝。《奥德赛》同样写俄底修斯遇到女神卡吕普索,她也劝他不要再跋涉,留下与女神共享长生,但同样遭到英雄的拒绝。又如《吉尔伽美什》中有恩启都因杀神牛而触犯天神,被咒致死的情节,《奥德赛》也写了俄底修斯的伙伴伤害神牛后,遭到天神惩罚,被雷电击死的情节。还有在《吉尔伽美什》中,恩启都死后,吉尔伽美什“就象狮子一样高声吼叫,就像被夺走子狮的母狮不差分毫,他在朋友尸体前不停地徘徊,一边把毛发撕弃散掉,一边扯去摔碎身上佩戴的各种珍宝”。而在《伊利亚特》中,则写到阿喀琉斯在好友阵亡后痛不欲生,滚在地上,抓起泥土撒到头上,不停地撕扯自己的长发,吼叫之声震动山海。东西方史诗这些类似的场面和情节,说明在行吟诗人的口头流传中,东西方史诗是相互交融、影响的。

然而,东西方的社会结构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古印度的社会关系由四种姓组成复杂的宗教政治关系结构。《梨俱吠陀》中有一则神话,说诸神以普鲁沙为牺牲化生了四种姓,表明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古印

度就出现了四种姓等级关系的萌芽。后来婆罗门教将四种姓的宗教关系、政治关系及婚姻关系等加以宗教化,制度化、神圣化,由此形成基本格局,直到公元 7 世纪印度进入封建制时期仍无多大改变。印度半岛辽阔的土地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关联的重内政、少外交的历史条件,对种姓制的长期保存起了重要作用。四种姓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都有长期而激烈的冲突,在意识形态上则主要表现为宗教派别或宗教哲学思潮之间的斗争,如佛教、耆那教等与婆罗门教的抗衡。这些冲突和斗争也反映到古印度的文学创作中来,甚至两大史诗的巨大膨胀动力也正源于这种冲突和斗争。

东方史诗以“法”为纲,处处说“法”或显“法”,就是由于婆罗门——史诗的部分作者和最后编订者——利用手中的文化特权来宣扬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结果。在宗教制约一切的古印度社会中,利用全社会成员广为传诵的史诗题材来构建宗教思想体系,灌输至高无上、天经地义的“法”,无疑是婆罗门种姓最巧妙也最有力的文化措施。

然而,婆罗门种姓绝非两大史诗的唯一原始创作者,其他种姓都参与了创作,传唱和加工。相同的题材在不同阶层的口里,会唱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愿望。口头创作的一个特点是在不影响故事基本结构的原则下,还存在较多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而一定的“说法”一旦被成群的人,某个或几个阶层所接受,就不会由个人或单独阶层所能轻易窜改。因此,在两大史诗中除了一统天下的“法”外,还包容了其它“非法”甚至“反法”的思想内容。不过“非法”与“反法”依然在“法”的话题之内,只是倾向不同。《摩诃婆罗多》史诗记叙了王族氏系的起源是来自于神,显然是刹帝利对自己的美化。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婆罗门,持斧罗摩,在《摩诃婆罗多》中消灭刹帝利 21 次,但他在《罗摩衍那》中却被王族的罗摩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说法”显示了日渐强大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挑战和蔑视,或者也体现了另两个低等种姓“借刀杀人”的愿望。《罗摩衍那》则有一个

名叫阇波厘的婆罗门对祭祀的看法很不合“法”。他说“人们常举行阿湿吒迦祭,来祭祀自己那些祖先,请看这粮食真倒了霉,死人哪能吃什么供物?”这与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之一的“祭祀万能”法大相径庭。或许是婆罗门中真有如此开明、如此叛逆的人,但更大的可能是民间思想的精华在他身上作了移花接木的“手术”。

荷马史诗的思想结构没有复杂的冲突,这决定于古希腊的社会构成和民族心向的相对单一。古希腊也有社会等级,甚至实行严酷的奴隶统治,但荷马时代最主要的是实行军事民主制,荷马时代之后的斯巴达城邦也实行过“平等人公社”等社会制度,公民内部的关系较为平等,即使贵族也没有太多的特权。古希腊民族也信奉宗教,但没有享受特权的祭司阶层,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与一般公民等同,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均不起权威主宰作用。处于航海便利、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心胸开阔的古希腊人无暇构建只有在封闭环境才可能维持的神圣、永恒的宗教政治等级关系,而必须在频繁的征战和海外贸易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不懈的奋斗挣扎中,他们对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人”的素质,才能高度重视,同时也对人的“命运”的变化多端有深刻体验。荷马史诗就是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颂歌,也包括了他们对“人”的局限性的承认和对宇宙本源的反思。

一定的思想内容决定一定的表达形式。大家都是“诗以传法”,就会赋予史诗的演唱一个约定俗成的方式。譬如《摩诃婆罗多》用故事套故事来说“法”,故事不足以明朗达

意就中断,然后“现身说法”,也就是非故事的诗体论述。这样的演唱方式就提供给人们不断创造、加工、增删的机制。歌唱者越多,彼此的思想、感情等倾向斗争就越激烈,创造、加工、增删的动力就越大;传承时间越久,史诗的容量越大,体积越膨胀,内涵也就越错杂。印度两大史诗就是四种姓的思想,感情、智慧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多元混融、杂多而又统一的结晶。它们相当于荷马史诗的8倍,原因就在于此。荷马史诗的传承者——那些平等关系的行吟诗人及其听众们,则重在磨炼和显示自己的铺陈叙事才华。通过曲折有致的情节编排和有声有色的描绘来展示人性的光辉。因而其膨胀的方向在于精而不在杂,膨胀的结果在于线性的有限度的拉长,而不在多维的无限度的扩展。

①恩斯特·卡西尔著《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②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3页。

③傅东华译《奥德赛》第8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73页。

④金克木《〈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

⑤金克木译《莎维德丽》载《译文》1954年10月号。

作者刘劲予,广东教育学院副教授(510303)

责任编辑:陶原珂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反封建内容与反帝抗日斗争

□徐文泽

有人认为,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即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与反帝抗日的时代中心任务关系不大;也有些人片面强调赵树理小说的反封建意义,而对其作品反帝抗日的社会功能一字不提。其实,赵树理在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且也具有反帝抗日的功能,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赵树理的创作活动与他参加反帝抗日、反封建的工作,都是他抗日工作实践的重要部分。

一、赵树理参加反帝抗日斗争

作家要深刻地反映生活,写出优秀的作品,必须深切、动情地关注生活,甚至直接参加生活实践。赵树理同志的特点,表现在他“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①,又是具有坚强党性原则的共产党员干部。在旧中国他像千千万万普通农民一样,受过反动军阀及地主的压迫,对农民的痛苦有深切的体会。然而,赵树理毕竟不是一般农民,他上过学,读过书,具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知识,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实践过程中,他又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较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克服了普通农民身上小生产者的弱点,从而成为一位党性原则很强的干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是一名教师,那时,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怀着火热的激情,投身于宣传反帝抗日的行列中。他同友人曾多次公演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1937年2月,赵树理带长子太湖到学校,做抗日宣传工作,2月25日在长治县火神庙公演戏剧《打灶王爷》,“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②上党乡师学生冯英杰记述了一次在长治街头演出的实况:“一

次赵树理、王中青老师,亲自到潞安城卫上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赵树理老师手拉胡琴,脚蹬鼓板,手舞足蹈,浑身是劲,连点头弯腰都为节拍制约。”^③全面抗战爆发后,赵树理离开教师岗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此后,作为党的干部,他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坚持战斗在山西省东南部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在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上,用在宣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方针政策上。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同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同山西军阀阎锡山及其走卒斗智斗勇。他作为中共方面的干部,先后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区长、公道团团长,想方设法阻止军阀反动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共活动,揭穿企图瓦解党对抗日民众领导的阴谋。他还长期担任太行山根据地许多报刊的编辑等工作,创作了宣传反奸抗日、除霸反封建的系列通俗文章小说、戏剧作品,写了大量的宣传抗日的通俗文章。当时有人看不到赵树理工作的意义,认为他的作品通俗,算不上伟大作品。赵树理却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离开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就没有伟大的文艺!”^④他和王春同志还巧妙地将毛泽东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新阶段》加以伪装,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送到敌占区,为敌占区人民提供抗日战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他是抗战时期山西省特殊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最忠诚最能干的战斗员之一。

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赵树理

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于站在党性原则立场上,从生活出发,从反帝抗日工作实际出发,提炼主题,塑造人物形象,达到政治性与艺术性、艺术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他的小说题材和主题来自生活,是他在亲身参加抗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渐积累和提炼出来的,是对群众斗争生活进行认真的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的结晶。另一方面,他又是站在劳动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以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理解生活,认识生活,积极发现群众在抗日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提炼主题,选择题材,进行艺术构思。可见,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它们既是真正的艺术品,又是及时配合工农群众进行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起到了特殊的社会作用。

二、反映根据地农民反封建与反帝抗日

赵树理是个文化干部,长期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他最熟悉的工作对象是山西农村的农民及农村社会的各色人等。因此,抗战时期,他最重要的四篇小说,都是正面反映根据地农民在反封建过程中政治地位和精神面貌变化的,几乎很少正面描写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李家庄的变迁》中有一段描写)。但是,不能据此否认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反帝抗日之间的联系。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⑤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民的作用有不同于其他革命阶段的特点。中华民族的抗战,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既要面对骄横的日寇,又要对付汉奸,还要时时提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而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抗战不可能是“速决战”,只能是“持久战”。因此,妥善地处理阶级斗争和抗日战争的关系,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农民参战,实行游击战和运动战,是我党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战术。赵树理的小说

创作对抗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描写在抗战民主政府支持下,农民与各种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宣传党的抗日民主政策,扩大全民族的正确抗战路线的影响;其二,通过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现实斗争典型化,在审美愉悦中为广大人民提供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

《小二黑结婚》(1943年5月)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的题材直接反映根据地农民反恶霸反封建的斗争,同时宣传了党的民主政策和婚姻制度。主人公小二黑与小芹是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新世界的青年农民,在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支持下,他们敢于反对落后家长的阻挠,自由恋爱,可是,却遭到恶霸流氓的压制,面对社会邪恶势力,他们不屈不挠,据理力争,最终喜结良缘,美梦成真。围绕农村青年恋爱婚姻问题,作品典型地展示了各种各样封建思想,暴露了混入抗日基层组织内部的流氓势力,向人民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歌颂了共产党新政权。作品的特点在于,正确地表现了反对封建思想,消除反动势力,充分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与抗日的关系。小二黑,不仅是敢于反抗的农民,也是打鬼子打得“顶呱呱”的积极分子。就是这样的青年,却忍受着封建邪恶势力的欺压,试想,如果不发动群众清除混入基层组织中的恶势力,农民积极性如果不被充分调动起来,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能巩固吗?抗战能持久吗?自然是不能的。《小二黑结婚》正确反映了农民反封建斗争与抗战工作的内在关系。

如果说,《小二黑结婚》只是初步反映了反封建与抗日的关系,那么,《李有才板话》(1943年10月)就在正面展开农民与地主之间激烈搏斗的描写中,通过反映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提供了阶级斗争知识和丰富的巩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作品围绕改选村政权和丈量地减租,直接描写了“老槐树底派”的赤贫农民和地主阎恒元派的斗争。抗战之前,阎恒元靠反动政权撑腰,在村上一手遮天。抗战开始后,在抗日县政府支持下,农救会主席老杨同志,组织

农民,同地主展开斗争,教育了农民,斗倒了恶霸地主,建设了抗日根据地,使根据地得到巩固。《李有才板话》直接描写了反封建与抗日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家对题材的这一处理是十分正确的。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⑥如果说,毛泽东从哲学和政治高度,阐明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那么,赵树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验证了毛泽东所指明的真理,并运用完美的艺术形象体系,显现了这一真理。

为澄清人们在地租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向农民提供说理斗争的依据,配合减租减息工作,赵树理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地板》(1945年2月)。作家的卓越之外,表现在把抽象的经济学问题加以形象化处理的艺术能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地租来自劳动这一真理,宣传了减租和互助合作的合理性、优越性,宣传了党的民主抗日政策。

《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2月)是作者为配合上党战役而创作的,后来由于战事突发,没有赶得上。从作品的题材来源看,它几乎调动了作家在抗战期间的大部分生活素材积累,是赵树理在这一阶段带有总结性质的一部长篇。在作品里,作家把农民与地主、汉奸和土匪的斗争,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农民觉醒的过程和觉悟后所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完整地描写了共产党八路军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所进行的反反复复的斗争。李家庄,是抗战前后山西省东南部农村的缩影,民国十九年到抗战胜利的变迁,典型地反映了在共产党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根据地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作家仍然紧紧地扣住阶级斗争这根弦,反映了阎锡山反动派同国民党中央军及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真正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反映了抗战前后山西省重大的社会历史事变。抗战前山西省是军阀阎锡山的天下,恶霸地主李如珍纠合亲信春喜、小喜、小毛等流氓恶棍,在李家庄仗势欺人,农民过着奴隶式的生活。抗战开始后,阎锡山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号,企图利

用共产党八路军为他赶走日本人。李如珍,春喜,小喜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阎锡山的“孝子”,他们在李家庄一带把持抗日组织,监视共产党人,破坏人民群众抗日工作。共产党员小常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在李家庄发展农民抗日组织,与地主进行巧妙的斗争,成立了牺盟会。在小常同志的教育下,一部分农民初步觉醒。阎锡山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十二月政变”,小常同志被活埋,大批贫苦农民惨遭杀害,一部分积极分子和民兵撤离村庄。李如珍、春喜、小喜成为残杀人民的刽子手,李家庄成了血腥风雨的世界。日寇占据李家庄,阎锡山的“孝子”们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组织维持会,为帝国主义者效劳。八路军打跨日寇,收复失地,放手发动群众,与汉奸、土匪进行斗争,大批农民在斗争中成熟起来,李家庄成了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作品这样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无比力量:“李家庄自从这次成了根据地,再没有垮了,敌人‘扫荡’了几次,李家庄有了民兵,空室清野也做得好,没有垮了。三年大旱,李家庄互助大队开渠浇地,没有垮了,蝗虫来了,李家庄组织起来剿灭了蝗虫,又没有垮了。不只没有垮,家家产粮都超过原来计划,出了许多劳动模范,合作社发展得京广杂货俱全,日用东西不用出村买;又成立了小学,成立了民众夜校,成立了剧团,龙王庙和更坊门口,每天晚上都很热闹。”李家庄的变迁,反映了一个时代农村的巨变,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和发展。

三、刻划敢于反抗的农民典型与反帝抗日

赵树理是农民子弟,对农民具有深厚的感情,特别在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后,他认识到了中国农民在革命过程中,从而也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重大的历史作用。因此,他不仅独创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化风格,为中国人民,尤其为广大农民所喜爱。而且,根据反映生活和表现主题的

需要,他还塑造了抗战时期农村社会各色人等的形象,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敢于反抗压迫的农民典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张铁锁,等等。通过这些农民典型的塑造,教育广大农民起来斗争,把反封建和反帝抗日斗争进行到底。

小二黑、小芹是抗战时期茁壮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们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敢于同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势力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农民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积极分子。小二黑既是抗日勇士,也是反封建的健将。作家抓住小二黑敢于斗争的性格特点,并把他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加以刻划,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他与小芹自由恋爱,他的父亲“二诸葛”却干涉,小二黑对他的封建迷信思想,起而反对,毫不退让。二诸葛给二黑收养了童养媳,认为她跟二黑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小二黑却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回答得多么干脆利落。恶霸金旺企图霸占小芹不成,恼羞成怒,借权势阻止他们的婚姻。面对邪恶的封建势力,小二黑一点也不胆怯,他坚决反抗到底。小二黑与小芹在大窑里商量婚事,恶霸捉拿小二黑与小芹的那一段描写,充分表现了小二黑勇敢的斗争精神。那么,小二黑的斗志为什么这样坚强呢?这除了个性特点外,这主要与根据地政府支持农民的民主政策有关。小二黑不怕金旺,是因为他了解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婚姻制度,是因为他有共产党政权撑腰。这一农村新人,典型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小芹作为农村新型女青年,也有鲜明的特点,她不仅长得漂亮,具有外在美,而且有内在美。她自尊自爱,勇敢大胆,对爱情有执著的追求。她的母亲“三仙姑”是村上有名的风流妇女,小芹却“出污泥而不染”,十分贞洁,她只对小二黑一个人好。面对流氓恶霸金旺、兴旺的威胁、调戏,她态度严峻,敢于同他们斗争,一点儿也不胆怯,不退缩。金旺乘无人之机调戏小芹,小芹板起脸说:

“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要娶媳妇大汉了!”⑦一句话,就把流氓拒于千里之外。在同邪恶的斗争中,小芹敢于据理力争,她不怕恶霸打击报复,敢找村长同金旺老婆论理。作家抓着小芹这一女性的外在美与内在美进行刻划,虽着墨不多,但笔笔传神,笔笔生动,人物个性十分突出,跃然纸上。

《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是阎家山阶级斗争的中坚人物,也是成熟的农民典型。他是雇农,原来还有三亩地,后来押给阎恒元了。地一押,李有才除了一孔土窑洞之外,一无所有。他靠给村上人放牛,捎带看庄稼糊口,五十多岁了,穷得连老婆也娶不起。可是,李有才人穷志不短,阎家山贫富悬殊的现实,培养了他敏锐地洞察生活的眼光。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具有一种朴素的自发的阶级观点,看人看事,无不带有阶级意识、阶级眼光、阶级感情。他是个天才的农民“艺术家”,“会说开心话”,会“编歌子”,他给阎恒元、阎家祥、阎喜富、张德贵等人编的几段快板,揭露得多么深刻,憎恶之情多么强烈!他是大家欢迎的人物,固然在于他有幽默乐观的性格,根本原因还是他跟大伙思想感情一致。正是他对人对物的分析,无意中启发着人们的阶级觉悟。李有才“窑里的晚会”,无形中起着联络感情,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作用。李有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他与“小”字辈人物相比,又显得更老成,也更深沉。在选村长和丈地减租两件村政大事上,他都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赵树理既描写了李有才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斗争性,也写出了他的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他贫穷,但乐观幽默,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成熟农民的斗争智慧。

张铁锁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他是李家庄的外来户,阶级压迫外加土、客矛盾,他所受地主的欺压,比一般本地农民更深一层。抗战之前,李家庄是地主李如珍及其亲信春喜、小喜等人的天下,他们把持村政、私设公堂,欺压无辜农民,为所欲为。张铁锁虽有一定的反抗性,却是盲目的,得不

从词语的文化内涵 看汉英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体现文化的一种主要途径,而语言所包含的意义主要通过语言中的词语来传递,因此,从汉英词语的文化内涵差别可以看出汉英两种文化所存在的差异。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language)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内有大大小小的单位,如词素、词、句子等;其二是某一民族或部族所使用的语言。前者是一般性的,指人类借助于有组织的语音序列以及(或者)文字序列来进行交际的系统。后者是个别性的,指某个民族或部落的交际系统,例如法语、印地语等等具体的语言(王宗炎,1988年:201)。

而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理解的“文化”这一词的意义,是泰勒(Tylor)在他的

《原始文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万明钢等,1988年)。他把文化定义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它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文化的定义很多,起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桂诗春,1988年:155;胡文仲,1989年:136)。广义的文化(culture)指的是一个民族及其伟大人物所做出的种种重大的成就与贡献,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科技、历史、地理等等。狭义的文化(culture)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包括如何生活,如何组织社会、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们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风俗习惯,以至吃什么,如何吃法,各种禁忌等等。

当我们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语言

到任何支持。在太原遇到共产党员小常,是他命运的一大转折。在小常的领导下,李家庄成立了真正的抗日组织,在革命实践中,张铁锁的思想才逐步走向觉醒。

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十分正确地将农民的觉醒过程,放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典型环境中加以表现,不仅写出了农民觉醒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也写出了农民觉醒与抗日斗争的关系。正是因为党的支持教育下,农民经过斗争翻身解放,真正掌了权,共产党八路军才有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才有基础。赵树理在抗战时期的创作,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反映生活,正确地反映了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反封建与反帝抗日斗争的内在关系,从而提供了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可见,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反帝抗日中心任务关系不大,这种观点是不

正确的。

①赵树理《也算经验》,引自董大中编《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2页。

②③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129页。

④同②第204—20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77—1078页。

⑦《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作者徐文泽,广东省中山学院中文系讲师(5284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般指它的第二个含义,即某一民族或部族所使用的语言,而文化则包括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对语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语言看作是语音、语法、词汇的总和,或者仅仅看作是一种符号系统。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脱离不开社会环境。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如桂诗春,1988年:218;胡文仲,1989年:124;邓炎昌等,1989年:159)都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文化,反映社会现实,是某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变化通常导致语言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促进语言更加丰富和精细。可见,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二、汉英词语具有文化内涵的意义差异

1、词义的种类

语言反映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如此复杂,语言中的意义也就十分复杂。意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意义可以是概念结构,意义可以是语言所传递的一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表达的思想、信息、感情、心绪、意图等等均可概括为意义(桂诗春,1988年:184)。意义有不同的分类。奥克登(C. Ogden)和理查斯(I. Richards)在其经典著作《“意义”的意义》中,列举了16个关于意义的定义。利奇(G. Leech)把意义分为七种类型(参见桂诗春,1988年:184-91;伍谦光,1988年:133-46),它们分别是: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感情意义(affective meaning)、联想意义(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和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上述的七种意义中,第七种意义指的是句子的意义;第一至六种意义是有关词的意义。

2、汉英词语义文化内涵的关系模式

以上六种词的意义中概念意义就是词汇的所指意义(即单词所指为何物),而词汇的内涵意义、感情意义和联想意义等其他意

义则属于文化意义(即社会中某些与该单词相联系的观念)。有人认为,不同语种间词语的意义差异主要在于词语的文化意义(毛忠明,1989年),这是因为“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所不同”(许国璋,1980年)。另外,文化意义是某一文化群体对一客体本身做的主观评价,如果两个文化群体的评价不同,就会引起干扰,影响正常交际(曹春春,1993年:21)。

邓炎昌先生和刘润清教授(1989年,162-80)经过归纳总结,提出了以下汉英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意义关系的模式。

1)在一种语言里有些词在另一语言里没有对应词。例如,汉语的“炕”、“气功”等词语在英语中是没有相对应的词语的。又如,汉语中的“干部”常译成英语的cadre,但是,英语的cadre与汉语的“干部”不同。而且cadre不是常用词,许多讲英语的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英语中没有“干部”的对应词。

2)在两种语言里,某些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实指的是两回事。如“propaganda”与“宣传”表面是意义等值,但事实并非如此(陈建平,1994年:273;胡文仲,1995年:195)。英语的“propaganda”指政治团体为了影响公众所散布的信息,通常是夸大的或者虚假的信息,使用时常有贬义。而汉语的“宣传”则表示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又如,英语的busybody并不相当于汉语的“大忙人”,而是“爱管闲事的人”。

3)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里只有一两种表达方式,而在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层面里,这种事物或概念有更细微的区别。如汉语中只有“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的camel;但是,英语中又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camel(双峰骆驼)。

4)某些词的基本意义大致相同,但派生意义可能区别很大。例如,英语词intellectual同汉语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意义相近,但是,它们的含义有所不同。intellectual只指大学教授等和在学术上与大学教授具有同等地位或取得相当学术成就的人。而“知

识分子”一般包括教师、医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有的农村,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

以上汉英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体现了汉英文化的各种差异。

3、造成汉英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意义差异的原因

(1)客观现实不同

造成英汉具有文化内涵词语的意义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客观物质世界中的差异,即语言的所指客观对象不同。然而,语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说汉语和英语的人们所处的客观世界不完全一样,某种社会文化的那些特有的客观环境就难于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示。汉语特有的许多中医术语,英语就没有对等词,难于用英语词来表达。对此,往往只能求助于汉语拼音了。相反,英语国家中所特有的事物也找不到汉语对应词。如,bingo 一词只好音译加注释“宾戈(一种赌博游戏)”(陆谷孙,《英汉大词典》)。

(2)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造成词语具有文化内涵意义不同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有所不同,具有不同的联想。比如,孔雀在我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人们认为孔雀开屏是大吉大利的事。然而,英语中的 peacock(孔雀)的意义基本上是否定的,它不强调孔雀美丽的一面,而强调它骄傲的一面,正所谓 as proud as a peacock(孔雀般高傲)(请参见胡文仲,1995年:209)。

可见,客观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汉英两种语言词汇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完全对应的情况不多。正如林汝昌教授(1996年)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词汇是一种文化符号,由于人类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经历和爱好有

其相似性,所以,英语和汉语中部分词汇的文化内涵极其接近;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不同宗教、环境、风俗以及价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两种语言文化内涵又不可能完全对等”。

参考文献

曹春春《交际文化与基础英语教学》广州《现代外语》,1993年第4期。

陈建平,“Cross - cultural Aspects of English - Chinese and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ies”in Flowerdew, F. & Tong, A. K. K (eds), *Entering Texts*, 香港科技大学语言中心 1994 年。

邓昌炎、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年版。

桂诗春《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胡文仲《英语的教与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年版。

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年版。

林汝昌《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人的三个层次》,上海《外国语》1996 年第 4 期。

毛忠明《词汇教学》,上海《国外外语教学》1989 年第 1 期。

万明钢、童长江《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与民族教育理论》,北京《教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王宗炎《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许国璋“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广州《现代外语》1980 年第 4 期。

作者何家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教(510421)

责任编辑:陶原珂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再研究

□赵立人

第一位葡萄牙来华使节皮莱资(Tomé Pires)在正德七年至十年(1512—1515年)间,即他本人来华前几年,就在《东方概览》一书中写道:“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镜(Oquem);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①最早来华之葡人,为欧华利斯(Jorge Alvares),时在正德八年(1513年),可见在葡人始来华之际,澳门就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外贸港口。不过,早期外商只能在此泊舟,就船贸易,而不能登岸居留。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说:“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广东办理司法案件的王临亨在其《粤剑篇》卷三中也说:“西洋之人往来于中国者,向以香山澳为舫舟之所,入市毕则驱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渐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②可证。

正德十六年(1521年)海道副使汪鋐击败葡萄牙海盗商人于屯门澳后,为防范葡人的继续侵扰,在广东禁止了“佛郎机”(葡萄牙)的贸易,并禁止了其他各国的市舶。这一措施的实行,严重损害了广东的经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说:“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应入贡诸番,亦鲜有至者。贡舶乃往漳、泉,广城市贸萧然,非旧制矣。”^③这种情况引起了广东官绅的忧虑。霍韬说:“东南夷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自困。惟佛郎机则贼虏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而并拒诸番,非策也。为今之策,在诸夷之来则受之,在佛郎机则斥之,否则厉兵以防之,示之必诛。”^④嘉靖八年(1529年),提督两广侍郎林富上疏,指出:“今以除害为民(名),并一切之利禁绝之,使军国无所资,忘祖宗成宪,且失远人之心,则广之〈废〉市舶是也。”“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成宪安在哉?”从有利于国计民生考虑,应恢复广东的对外贸易,但“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逐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兵擒捕。”“乞行福建广东,将今番舶之私商驻扎者,概行逐去,具有朝贡表文者,许往广州洋澳去处,俟官司处置。”^⑤这一建议得到朝廷的通过。

然而,这时以葡人为主的外商已在宁波双屿、泉州浯屿(今金门岛)建立了居留地,仍循“就船贸易”旧例的广东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不考虑变通。“先是,暹罗、东西洋、佛郎机诸国入贡者,附省会而进,与土著贸迁,设市舶提举司税其货。正德间,移泊高州电白县。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琼纳贿,请于上官,许夷侨寓濠镜澳,岁输二万金。从此雕楹飞甍,栉比相望。”^⑥不过,当时对佛郎机仍未解除禁令,依然是来即驱逐,至少在理论上,葡人仍未被允许进入澳门。

前人多以“正德间,移泊高州电白县”一语为不可信,近时汤开建先生详加论证,指出这一记载不容轻易否定。^⑦笔者赞同汤先生之说,并且认为,这一“移泊”当在正德末年屯门澳一战之后,是时广东的合法市舶贸易完全中止,来粤的外国商船不得不另寻偏远之地,以避过官方的禁阻。文献所载,东则有南澳,^⑧西则有电白,因此不能因其交通不便即臆断其非互市之地,实际上,交通不便正是其移泊于此的原因之一。

前人认为,上引《明熹宗实录》中的记载,“实属无稽之谈。濠镜澳如果作为泊舶的海澳,不始于嘉靖十四年,如果作为地方官受了贿,允许葡萄牙殖民者侨居的地点,则又没有这样早。”^⑨似是未充分了解原文之意。原文所说的嘉靖十四年,只是“许夷侨寓濠镜澳”,与此前濠镜澳已泊舶,及此后之允许葡人侨居均无矛盾,而且恰恰表明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顺理成章,似不宜视为无稽之谈。

前人还认为,“不论‘黄琼’、‘黄庆’(按:见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佛郎机传》)、“王度”(按:见道光《电白县志》引《明史稿》),在明嘉靖间澳门历史上从未发现有这样一个人。有之,只有一个王绰。乾隆《香山县志》卷六《王绰传》说:“王绰字梅吾,千户所智裔孙也。以诸生中嘉靖乙卯(按: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戊午(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两科武举,袭祖职为宣武将军。征讨岭西罗旁贼平,升昭武将军,移镇澳门。初,番人之市中国也,愿输岁饷,求于近处泊船,绰乃代为申请。其后番以贮货为名,渐结为舍宇,久之成聚落。绰以番俗骄悍,乃就其所居地中设军营一所,朝夕讲武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约束。绰卒,设位议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把这段文字记载和《天启实录》按语以及《明史稿》、《明史·佛郎机传》所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黄琼’、‘黄庆’、‘王度’等等,不

过是王绰之讹。”^⑩似亦颇可商榷。

首先,“指挥”不是一个品位很高的武官,不一定都见于现存文献记载。现存史料除《明熹宗实录》外,虽未再见有“指挥黄琼”之名,但不能以此断定“在明嘉靖间澳门历史上从未发现有这样一个人”。其次,《王绰传》不仅晚出,内容亦多悖于情理:

一、明军之平定罗旁,“规划进兵于丙子(万历四年,1576年)仲冬,班师于次岁春三月。”^⑪故王绰之移镇澳门,最早也要在万历五年(1577年)。而葡人之入居澳门,中方文献谓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方文献谓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较王绰之移镇澳门至少早了20年。因此,说番人之泊船澳门,是始于王绰之代为申请,乃是地道的无稽之谈。

二、葡人信奉天主教,严禁拜祀他物。而此传竟谓“绰卒,设位议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显属妄说。

《明熹宗实录》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年),而乾隆《香山县志》则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者既晚出百余年而又错误明显,倘以其“纠正”前者,则似不合治史之原则,殊不足采信。

如上文所述,嘉靖十四年(1535年)虽“许夷侨寓濠镜澳”,但葡人却被排除在外。葡萄牙中日贸易船队队长索萨(Leonel de Sousa)说:“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挤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⑫他感到“中国人对葡萄牙人怀有恶感。中国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腰上挎着武器的商人,显然不信任他们。”^⑬而当时也确有不少葡人与中国海盗纠合在一起,与明政府对抗。东莞人何亚八与郑宗兴等人潜入大泥国等地经商,嘉靖时“纠合番船前来广东外洋及沿海乡村”,从事走私贸易。^⑭因受到官兵追捕,北窜福建、浙江海面,聚众数千人,联合陈老、沈老、王明、王直、徐铨、方武等海盗团伙,分道劫掠浙江的嘉、杭、宁、绍、台、温一带。^⑮不久,何亚八、郑宗兴一伙复回广东,大肆杀掠,“柘林指挥马骧、东路指挥张夫杰畏葸不前,贼发大炮击破乌艚船,官兵悉溃。自是焚柘林,劫大港,攻下湾、下岱,又攻大埕。”^⑯“辛亥(嘉靖三十年,1551年)六月,海盗何亚八同番贼由(海南岛)石硯抵白沙东瀛,纵火劫村,虏男妇,每倾产以赎,无赎,多鬻之番。”^⑰这些记载所提到的“番”,虽无具体国名,但前引林富奏

疏有云：“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寇盗者。近时佛郎机国来自西海，其小为肆侮，夫有所召之也。”^⑮可见正德、嘉靖年间南海诸国从无在中国沿海为寇盗者，而当时除葡人外，其他欧洲国家如西、荷、英等国的海盗商人均未东来，日本浪人虽亦有侵犯中国沿海，而中国史籍均称为“倭”而不称“番”。由此可肯定，以上文献所说的“番贼”，实即葡萄牙海盗商人。此前葡人在粤、闽、浙三省沿海的走私劫掠活动，不绝于中葡文献记载，可为佐证。

依靠葡人的坚船利炮，何亚八、郑宗兴一伙得以横行粤、闽、浙沿海，屡败明军。广东当局遂取分化策略，抚番徒而剿何、郑。“东莞剧贼何亚八等纠聚番徒，沿海劫掠。祯（都指挥蔡祯）及知县何炯等以计抚其党，伺贼众少懈，遣沛（指挥王沛）督兵捕之。”^⑯此后，明军即转败为胜。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提督两广兵部侍郎鲍象贤派遣海道副使汪柏、指挥王沛、黑孟阳等统兵剿捕，“及于广海三洲环，生擒亚八等贼一百一十九名，斩首二十六级，余党脱逃。”^⑰同年，“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略海上，官军击败之，擒贼首四方溪（按：当作方四溪，即方武）等，余党遁去。”^⑱“海贼犯广东之柘林，指挥黑孟阳引舟师歼之，生擒贼首方四溪、夷目吒过口罗一百三十五名，斩首三十九级，其贼首徐碧溪（徐铨）等悉沉海死。”^⑲

上述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何亚八等就擒的地点“广海三洲环”，亦即与新宁（台山）广海卫隔海相望的上川岛三洲港，当时是来华葡人最重要的贸易据点，^⑳当然也就是中葡海盗联盟的巢穴（此前之浙江双屿即为先例）。㉑索萨在这里“指挥上川岛附近的十七艘船只”，^㉒兵力相当强大。而明军在屡败之余，竟能深入虎穴，擒贼首如探囊取物，而未与索萨交战，显然是葡人受“抚”后出卖中国同党所致。当然，也有少数葡人如“夷目吒过口罗”不愿受“抚”，坚持敌对行动，但势孤力弱，不久即成擒。

葡人就“抚”的时间、条件和有关人物，中方资料语焉不详，且将关键情节隐去，除上引《明熹宗实录》外，就只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藪矣。”^㉓而索萨之自述则颇为详尽：“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

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我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由于最初葡人不准居留在中国，早时达成这种协定是不可能的。”^㉔和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税是由广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决定的。他是国家的高级官吏和海军长官，负责海防并兼理市舶一切事宜。……因为我过去没有特许状，所以和他们订立这种协定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写成公文，但要依照向例，承担百分之二十的关税，像从暹罗国来的，得到中国皇帝特许，经常在海上往来的暹罗人一样。”据说，海道还通知索萨，这件事要呈请皇帝核准，并且要到第二年才得到批覆，因为往京都的旅程需要三、四个月。索萨还劝告葡人要尊敬中国官吏，以避免像葡人最初来到中国时那种被控诉的事重演。“就是这个样子，我订立了和平协定，并决定了在中国贸易的各种事情。因此，许多人做了买卖，并且有若干人利用这个机会安全地到广州城和别的地方去自由做买卖，通行无阻。”为订立这个协定，索萨还向中国官员送了礼。^㉕据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说，“从1553年底开始，他（索萨）呈文给唐·若奥三世的兄弟唐·路易斯王子，禀报他已和海道副使汪柏达成协议。”^㉖则达成“和平协定”的时间，亦当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与前引郭棐《广东通志》吻合。

协议达成后，葡人随即撤出上川岛，迁往浪白澳。萨拉依瓦（Saraiva）主教在18世纪写道：“在该年（1554年）年初，由于中国人的不信任，让我人移至上川岛以北约三十莱夸（Légua，一般译作里格，每里格约5公里）处的浪白澳贸易。”^㉗葡人撤出后，汪柏随即进军上川岛三洲港，擒获何亚八，具见上文。可见，葡人撤出上川，与何亚八等拆伙，乃是受“抚”的具体表现。

何、郑海盗团伙覆灭之后，就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莱奥内尔·索萨终于得到了广州的中国官员的信任。根据口头协议及缴纳合法贸易的税款（抽盘），葡萄牙人被准许在后来被称为澳门的地区自由贸易。”^㉘中方文献也说：“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佛郎机国夷船来泊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称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诬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周鸾等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佛郎机国夷人诱引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

夷,同市广东卖麻街,迟久乃去。自是佛郎机夷频年诱倭来市广东矣。”^{③⑩}葡人虽已可自由贸易,但却要“冒他国名”,说明中央政府禁止葡人来华互市的规定,仍然有效。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有夷目哑喏口利归氏(按:葡文当作 Anriques)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Portugal,即葡萄牙),两广镇巡官以闻。下礼部议: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或即佛郎机诡托也,请下镇巡官详审,若或诡托,即为谢绝,或有汉人通诱者,以法治之。奏可。”^{③⑪}当时提督两广吴桂芳的《议阻澳夷进贡疏》还说:“海外诸国,出于《祖训》、《会典》所载,旧奉臣贡者,固已市舶阜通,舳舻相望。内如佛郎机诸国,节奉明旨拒绝,不许通贡者,亦颇潜藏混迹,射利于其间。”^{③⑫}可见葡人一直被明朝中央拒诸门外,汪柏与索萨达成的协议乃是:只要葡人冒充其他国家的商人,海道就佯作不知,准其自由贸易。至于索萨所谓“这件事要呈请皇帝核准”可肯定必无其事,编造而已。

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1555年11月20日致信果阿耶稣会长说:“今天我自浪白滘往前6里格抵达我们所在的澳门港,碰见自广州来到的巴莱多(B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在《远游记》第221章中,平托又说:“第二天早上,我们自上川岛出发,太阳落山时抵达往北6里格的另一个岛,该岛名为浪白滘,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做生意,直至1557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的要求下将澳门港给了我们进行贸易。澳门从前是个荒岛,我们的商人兴建价值三四千克鲁扎多(Cruzado,古时候葡萄牙金币)的房屋把她变成一个高贵的居民点,且已有一间主教堂,教堂不仅有神父,还有来祈祷的人。此外,居民点尚有兵头、王室法官和司法官员。大家是如此的自信和安定,犹如自己的城镇那般爱护她,好似她就座落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个地方。”^{③⑬}可见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之后葡人已可入澳门贸易,而建屋定居,则迟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①②⑨⑩⑪⑫⑬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68、61、62—63、63、70、70—73页。

③黄文宽:《关于澳门史的考订》(上),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④霍韬:《霍文敏公全集》,同治元年石头书院刊本,卷十下,《两广事宜》。

⑤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嘉庆十六年敷文阁聚珍版本,卷一二〇,第一三至一六页。

⑥《明熹宗实录》,卷六,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条。

⑦汤开建:《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载《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

⑧乾隆《南澳志》,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卷三,页二,及卷一一,页三。

⑬⑭⑰⑱⑲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13、13、11、12页。

⑭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一五,《广东防海略》。

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倭变记》。

⑯乾隆《潮州府志》,光绪十九年保安总局重刊本,卷三八,《征抚》。

⑰嘉靖黄佐《广东通志》,卷七〇,《外志·杂事》下,《琼州府》条。

⑱《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三,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乙未条。

⑲谢杰:《虔台倭纂》,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⑲《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二,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己亥条;卷四一三,嘉靖三十三年十月条。

⑲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28—137页。

⑲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⑲万历郭棐《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刻本,卷六九,《澳门》条。

⑲郑舜功:《日本一鉴》,《海市》条。

⑲《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四月癸未条。

⑲《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吴司马奏议》。

⑲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第46页。

作者赵立人,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郭秀文

澳门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 李 郁

虽然许多人都预料到澳门经济发展速度将放缓,但 1996 年澳门 GDP 的增长速度只有 -0.3%,确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近二年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澳门经济存在着许多问题,并提出许多解决方法,但似乎收效不大。在澳门经济出现负增长的今天,我们回头看一看澳门四百年的历史,可能会为澳门经济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澳门四百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过程:16 世纪澳门早期贸易高峰时期,18 世纪澳门贸易衰退时期,19 世纪澳门经济的异化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后现代工业发展时期。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澳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1. 对外部条件的依赖

从澳门经济几起几落的发展可以看出澳门经济对外部条件的绝对依赖。如 16 世纪早期贸易的兴起依赖的是世界地理大发现、季风、帆船、西江流域和漂洋过海的葡萄牙人。澳门较浅和平静的港口成为靠季风航行的船队的停泊处,澳门的地理位置、地理条件,使澳门成为中西贸易的节点。但正如历史上许多靠交通条件发展起来的城镇,到今日大都因交通工具及条件变化而衰落(如中国历史名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一样,澳门随着港口的日益淤积和船只的大型化,其地理条件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了,这是澳门经济衰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作为贸易主体的葡萄牙人被新的海上霸主荷兰人封杀了。

又如澳门的制炮业,17 世纪明将袁崇焕击退清兵,清朝郑成功解放台湾,澳门的制炮技术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它是较典

型的有需要就生产的临时性工业,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对付海盗的需要,澳门的制炮业繁荣了一二十年。战争结束后,澳门的制炮业也就停止了。

博彩业的兴起得益于澳葡政府的默许,其生存及发展的外部条件一直未变。

现代制造业的兴起和衰退也和外部条件有密切关系,它依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澳门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享受发达国家配额和优惠待遇。1972 年、1976 年欧洲和美国还对其实施普通优惠税制。由于它得到的优惠与香港的优惠条件几乎一致,促使许多在香港激烈竞争的商人来澳门设厂以争取更多的订单。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澳门有大量人口流入,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大大低于香港,使产品成本降低。现时由于这两个因素都在逐渐消失,澳门现代制造业的衰退也就不奇怪了。

澳门是一个很能抓住外部条件的地方,但却很少利用外部条件为澳门的经济积累基础,这也就出现了当发展的外部条件一消失,经济就出现衰退,没有发展的后劲的现象,这可能与澳门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桥梁性”有关。

2. “桥梁性”

“桥梁性”也可以说是“中介性”、“窗口性”。从物质方面来看,16 世纪以前澳门就处于这种状况。在 16 世纪贸易高峰时期,进口的物质来自欧洲,走向是内地的富贵人家;出口的物质来自珠江三角洲,走向是印度和欧洲,澳门在其中起“转手”、“承接”的作用。现代制造业其实也是如此,产品订单来自欧美,在珠江三角洲未开放前在澳门生

产,现在大部分是在珠江三角洲生产,澳门起着承接订单、转口的作用。在金融方面,澳门有把贸易赚的钱大部分转移到国内的历史,现在还有人在投诉澳门赌场赚的钱有许多没有留在本地。“桥梁”的特性可能是澳门经济不能延续的一个方面。

但是“桥梁性”带来的东西文化的合璧却在澳门保留了下来,并成为澳门最具特色的物质形态。

澳门的“桥梁性”说明澳门的意义是区域性的,它的腹地是珠江三角洲、国内和欧美地区,这是四百年澳门经济发展下来的根本点。

3. 垄断性

早期澳门贸易的产生即具有垄断性的因素。首先,葡萄牙人作为海上霸主,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其次,明朝的海禁政策使澳门曾较长一段时间作为中国唯一开放的口岸。第三,明朝时日本侵朝战争使中日直接贸易几乎中断,给澳门贸易兴起提供了机会。澳门贸易的衰退同样是由于垄断性的消失,荷兰人取代了葡人成为海上霸主,日本人驱逐葡人,以及清朝开放对外贸易等,使澳门贸易不再具有垄断性了。

赌博业的垄断性更加明显,珠江三角洲、香港的禁赌,为澳门赌博业留下持续发展的天地。近几年东南亚赌业的兴起显然已对澳门赌业产生了冲击。

4. 脆弱性和灵活性

澳门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它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有关,但这种脆弱性的背后却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澳门总能适时找到发展的“支点”,不管这种“支点”是理性的还是“异化”了的。17世纪80年代澳门贸易衰退后,经短暂的贸易复苏时期后便失去了发展方向。但至18世纪末澳门转向贩运鸦片和奴隶,至19世纪60年代澳门赌业又开始兴旺发达。澳门每个阶段发展的历史都不长,每个阶段的衰退也历时不长。20世纪的制造业也是如此,从神油、火柴转向纺织、服装的制造,现在则在寻找方向。

澳门经济的脆弱性和灵活性决定了澳门经济的短期行为特点,并体现了澳门具有强大的“适者生存”的能力。

澳门经济以上的四个特点是从其四百年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这里只是想利用历史这面镜子为现时澳门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参照。

首先,确立澳门经济的地位应把其放在世界经济大分工的格局来考虑,不能孤立地考虑澳门的经济发展。澳门和珠江三角洲构成一个整体,共同承担着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同样,澳门应维系和发展与南欧已经形成的密切关系,这样可以从两个方面摆脱“小小澳门”的概念,使澳门成为珠江三角洲之澳门,成为欧美之澳门,这样我们对澳门制造业向珠江三角洲内迁而使澳门制造业空心化的担心就显得多余了。

对于经济转型,澳门正在寻找一个新的适合于它的发展条件。它所处的地理条件由于机场的建设和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港口的建设已得到改善,问题在于适合于它的垄断性、桥梁性和灵活性的经济类型是什么?有的学者为澳门提出高新技术战略,但却难以推行,因为这个发展战略脱离了澳门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高新技术在世界各地已广泛推行,很难再使澳门的高新技术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的竞争性由于时机的丧失而减弱。在经济类型转变未找到大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应致力于制造业内部的转变,同时通过澳门的“桥梁性”带动澳门及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再次腾飞,把澳门现时单一的制造业,和那些普遍性的特点改变成为垄断性和灵活性的特征,避免产业的脆弱性。与世界各地的制造业相比,澳门现有制造业具有小型、灵活等特点,应在保持现有特点的基础上再加以改造,使其更适合现代工业要求,再次确定澳门制造业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

作者李郇,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510275)

责任编辑:郭秀文

□ 马梓能

十多年来,佛澳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合作方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的问题。从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情况来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

1、要从单向合作转到双向合作上来。以往,佛澳促进企业发展的合作,主要是单向的“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关系,投资办企业基本在佛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合作的变化,今后要从单向合作转到双向合作上来,做到优势互补,共促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吸引澳商到佛山投资合作办企业;另一方面,佛山也要引导企业,尤其是一些大集团公司,增加在澳门的合作项目,提高合作质量。佛山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如佛山玫瑰商场与澳商合作在澳门开设商场;佛山金城大酒店参股澳门南粤大酒店,并负责南粤酒店的经营管理等。

2、发挥澳门的特殊地位作用,拓宽与欧共体国家的联系渠道。佛山企业要走向世界,就要充分利用每一条有效的渠道。澳门与欧共体具有特殊的关系,对澳门本身而言,要加强佛澳合作,就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为促进佛澳企业发展起桥梁作用。佛山也需要充分利用澳门与欧共体已缔结的贸易合作协定和与欧洲形成的历史关系,通过澳门有关方面介绍信息,穿针引线,引进欧共体国家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同时向欧洲推销佛山企业名牌产品。例如佛山市直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欧司朗公司办中德合资企业,城区与意大利比阿乔公司合资办摩托车企业,市直华新发展有限公司下属

的华新利乐公司与瑞典利乐公司合资办项目,均是采取上述办法促成的。又如,华丰纸业有限公司从德国引进了造纸软压光机,于去年5月投入运行,使涂布白板纸质量进一步提高,产品上了一个档次。

3、把合资办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主攻方向,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21世纪,佛澳两地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问题,尤其是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双方目前低层次的经济合作方式已不太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此,佛山市政府在“九五”规划中,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并颁布了佛山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澳门也在调整产业结构,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显然,这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使佛澳双方都有了共同点,在提高合办力度方面也取得了共识。但要继续加大这个重点的合作力度,以求取得更大的成果。佛澳在高新技术企业合作方面已取得喜人的成效,如去年8月,佛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在广电部电影、电视部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和帮助下,与澳门粤山发展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了中广数字广播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座落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主要产品包括卫星电视接收器、网络专用调制解调器、机顶盒以及DAB接收机等,这些产品的性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佛山高新技术企业有较高水平的智能机构,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特别是佛山生产了中国第一台广播电视卫星数字接收机,这标志着中国的数字接收技术正在走向世界的前列。

4、联手建立信息网络。利用澳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设备和世界性信息网络的优

势,进一步沟通佛山与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联系,及时向世界收集和传递信息,尤其是欧洲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同时也将佛山的企业改革发展进程、投资政策环境和产品信息传递到澳门和欧共体国家,以实现信息双向流动,便于各方进行科学决策,选择投资产业方向。南海市在信息化方面,先走一步,成为我国最早建立起的“信息高速公路”城市之一。目前,全市多媒体综合信息网已经开通并已接通了因特网。信息网络已经给一大批新型企业的营运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营环境和优势,更为企业建立现代管理机制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而且直接和澳门乃至欧共体国家的信息网进行联网交流,这样各方既可以在网络上传递和收集各处的市场、科技和企业发展信息,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招商,并且这也可跨国集团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佛山也可由此吸引更多的欧共体国家知名企业、跨国公司进入投资,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着力建立科技、管理人才的交流和培训中心,为佛澳两地人才的交流、引进和培训提供服务。讲竞争,既有市场、名牌产品的竞争,也有科技、管理的竞争,但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为此,就佛山而言,要着眼于长远发展计划的需要,充分利用澳门便于联络欧共体国家人才市场的优势,通过澳门的人才交流中心,再根据佛山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由澳门帮助引进高层次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利用澳门聘请境外师资比较方便的条件,通过澳门企业企业人才培训中心,组织佛山企业管理人员参加培训;还可以组织两地企业家互访交流,博采双方管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尤其要加强双方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营运和管理方面经验的

交流和探索,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外经委属下的佛山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佛澳双方民间的交流也比较活跃,如澳门饮食业联合商会理事长叶绍文先生为佛澳两地饮食行业的交流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不但注重及时传递两地饮食业的信息,还与佛山饮食行业商会的同行经常交流经验,不断商议和探索发展两地饮食业的有效方法,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今后,这项工作要在创新交流方式和提高质量上下功夫,以期取得更大成效。

6、要加大对佛澳名牌产品的宣传力度,为知名企业开拓新市场创造条件。市场的占有率,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就佛山而言,佛山已有20多个品牌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中有1/3已打入国际市场,还有100多个品牌在华南地区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销路较好。但要让佛山知名度较高的产品能多一些进入国际市场,仍需要付出许多艰苦的尝试和努力,尤其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澳门与欧共体特殊关系的作用,帮助佛山向欧共体国家宣传佛山的名牌产品,让这些国家不断了解佛山的产品,为佛山名牌产品能更多地进入欧共体国家市场创造条件,并通过宣传,不断吸引外资投入名牌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此外,除了以促进企业发展作为佛澳经贸合作的重点外,还要在金融业、旅游业、基础建设、贸易等方面加强合作,做到突出重点,向多元化发展。

作者马梓能,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528000)

责任编辑:林有能

“爰田”非即“援田”

□陈斯鹏

《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都载有春秋时期晋国“作爰田”之事(《国语》作“作辕田”)。历来对“作爰田”的释义异解纷纭,迄无定说。近时有屈友贤先生《“作爰田”注释新探》(载《学术研究》1997.8),结论为:“作爰田”即“作援田”,是晋国开始实行的因支援国家而赏众的田。殊觉费解,略辩数言。

释“爰”为“援”看似有理,实则以今人眼光解读古书,不足为信。在春秋时期,代国君征战绝对是臣民份内应尽之责,言支援国家殊为无说。爰、援为古今字,本属于不同历史层次。《说文》训“爰”、“援”皆曰“引也”,故在用引义时,二者常可通用。而援助字较后起,是在“援”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在这一点上,“爰”、“援”有较明确的分工。《史记·六国年表》云“义渠来赂,繇诸乞援”,“援”或作“爰”者,是一个特殊例子。正因为以“爰”为援助之援不合古语惯例,所以,说者往往需要迂回周折地串讲一番,以圆其说。《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一题为《商鞅辕田制研究》的文章写道:“晋国作爰田,就是为了取得晋国群臣对晋惠公回国为君的援助,将原由国君直接控制与占有的公田赏给群臣占有与使用。”是屈文之比。又屈文先肯定“爰田”即“辕田”。《汉书·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如果说秦晋韩原之战,众因支援国家而得赏田,那么商鞅的“制辕田”又将作何解释?实未可通。

《左传》言“以君命赏”、“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国语》云“赏以悦众”,可知“作爰田”包含有赏田性质是无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爰”字的训解。前人或训“易”,或训“于”,而又各有其说,此不赘引。今按,爰、辕同,当训换、易为是。爰、辕、换上古同属厘纽元部字,读音完全相同或非常接近,可以通

作;《说文·手部》:“换,易也。”故爰田、辕田即换田、易田。古书爰假换义的又如《史记·张汤传》:“传爰书,讯鞠论报。”《索隐》引韦昭注云:“爰,换也。”又如《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爰居之言易居、迁居。爰田既为易田,其何以言易,具体涵义是什么,更是关键之所在。杜预云:“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贾逵、孔晁等认为是赏田而易其疆界;何休云:“三年一换主易居”;后人又颇多与《说文》“趣田易居”混为一谈,皆不无牵强。近年,有部分学者的见解颇值得注意,如李家浩先生疑“爰田”与甲骨卜辞中的“𠩺田”意近,曾宪通先生言:“古有爰田之制,又称辕田,是一种安排耕地与荒地轮换种作的制度,故可称为选田。”今按,若单纯作轮换种作理解,则未必与《左传》、《国语》、《汉书》文义相合,然而这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古汉语词义往往动名相因,爰田为轮换种作田地,则用以轮换种作之田也可称爰田。类似的如“封田”,本指封赐王族大夫以田地,引申之也可指封赐之田,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赋封田以嫁公女。”所以,“爰田”便是用以轮种的撂荒地;晋国之“作爰田”即允许大夫、国人自由开垦这些撂荒地,而国家向其征税(言“征缮以辅孺子”是也),这实际上便承认了他们对自垦荒田的所有权,所以这项改革措施具有赏赐的性质。“作爰田”刺激了臣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国力的增强,与当时晋国的形势及统治者的目的正合,其性质与后此50年的鲁国“初税亩”近似,实开私田之端绪。及至商鞅进一步“制辕田”,“是以民用力劳而不休”(《韩非子·定法》),这其间反映的正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日渐私有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作者陈斯鹏,中山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510275)

责任编辑:郭秀文